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走近衰亡

Toward the Decline and Fall: A Study of the USSR under Brezhne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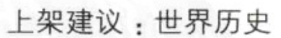
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

陆南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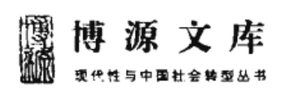






www.ssap.com.cn
www.boyuan.hk

ISBN 978-7-5097-2602-0
定价：28.00元



走近衰亡

Toward the Decline and Fall:A Study of the USSR under Brezhnev

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

陆南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陆南泉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ISBN 978－7－5097－2602－0

Ⅰ．①走…　Ⅱ．①陆…　Ⅲ．①政治－研究－苏联－1964～1982　Ⅳ．①D7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8414 号

·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走近衰亡

——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

著　　者／陆南泉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责任编辑／赵子光
电子信箱／jxd@ssap.cn　　责任校对／贾迎亮
项目统筹／徐思彦　　责任印制／岳　阳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20　　印　　张／12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177 千字
印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2602－0
定　　价／28.00 元

编者的话

中国自以巨大的落差遭遇现代性以来，至今已逾160年。在这160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持续的动荡和断裂，以及持续的革命和后来极端的社会整合，直到中国经济突然爆发的最近20年。然而，经济突然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加速地暴露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这正是马克斯·韦伯在100多年前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的警告。在我们看来，这个警告也适合于今天的中国。

30年前，正值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者开始进行反思，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启蒙。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了《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这些丛书所传播的现代知识，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定式，为3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今天，中国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关头，如果说，当年的思想启蒙重在传播现代理念，为骤然而来的改革提供思想力量，那么，博源基金会作为思想启蒙的传承者，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则旨在集近30年来实践、研究与探索之成果，寻求对今天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共识。

“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项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寻求社会共识，是博源基金会的重点工作之一。而《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就是上述研究和讨论的成果。我们认为，讨论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必须面对世界难局，重建我们的知识体系，这就形成了丛书的如下主题：现代性从何而来？中国是如何遭遇现代性的？当前中国为什么要提现代性转型？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状况及其约束条件是什么？现代性在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它是否还是一项绝对价值？是否存在“另类现代性”？各类国家现代性转型比较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如何选择适合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路径和模式？等等。

为了更好地体现相关学科领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先后组织了不同学科的领军人物进行深入讨论；伴随着每一次讨论，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直接拷问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问题。实际上，这些学术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丛书的边界，是不同学科对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思想认知、碰撞与交融，从而使丛书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让大家发抒各自的专业研究成果与识见，以期从不同角度勾勒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基本轮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系博源基金会之“博源文库”的一个系列。本套丛书总序由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撰写。

博源基金会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编辑小组

2009年9月30日

总　序

金耀基

博源基金会是由秦晓与何迪两位先生倡议成立的一个学术性团体，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秉持开放、理性、包容的精神，志在建立一个学术的平台。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一文中说：“‘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为此，博源基金会在2008年提出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课题的基础上，于2009年3月的理事会上又提出了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的构思，指出：“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社会共识，应该成为基金会的重点工

作之一。”

我很认同博源基金会诸君的看法与价值理念。百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国族求生存、发展而起的各种变革运动中，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自强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包括清代“废科举，设学校”），到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11年国民党共和革命，1949年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一直到1978年开放改革所展开的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这一连串的变革运动背后，确有一股强烈的动力，那就是求国家之富强，求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但无可讳言，这一连串变革运动，不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自愿的或不自愿的，都在向“现代的西方”借鉴学习，向西方取经（应指出，社会主义也是西方的，它是“反西方的西方”）。从器物到制度到启蒙的价值理念（如理性、自由、民主、人权等）都一一进入中国。故百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乃至生活形态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造成的。百年来一系列变革运动实是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中国现代化。整体上，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有方向性的历史过程，即是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亦即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程。我们应该强调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绝不仅是求国家的富强（经济现代化是而且仅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现代性，不多也不少，是指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的文明秩序（一个主要以儒学三纲六纪为规范的帝国秩序）已倾圮解体，而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还远远没有完全建立，今天仍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其意涵实远不止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也不仅是像美国反殖民的独立革命，还是涉

及器物、制度和价值系统的文明形态的转型。

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以欧美的文明形态为参照系统的。150年前，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脱亚入欧，可说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以西方的现代性为范本而成为东方第一个现代国家。但值得特别指出者，日本的现代性之建立虽是以西方为范本，但是仍有强烈的日本文化的性格，故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日本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共相”，也有“异相”。无可否认，欧洲依启蒙运动建构的新文明形态是现代性的最早的个案。19世纪以后，欧洲一直被视为世界先进的文明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由世界的“兵工厂”而转为资本主义“自由之堡垒”，亦自然而成为“西方现代性”之表率。但不能忘记，1917年俄国共产党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已在资本主义之外提供另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已形成一个挑战资本主义的世界力量。以俄国为领袖的苏维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更构成了冷战时代东、西对垒的两大阵营。依马克思原本的理论讲，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但在长期的冷战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却是作为一种更优越的“现代性”（或曰“超现代性”）向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挑战的，亦即社会主义是以拥有更优越的制度、价值的文明性向世界宣称的。诚然，社会主义所描绘之彼岸的自由王国的理想是无比浪漫动人的。恰恰因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比资本主义的也更大。列（宁）斯（大林）路线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程度不同地出现问题或异化，而“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冒进路线，更把中国推向亡党亡国的边缘，幸因1978年的开放、改革而转危为机。1991年，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不啻

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顿挫。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福山（Francis Fukuyama）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看法。他说那些可以代替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系统方案，已经彻底穷尽了，他说世界可能已到达人类意识形态演进过程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得到了普遍化，成为人类最后的政体形式。诚然，福山的论断具有浓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偏执性，须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不因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失败”而理所当然地取得终极的正当性。其实，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深刻地暴露了西方现代性的黑暗面，美国先后涉足与发动的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以维护自由与民主自居，却充分显露了霸道的政治性格，实不足以言为缔造全球政治秩序提供了范本。2008 年 10 月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其殃源正在美国的华尔街，更透显了资本主义之经济秩序有深层的结构问题与道德性缺陷。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欧美思想界出现了一场激烈的“现代性论辩”，西方知识人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诚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 20 世纪初即已指出作为西方现代性思想根源的启蒙运动的遗产，不是理性（Reason）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胜利，它不能导向启蒙思想家的希望（即普世的自由）的实现，而提出“铁箍”的警告。80 年代的“现代性论辩”，循韦伯之思维，集中地表现为“理性的论辩”。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以济工具理性的不足，他是西方现代性的维护者，但他承认启蒙方案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我们可见到的是，西方的现代性依然在自身反思中逐步修正。我同意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L. Kolakowski）的看法，现代性方案是“处于永无止境的试验中”。

中国于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的废墟中，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发出改革开放的巨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力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过去有人说，“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现今看来，应该是“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主义”了。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史无前见的成就。中国的崛起已是世界的事实。的确，中国扭转了16世纪以来西方日踞世界支配性地位的格局，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从边陲走向中心，中国很大程度上已实现百年来追求的富强之梦。但是，我们要问，中国上升之路会一帆风顺吗？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在21世纪步向强国之路上，将无可避免地面临种种外在与内在的挑战与考验。在今日全球多元格局下，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绝不止是军事力量，甚至不止是经济力量，毋宁更是知识力、文化力，特别是它拥抱一套现代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公义、多元、王道、环保等），说到底，它必须有一个现代的文明范式。中国百年之现代化运动的真正愿景，如前所述，是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我们今天距离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之建立还很远，即使就中国今天最有成就的经济领域而言，贫富的差距，城乡之间的落差，市场规范的缺失，实在还未能完成一个经济的文明秩序。我们上面已指出，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中，但社会转型并不会自动地成功地转向一个现代文明秩序。这一项巨大的文明转型的工程，它建构的主要资源来自社会主义，来自资本主义，也应该并必然有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所建构的是一个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一点不夸张，它需要这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当代的知识人，以理性、批判的反思精神，贡献各自的心力与智力，来与国人共谱中国的历史新章。

博源基金会，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并志在为知识界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这个《现代性与社会转型丛书》正有幸得到多位知识界杰出学者的参与支持，各自独立地发抒其专业的研究成果与识见，欣赏敬佩之余，是为序。

金耀基

2009 年 7 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主题

第二部分　专题讨论

第三部分　相关链接

第一部分

主　　题





前　言

1991 年底苏联发生剧变以来，中国对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日益深入，出版了不少论著。但伴随着研究的深化，就会发现，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与苏联兴亡关系的研究，远不如像研究斯大林、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重视，似乎这个时期与苏联社会主义兴亡关系不很密切。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一些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妥的改革。而人们没有意识到，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这种稳定意味着停滞。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实际上是停滞不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就忽视了稳定所掩盖的日益积累的种种矛盾，从而在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兴亡问题时，忽略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之所以产生这种稳定的表象，与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没有发生跌宕起伏的重大事件有关。勃列日涅夫时期像一部平淡的历史剧，有条不紊、循规蹈矩，永远不会出现高潮，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一个接一个的重大事件，高潮迭起：超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伴随党内激烈的斗争而来的“大清洗”……一直到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形成与确立，无不一一成为研究苏联

社会主义兴亡的重要问题。它也没有像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发生过苏共二十大震撼世界的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进行过 1957 年的工业与建筑业的大改组，展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大讨论，从而使他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赫氏甚至提出埋葬资本主义的豪言壮语。至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苏联的剧变发生在他的执政年代，也就很自然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①] 等观点，都成为学术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兴亡问题的热点与争论的话题。

其次，1991 年底苏联剧变后，人们研究的重点，自然放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会消亡，要着力探索消亡的深层原因。在某些人看来，勃列日涅夫时期似乎是社会主义兴盛的标志。主要的依据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下半期开始，苏联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从经济实力看，苏联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到了 70 年代初，苏联战略核武器达到与美国不相上下的水平，苏联已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与美争霸，不可一世。所以，一些人误以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既然是“最强大的鼎盛时期”，那么在研究苏联衰亡问题时，就自然会将这一时期排除在研究的视野之外。

也正是由于这个因素，在苏联剧变后，在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的情况下，具有大国情结与强烈民族主义的俄罗斯人，对苏联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强国地位无比眷恋，对领导苏联兴盛强大的领袖无比怀念。这就是为什么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 184 页。

在当今俄罗斯人中间，勃列日涅夫仍保持着较好声誉的原因。据2006年俄罗斯权威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的调查，一半人认为，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历史上是个正面的角色。

然而，在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家看来，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最后走向衰亡的关键时期。面对这种巨大的反差，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进行深入研究，分析这一时期稳定背后的真相，为稳定付出了什么代价；这种稳定是怎样一步一步转向停滞，最后成为走近衰亡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总结其教训，不仅对正在努力重新崛起的俄罗斯来说，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正在深化改革的中国来说，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 勃列日涅夫上台的背景

1. 一帆风顺的仕途

1887年，法国与比利时合营的南俄公司选中乌克兰第聂伯河下游的卡缅斯克耶市，在这里建立了乌克兰最早的两座鼓风炉，从此，这里渐渐成为南俄冶金业集中的地区。不久，一个名叫雅科夫·勃列日涅夫的农民，带着全家离开库尔斯克省斯特列茨克县勃列日涅沃村，来到这里当工人。他的儿子伊里亚·勃列日涅夫也成为轧钢工人，结婚后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就是后来成为苏共总书记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1906年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出生在卡缅斯克耶市一个俄罗斯族的家庭。1915～1921年，勃列日涅夫在卡缅斯克耶一所工人学校学习。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是在工人村长大的。从15岁起就进了工厂，并成为不断成长壮大，并经受锻炼的工人阶级活生生的见证人。"[①] 1923～1927年，他在库尔斯克土地管理和土地改良技术学校上学，并在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他

① 〔苏〕《勃列日涅夫回忆录》，彭承清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104页。

曾在白俄罗斯南部奥尔沙附近的一个区里当过土地测量员，后来又在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做了三年的土地管理工作。1929 年 10 月，勃列日涅夫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1930 年转正为正式党员，在该州一个地区任农业管理局副局长。不久，他离开乌拉尔，到莫斯科加里宁农学院学习，直到 1931 年。

1931 年，勃列日涅夫回到乌克兰，在卡缅斯克耶冶金厂做工，同时在冶金学院函授班学习，1935 年毕业取得了工程师文凭。之后，他应征入伍，服了一年兵役。1936～1937 年，他曾当过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冶金技术学院院长；1937 年，任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市的苏维埃副主席；1938 年，调任第聂伯罗彼德洛夫斯克州的联共（布）州委商业部长；1939 年，任该州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1941～1945 年，勃列日涅夫再度应征入伍，曾担任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先后获上校与少将军衔。他曾参加 1943 年进攻德军的塔曼战役中的“小地”之战，这是他一生中引以自豪的事。战争结束后，1946 年 8 月，勃列日涅夫任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委第一书记。1949 年，赫鲁晓夫回莫斯科任市委书记，推荐勃列日涅夫任摩尔达维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接着，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当选为中央委员，继而又成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与中央书记。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当时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第一书记中，只有 3 个人以第一书记身份进入主席团。除勃列日涅夫外，还有乌克兰的列·格·麦里尼科夫，白俄罗斯的尼·谢·帕托里切夫。而勃列日涅夫任职的摩尔达维亚，是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最小、最弱的一个，并不具有重要地位。他之所以能进入主席团，与赫鲁晓夫大力推举有关。

从此，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地位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高层领导核心。1955 年，赫鲁晓夫又派勃列日涅夫去哈萨克斯坦，担任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帮助赫鲁晓夫推动垦荒计划。1956 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勃列日涅夫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与书记处书记。6 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开除出党后，勃列日涅夫又晋升为中央主席团正式委员。

1960 年 5 月，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成为国家元首。尽管这是个无实权的虚职，但享有很高的荣誉，并且有利于他躲过党内、国内种种激烈的政治争斗，避开了很多政治风险。1963 年 6 月，赫鲁晓夫又让他进入握有实权的中央书记处，集中力量抓党的工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由米高扬担任。

2. 缘何恰巧是勃列日涅夫

1964 年 10 月 14 日下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以“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为由，逼迫赫鲁晓夫自己提出，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①] 12 月 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并通过了由勃列日涅夫提出的由柯西金接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建议。这样，通过一场真正的“宫廷政变”，结束了赫鲁晓夫时代。

关于这场反赫鲁晓夫的阴谋，谁是主要策划者，到目

① 1966 年 4 月 8 日起改称总书记。

前为止，还未见到解密档案。这里，根据曾任苏共中央委员，曾为苏共中央起草文件，为苏联领导人起草讲话稿的阿尔巴托夫的分析，勃列日涅夫，是参与了阴谋策划中的，但未必是头头与主宰。如果是集体策划的，他也只是其中之一。比较武断与强硬的波德戈尔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斯洛夫是参与者之一，谢列平显然参与了这场改变。波德戈尔内与谢列平很可能都是头头，后者至少是前者的“主要助手”或“打手”。从当时情况看，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策划者，并不是出自什么崇高的理想，也不是为了实施什么苏联发展的新纲领，主要还是出自追求权力的欲望，或者出自丢掉自己的官位的恐惧。[1]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进入到平淡无奇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且大多数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个能力弱的人。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废黜赫鲁晓夫的政变参加者，在推选勃列日涅夫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

在政治斗争的历史上，这种现象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如果当时找不到一个能普遍接受的领袖人物，又急需撤换原来的领导人，那么就会寻找一个妥协性的人物；并且往往物色能力较弱的人，而不是物色能力较强的人。另外，不少人认为，勃列日涅夫只是个临时的过渡性人物。这样做，会使其他一些领导人感到更安全一些。再说，勃列日涅夫在党政机关和军队都工作过，他从事党的工作 17 年，政府工作 10 年，部队工作 7 年。他懂得一些工业，也懂得一些农业，尽管懂得不多。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即勃列日涅夫是俄罗斯人。另外，与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① 参见〔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 142 页。

中的其他三个元老（即米高扬、苏斯洛夫和柯西金）相比，勃列日涅夫是最年轻的。实际上，“勃列日涅夫的许多缺点一开始也十分明显。他有一个恰如其人的名声，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智力也不高的人。但是，那些把他形容成非常愚蠢的人是不对的。他不仅有政治上的处世才能，而且有灵活的机关工作经验。没有这些，在当时的政治坐标系中是无法生存下去的”。[①]

在当时，勃列日涅夫不仅具有年龄优势，而且还因为其他三位元老有自身的弱点。拿米高扬来说，他是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历史上，俄罗斯人对高加索人一直是持排斥态度的，所以，从一开始米高扬就被排除了作为首脑候选人的可能性。另外，他在党的机构和军队中也无根基。至于说到苏斯洛夫，虽是俄罗斯人，但他在经济、党务与军队同样没有较深的关系。他是个理论家，但只是按斯大林的老框框进行注释而已。在当时的苏联，理论家也只不过是个“反刍动物”。且他本人也并没有当第一把手的野心，只想维持其灰色主教的地位。最后是柯西金，他是一名技术人员，名义上担任党的领导机构成员，但与党的机构无联系，是“一个冷冰冰的专搞经济统计的账房先生。不错，他具有政治头脑，但绝不是一个搞党务工作的人，并且与部队没有联系”。[②]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缘下，勃列日涅夫作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且明显优越于其他竞争者的人选脱颖而出，由此登上了苏联党内的最高层，成为继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之后的党的新领袖。

---

① 参见〔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61页。

② 〔西德〕米夏埃尔·莫洛佐夫：《勃列日涅夫传》，张玉书等译，三联书店，1975，第337页。

3. 赫鲁晓夫留下的残局

尽管赫鲁晓夫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的确是苏联历史上的第一个改革者，在苏联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一段话是有道理的，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①] 然而，赫鲁晓夫毕竟是一位失败者，探究其改革失败乃至被迫下台的主要原因，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

（1）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作为悲剧性人物的赫鲁晓夫，其改革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无法挣脱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束缚，从根本上否定经由列宁主义政党派生的国家极权统治。就像螳臂挡车一样，当他试图对斯大林发起挑战时，遭遇的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深远影响，而且是要面对斯大林主义所塑造的极权体制的顽强反抗，乃至最终成为这一体制的牺牲品。

首先，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具有历史局限性。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形成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②] 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社会革新道路的第一

① 〔美〕尼克松：《领袖们》，刘湖译，知识出版社，1984，第 230 页。

②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139 页。

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认识就在于此，而他至死也没有摆脱这个错误认识。总的看来，他真的相信，揭露了斯大林个人，他就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对消除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即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出现的深刻的变形现象没有做任何一点事情。”“我在读他的回忆录时感到震惊的是，他或者对一些明显的事情完全视而不见，或者是顽固地相信那些老的谎言，即使是他后来的经验已揭穿了这些谎言的时候仍然如此。例如在他回忆录中，他似乎一本正经地说，在挑选领导人问题上，用哪一个人取代另一个人的问题可经常提到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去解决。没有这一点，‘我不知道党会变成什么样的党’。”[1] 赫鲁晓夫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2] 上述的局限性，决定了赫鲁晓夫不能从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根本性弊端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和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认识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与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是斯大林体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的产儿有关。因此，就产生了赫鲁晓夫这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139～140 页。

② 〔苏〕罗伊·A. 麦德维杰夫等：《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邹子婴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第 22～23 页。

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①] 赫鲁晓夫一方面“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那儿撞撞。”[②] 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体制改革和重大国内外政策方面出现的摇摆、前后不一致、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原因，不能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争权）。

第二，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③] 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

①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202~203页。

②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43~44页。

③ 参见〔苏〕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李树柏等译，东方出版社，1990，第3页。

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从经济理论上讲，为了进行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没有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拿讨论得最多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来说，到 1961 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也只是说它具有新内容并加以充分利用而已，根本没有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取向，强调的还是指令性计划。在所有制问题上，赫鲁晓夫同样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他执政时期，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人们搞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事来，有的地方甚至把 30 来个甚至更多的农庄合并成一个大集体，也就是说，成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合并集体农庄，而且常常是胡来的令人不快的合并，这也是集体化的继续，确切地说是集体化的大功告成”；1958 年砍掉农村个人副业，认为它影响了公有农业经济发展，而这种错误思想，“是赫鲁晓夫对农民，也是对全体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1] 在“左”的思想支配下，赫鲁晓夫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头几年（1958 年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执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被赫鲁晓夫自

① 〔俄〕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 16 页。

己破坏，譬如，他自己搞集权乃至个人崇拜，又如，他通过干部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的选拔干部制度，“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① 产生这种情况虽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要害即权力过度集中。按照熟知苏联内情的阿尔巴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识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因为他作为党的头头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想象不出用以取代这种制度的其他方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深刻的变革（而赫鲁晓夫是不想的），掌握权力就会越来越变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弃过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将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后，当年斯大林建立它们正是为了确保‘个人专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里用了库西宁的这个概念，看来，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显然他不了解这个概念的全部涵义）的许多机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那么领导党和国家就可能简单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还欣赏对他本人的颂扬，当然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凶险的血腥的个人迷信，但毕竟是十分有害的”。②

以上分析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交织在一起，互为需要，从而成为阻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从改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3－67－223。

②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40页。

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即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与上述原因相联系，大改组的结果是，只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即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二是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年大改组确实是未经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事先也未经过试验。三是从改革方法来看，赫鲁晓夫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巩固，他的头脑日益膨胀起来，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对农业心血来潮的改革和对农业发展政策的瞎指挥尤为突出。

第四，从政治角度来看，赫鲁晓夫的改革，涉及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对此事先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作出应有的安排。在这方面赫鲁晓夫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例如，他要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于选举产生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①] 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

① 《真理报》1962年4月25日。

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在农业改革过程中，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和急躁，改组了从农业部、大中农业机构、农学院到试验站的整套政府结构。让农业部离开莫斯科，迁到农村，农业部工作人员失去了在莫斯科舒适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并且，从苏联农业部长到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人员包括农业专家流失……赫鲁晓夫上述种种做法中，有关反特权的措施有其积极意义，但必然引起原来受益者的反对。至于在农业改革中的一些做法，既导致了农业灾难，又引起了农业部门干部的反对。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正确的改革方案，也难以贯彻和取得成功。

第五，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对改革的失败不起主要作用。苏联著名政治家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丘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我（布尔拉茨基——笔者注）冒昧地试着以个人名义补充一句：当你没有看清，准备跳到哪个岸上时，是不能跨越鸿沟的。”①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急躁常常毁了本来可以达到的目标。现代社会，只有受过良好教育、有自制力的、明智的

① 转引自〔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编《别无选择》，王复士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第606页。

领袖人物，才能科学地与深思熟虑地去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第六，不可忽视的国际压力。赫鲁晓夫要推进体制改革，阻力不只来自国内保守势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还来自国际的压力。1956 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盖子后，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严重困境；而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混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因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和其他因素，导致历时十年之久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这种压力，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改革时而出现动摇。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加速去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去进行改革，首先是实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赫鲁晓夫和当时的整个领导对东欧一些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政治危机作出的反应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中国因素对赫鲁晓夫在这一转变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国先后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和"九评"，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难免不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1] 这里，笔者想补充一句：如果赫鲁晓夫在推行体制改革时，中国亦努力探索改革，并且相互进行交流，而不是搞"九评"那样的争论，更不是在中国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以及后来搞极左的"文化大革命"，那么苏联与中国可能会完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66、133 页。

全另一个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认为苏联的剧变有中国一定的“贡献”，此话也不无道理。

（2）改革失败所导致的困难局面

第一，从政治方面来看，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又不善于正确地运用这一权力。这样就造成以下的状况：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内外政策问题，中央集体无法进行自由的、切实的讨论。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谈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虽未最后形成，但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处于复发阶段……一句话，在苏共中央“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下决心让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

这里不禁要问，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揭露其独裁政治产生的严重弊端问题上，后来，他为什么在不少方面又走斯大林的老路呢？为什么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呢？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揭露赫鲁晓夫问题的报告中，对此作了一些分析。报告认为，事情的发生亦是有个过程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崇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3－67－223。

拜，一面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意见。因此，当 1957 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确地使用权力。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内和国外形势的考虑”。“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威信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明”。“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发展。我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当然，他们也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关于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这里可以看到，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党内没有民主、对最高领导缺乏监督机制的条件下，起初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赫鲁晓夫，之所以会背离这条路线，“这首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权力集中在一个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性。”[1] 亚·尼·雅科夫

---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3 –67 –223。

列夫对此说道："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①

第二，从经济方面来看，由于改革未取得成功，经济状况呈现恶化的趋势并出现了混乱局面。下面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作些分析。

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下降。苏联社会总产值从1956年到1963年的8年间，增长速度降低了50%。与此同时，国民收入指标也出现了下降。到1964年初，年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了2/3（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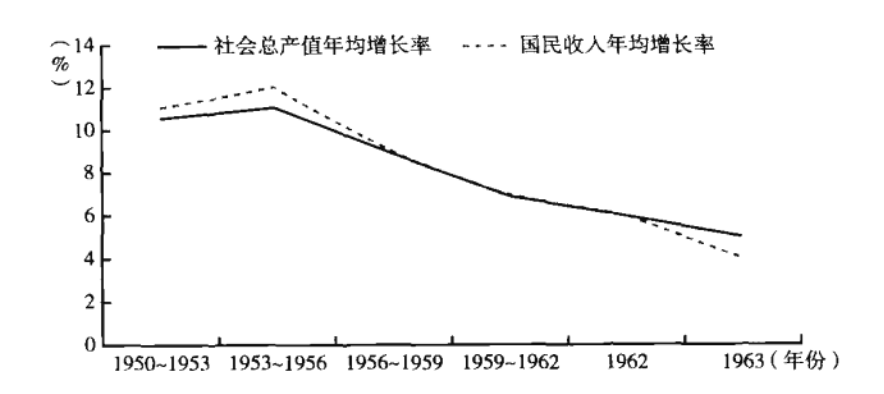


图1　赫鲁晓夫时期国民经济综合指标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3－67－223。

一些重要的部门经济指标也在不断下滑。以固定资产的利用指标为例，在七年计划②的4年当中，整个国民经济降低了9%，而在农业中甚至降低了21%。劳动生产率也不断下降。1950~1955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8%，而在七年计划的年份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实际下降到5.6%，1962年为5.5%，1963年为5.2%。

① 〔俄〕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18页。

② 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1959~1965年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

而按中央统计局的汇总材料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工业中的“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更加失调。到1963年，这种比例失调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当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为10%，比“第二部类”的5%高出1倍。

农业生产形势严峻。按七年计划规定，1959～1963年农业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8%，而实际上，前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1963年则为负增长，按价值计算的总产量低于1958年的水平。5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2.1%，实际上却提高了24%。粮食和饲料的严重短缺，导致大量屠宰牲畜，结果是使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到1964年，肉类产品在各地几乎普遍出现长时间脱销。1963年，苏联国内甚至连面包供应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此，赫鲁晓夫建议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后来，动用了860吨黄金，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粮食，另外还动用了国家的国防储备粮，才未实行凭卡供应粮食制度。

通过农业改革提高农业工作人员对物质利益的关心问题，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人日劳动报酬所得的货币与实物报酬合计为1.56卢布，而到1963年，仅增加到1.89卢布，五年期间一共增加36戈比，即一个人的日劳动报酬每年才增加7戈比。

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来看，苏联经济的发展状况表明，改革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赫鲁晓夫迈着笨拙的步子急急忙忙地去追赶美国，结果以出丑告终。”

以上我们仅从国内政治与经济方面分析了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另外，赫鲁晓夫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在他执政的后七年当中，苏联国家

在无任何重大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已经三次陷入战争的边缘。[1]

勃列日涅夫能否正确地总结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失败的教训，能否根据国际与国内出现的新形势采取有效的应对政策，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

① 这是指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58年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笔者注

二　调整与探索改革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执政30年之久的斯大林。这18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开始执政到20世纪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从70年代上半期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为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勃列日涅夫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调整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二是积极营造与巩固权力；三是探索改革与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

1. 调整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

这里讲的调整与修改政策，主要指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到1965年9~10月，即通过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一系列重要决议之前，在政治、经济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政策。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面对赫鲁晓夫下台后留下的混乱状态，在不致发生大的波动的前提下，尽快对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具体政策进行调整和纠偏，以求稳定人心。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领导班子一上台，就一再地强调，赫鲁晓夫时期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不变。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第一次向公众亮相，是在1964年10月19日出席欢迎宇航员大会上。他在会上说：

"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外政策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党认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是为人民服务，加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威力，提高它的荣誉和威信，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渝地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路。"[①] 1964 年 11 月 25 日，柯西金在土库曼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也明确地说："我们的一切成绩，都是由于实现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以及苏共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总路线的结果。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它是不可动摇的。"[②]《真理报》还发表了编辑部文章，表示苏共"始终不渝地执行着"并"永远忠于""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拟订的、在苏共纲领中得到反映的列宁主义的总路线"。

苏共新领导上台伊始，之所以一再作这样的公开表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国内外有相当多的人，对赫鲁晓夫的被废黜，新领导会不会改变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立场和政策，感到不安和困惑，或者觉得失望。另一方面，苏共内部也确实存在为斯大林主义恢复名誉、主张回到斯大林时代陈规旧套方针的人。他们在 1964 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以后，竭力对勃列日涅夫吹了各种各样的风，在争取勃列日涅夫的"心"。但也应看到，对二十大方针的攻击，遭到苏共党内不少人的强烈反击。[③] 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为了在重大

---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1 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 4 页。

② 《真理报》1964 年 11 月 26 日。

③ 参见〔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164～165 页。

政治问题上不出现反复，明确表明坚持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是必要的。因此，1966 年 3 月召开的平淡与保守的苏共二十三大，在官方文件中还时而提到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并且，勃列日涅夫还考虑到，应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发展经济等问题上来。在上面提到的第一次亮相会上，他说："党认为国内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我国社会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的福利，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希望苏联人民一年比一年生活得更好，更有保障，更有文化，希望人民充分发挥主动性。"①

然而，在保证社会稳定和安定人心的前提下，为了克服赫鲁晓夫执政时期造成的混乱，勃列日涅夫又必须对其前任的一些重要政策进行批判、调整与修改。除了 1964 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对赫鲁晓夫所作的批判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苏联报刊上对赫鲁晓夫不点名的批判还在继续进行。10 月 17 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苏共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总路线》一文，指出："列宁式的党反对主观主义和在共产主义建设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裙带关系，草率的结论，鲁莽冒失的、脱离实际的决定和行动，吹牛皮说大话，根本不顾科学和实际经验已经研究出来的结论，凡此种种都和列宁式的党格格不入。共产主义建设是个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事业，它不能容忍官府衙门的工作方法，个人单独作出决议，不能容忍无视群众实际经验的态度。"后来，"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成为苏联报刊用来批判赫鲁晓夫的代名词。政策的调整与修改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决定重新恢复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统一的党组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1 集，第 4 页。

织与领导机关，取消赫鲁晓夫时期以生产原则为基础分别成立的工业党组织与农业党组织。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指出："必须恢复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党组织及其领导机关的原则。""在原被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州和边疆区，恢复统一的州、边疆区的党组织，把州和边疆区的所有共产党员，不论他们是从事工业工作，还是从事农业生产，都联合在一起。边疆区、州的党组织建立统一的边疆区、州的党委会。""必须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改组为区党委会，集中对各级党组织，包括对该区的工业企业和建设单位党组织的领导。撤销以前在农业地区、州中心和共和国中心建立的工业生产（地区）党委会。""凡是恢复统一的边疆区党委会和州党委会的边疆区和州，于1964年12月分别举行党的代表会议，选举相应的党的组织机关。"决议还指出："赞成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的关于合并边疆区、州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办法的建议；委托中央主席团研究和解决有关在边疆区和州建立统一的党及其领导机关以及有关恢复统一的苏维埃机关的一切组织问题。"

中央全会结束后，11月18日，《真理报》发表《忠于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社论，对所以尽快纠正赫鲁晓夫时期的做法，作了说明："把党组织分为工业的和农业的，引起了许多困难和麻烦。改组同生活发生了矛盾。生活表明，实践上不可能划清工业党组织同农业党组织的活动范围。用所谓生产原则代替按地区特征建立党组织的原则，客观上使党政机关和经济的组织职能、权力/利和义务相互混乱，使党委会代替了经济机关。改组的结果，作为行政经济单位的区，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应付不过来。"

第二，考虑到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像赫鲁晓夫

上台初期一样，强调要恢复被斯大林破坏了的集体领导原则。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第二次认真地试图实行集体领导。《真理报》发表的社论中说："党内生活和活动等是由弗·伊·列宁制定的，并被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所考验、检验和丰富的那些原则和标准确定的。集体领导是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经过考验的武器，是我们党的最伟大的政治财富。""只有在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引导和发扬党和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只有依靠这个原则，才能正确地分析局势，才能清醒地、客观地、不骄傲地评价所取得的成就，才能看到缺点，并且及时地彻底地消除这些缺点。"①

客观地讲，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初期，还是比较谨慎的。在一段时期内，他与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他是在年满 70 岁的米高扬于 1965 年 12 月辞职后接任该职务的），形成了被称之为三驾马车的、体现最高权力的集体领导的架构。另外，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就通过决议，规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永远分离，不得兼任"。但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勃列日涅夫地位日益巩固，三驾马车的构驾逐步解体，集体领导不复存在，最后也发展到个人崇拜（关于这个问题下面将论述）。这是因为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在党内缺乏民主的条件下，集体领导很难实现，最高领导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局面也很难解决。

第三，改变党的作风，强调民主与法治。这主要是针对赫鲁晓夫时期"唯意志论"、草率决定重大问题等弊端提出来的。勃列日涅夫在上台伊始的讲话中说："我们在前进的同时，将提高党的责任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

① 《真理报》1964 年 10 月 17 日。

用和组织作用，在经过周密考虑的、严格的科学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他在不久后的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不大力提高群众的创造性，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的制度保障劳动人民享有广泛权利和政治自由。党和国家将警惕地捍卫这些权利和自由，恪守社会主义法制。”①

以上三个方面调整，主要是涉及政治领域一些重要问题，这对以后有序地开展经济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对农村个人副业即采取措施，决定取消赫鲁晓夫时期的种种限制性规定。为此，1964 年 10 月 27 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取消对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个人副业的不合理限制的决议》。苏共中央委托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审议和解决关于取消最近几年实行的对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在农村、城市和郊区）个人副业中生产农产品的限制的问题；要求苏联财政部和苏联国家银行，在一个月内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关于给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提供购买奶牛和牛犊用的贷款办法的建议。11 月 6 日，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对此解释说：“忽视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为满足本身需要而从事个人副业的条件，是不正确的。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实行了没有根据的限制，而采取这种步骤的经济条件并没有成熟。”②

为了进一步增加农产品产量，增加集体农庄公有基金和收入，为提高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兴趣创造条件，1965 年 4 月 1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向集体

---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1 集，第 5、23 页。
②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1 集，第 22 页。

农庄提供财政帮助的决议》，决定责成苏联国家银行破例允许集体农庄的预付款可以延期偿还，数额为 1.2 亿卢布；集体农庄拖欠机器拖拉机站的债务余额和因修理技术设备、房屋而拖欠的债务余额，应予全部注销。[①]

在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之前，勃列日涅夫为加强农业采取了不少措施，通过了不少的决议。仅在 1965 年 4 月 1 日，苏共中央和苏维部长会议就通过了“关于 1966～1970 年供应农业拖拉机、农业机器、运输工具、挖土技术设备和化肥”、“关于 1966～1970 年发展农业的基建投资”、“关于 1966～1970 年农产品收购计划”、“关于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增加肉类产品量和国家交售量的物质兴趣”和“关于土地已交给国营农场及其他企业及组织的前集体农庄成员的优抚保障”等决议。

2. 积极营造与巩固权力

尽管很多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个能力弱的人，但在苏联那种高度集权统治下培养出来的领导人，都懂得如何保持自己的个人领导权，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十分了解勃列日涅夫（在二战期间与其共事）的阿尔祖马尼扬是这样描述新上任的第一书记的：“这个人在权力斗争和安插干部方面是不用别人去教他的”。[②]

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对他构成威胁的第一位人物是谢列平。此人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重用，是赫鲁晓夫最为信任的人，但他同时也是密谋推翻赫鲁晓夫的参与者之一。谢列平的野心很大，在他看来，勃列日涅夫只是个过渡性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5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第 631 页。

②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154 页。

人物，他将很快取而代之。当时，谢列平已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是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与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他还担任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在勃列日涅夫上任之前，谢列平就把他的亲信安插在很多重要部门，如克格勃与内务部、重要的意识形态与大众传媒机构。实际上，他已经为自己上台作了准备，形成了一个受其支配的“影子内阁”。还有一点要指出，谢列平比勃列日涅夫小 12 岁。勃列日涅夫感觉到了潜在的威胁，随即着手削弱与打击谢列平。1965 年 12 月 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一项法律，把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改组为人民监察委员会，并任命支持勃列日涅夫的科瓦诺夫为主席。这就意味着，由谢列平主管的原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复存在。接着，解除了谢列平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理由是让他集中精力抓党务工作。这就是说，把谢列平从政府部门排除出去了。1967 年 5 月，谢列平的亲信谢米恰斯被免去克格勃主席职务，由安德罗波夫接替。7 月，谢列平被选为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9 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谢列平被免去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伴随着他与勃列日涅夫的矛盾日益加剧，谢列平终于在 1975 年被撵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并被免去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柯西金是一位较有文化修养与学识的人，是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同时也是较能接受新经济思想的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推行，他的影响日益扩大。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柯西金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头几年，他的地位是巩固的。然而，伴随着一批保守的、主张废除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有关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决议的人（如契尔年科、吉洪诺夫、谢洛科夫等）纷纷进入最高权力圈，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之间的斗争也随之展开，勃列

日涅夫与柯西金的矛盾日益加剧。1965 年 5 月 17 日，时任《共产党人》杂志主编的斯捷潘诺夫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改革的胜利就意味着“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到来”与“马克思主义的末日”。文章旨在反对柯西金的改革主张，攻击支持改革的人。5 月 21 日，柯西金的支持者、《消息报》主编斯捷帕科夫发表文章，反击说："一张工程师文凭并不是一切"，“当一个领袖，需要具有比某一技术或经济领域专门知识更多的东西，必须用组织的才能，对领袖的政治作用的正确理解和动员人民的能力来补文凭之不足……”文章明显是针对勃列日涅夫的。后来，《真理报》与《消息报》两个主编都被解职。这亦说明，当时勃列日涅夫不敢偏袒自己的支持者，还必须顾及柯西金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刚上台时，与党内握有实权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保持良好的关系，形成了三驾马车的集体领导格向。但后来，反改革的保守势力一步一步地滋长，权力斗争的总趋势使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不断加强，权力日益集中在他个人手里。1966 年 3 月，在苏共二十三大上，波德戈尔内被免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只留了一个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虚职。随后，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之间在经济政策乃至对外政策方面不断出现分歧，最后柯西金在 1979 年 3 月以辞职告终。

3. 改革的探索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调整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与巩固自己权力的同时，迫于国内经济面临的种种压力，在东欧各国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潮流的促进下，在他执政的第一个阶段，对经济体制的改革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从时间的

进程看，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1）继续推行赫鲁晓夫后期酝酿的经济改革

勃列日涅夫在采取一系列调整政策时，并不全盘否定赫鲁晓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也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直到1964年末，赫鲁晓夫的许多改革——不论好坏——全都废除了。"[①] 勃列日涅夫没有完全否定改革的必要性。

1964年11月6日，他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指出："在发展生产方面，我们必须广泛地采用经济刺激，这一点现在比任何时候更明显了。经济杠杆应该促使企业更好地使用生产基金，更节约地耗费原料和材料，更快地运用新技术，完善所生产的产品和提高每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完成这些任务有助于保证把整个社会的利益同每个生产单位和每个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与一贯实行使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他们劳动成果的原则的同时，在我们的社会里精神刺激因素也起着作用。"[②] 作为主管经济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一再强调，必须改善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提高经济刺激对生产的作用。1964年12月9～11日，柯西金在第六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说："扩大企业经营独立性、扩大企业经理、车间主任、工长的权力，采用经济核算，规定有经济根据的价格，提高利润的作用和物质鼓励是加速发展苏联经济的条件。"1965年4月，勃列日涅夫访问波兰时在华沙车站的讲话中，又谈到了苏联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想法。他在论述物质刺激与发展农业的关系时指出：苏联"将特别注意对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作人员的劳动的物质刺激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党的出

① 〔西德〕莫洛佐夫：《勃列日涅夫传》，第346页。

②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集，第21页。

发点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福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在提高农民的收入、生活水平和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的效力”。接着，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在寻求计划工作和领导国民经济、科学地组织劳动和管理新形式问题时说：“实际上这就是要更合理地利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制定符合我们国家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主义经营方法。同时，生活和实际经验也不断肯定一些形式和淘汰另一些形式。”他还强调“研究其他兄弟国家的相应经验，无疑对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很大意义”。[①]

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有关经济改革的讲话中，不难看出，他们上台后，并没有忽视经济改革的紧迫性，而是在探索与酝酿下一步的经济改革方案。同时，他们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体思路。诸如，要使经营方法符合已达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物质刺激和提高利润的作用等。

与此同时，为了制定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继续进行赫鲁晓夫在1964年夏天实施的“利别尔曼建议”的试验。1964年12月26日，苏联《消息报》宣布，从1965年开始，利沃夫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5个工业企业试行“利别尔曼建议”，试验方案是由利别尔曼教授亲自参与制定的。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对重工业企业只规定产量（包括品种）计划与盈利（包括盈利率）计划，其他各项经济指标由企业自行规定。对轻工业企业的产量（品种）计划根据商店的订货合同，由企业自行规定。方案还规定，利润是奖金的来源。当企业完成计划时，可按照工资基金的比例从利润中提取奖励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集，第137页。

基金。利润越大，奖励基金也越多。企业的奖励基金一半用于企业的投资，另一半用作企业领导人、工程技术人员的奖金。奖金的最高额度不得超过基本工资的40%。

1965年1月1日，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自即日起，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10个大城市的全部缝纫和制鞋企业，以及哈萨克、摩尔达维亚、中亚细亚与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400家轻工业企业和128家纺织与皮革厂，推行根据商业部门直接订货进行生产的试验。试行新制度的企业，其经理有权根据订货者的需要改变计划，规定总产量、工资基金和工作人员人数等。产品销售量与盈利成为企业的两项主要计划指标。1月13日，《真理报》公布，又有336家企业进行改革试验。据《经济报》统计，在196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高尔基与其他一些城市，31%的服装企业、17%的纺织工业企业、10%的皮革业试行利别尔曼改革方案。同一天，《经济报》报道，伏尔加国民经济委员会化学和机器制造厂、中央黑土地带经济区机器制造厂、吉尔吉斯国民经济委员会房屋家具厂等企业，由1965年开始，对建造、改建与扩建现有企业所需的投资，试行由原来的财政拨款改为贷款，其目的是通过贷款的方式加强对工程的监控，以促使工程缩短工期，加快投资回收和降低造价。

1965年，改革的探索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先后通过了有关部门与行业进行改革试验的决议，分别是：3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使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企业工作人员更加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增产日用消费品和改进产品质量，使商业企业工作人员更加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完成和超额完成商品周转额计划的决议》；4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在汽车场的工作中试行计划和领导的新办法的决议》；5月15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

进居民生活服务企业工作的措施的决议》；9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在莫斯科市执委会所属的莫斯科住房及民政建筑总局的某些组织和企业的工作中试行计划与领导的新办法的决议》。

以上改革试验与通过的有关改革决议的内容说明，尽管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但其力主的“利别尔曼建议”改革试验一直未停止过，并且试验涉及诸多部门。改革试验的中心内容并未改变，仍在强调扩大企业在计划方面的自主权，用利润和奖金来加强工作人员的物质利益，从而达到增加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并且在试验过程中，不断总结，积极酝酿改革新方案，并准备全面推行经济改革。

（2）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农业方面，开始时只是采取了一些应急的纠偏措施，并没有重大改革措施，因此，不能解决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留下的严重问题。即1959年以后的农业发展停滞，从而出现了人们排队买面包、肉类等其他食品供应短缺的情况。农业停滞导致市场供应紧张，从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利于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勃列日涅夫决定，1965年的苏共中央全会，集中讨论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面临的农业形势，分析当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应采取的措施。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决议》。从决议的名称来看，也说明解决农业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迫地步。在这次全会代表发言中，集中批判赫鲁晓夫农业政策的有以下方面。

首先，唯意志论与好大喜功。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对农业采取了违背经济规律的瞎指挥。由于唯意志论、行政命令盛行，农业科学、农业专家的作用日益被削弱。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实际上被排挤，忽视了他们的知识和经

验。一些行政领导人充当科学家之间争论的仲裁者角色，从而导致起码的农业技术规程没有遵守。与此同时，农庄的民主原则也遭到严重破坏。在许多集体农庄里，集体农庄庄员实际上不参加讨论和解决农庄经营的重大问题。

第二，不合理的农产品采购制度和价格阻碍农业发展。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作了一些改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果是，与此相关的两个老大难问题始终存在：一是在一系列地区，收购谷物的价格还补偿不了生产谷物的费用。[①] 二是谷物收购任务过重，农庄与农场难以完成。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说，近十年来只有 1956 年、1958 年和 1964 年完成了收购计划。而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后，不得不向国家申请拨给种子，仅 1965 年，就向国家申请拨给大约 200 万吨种子。

第三，农业技术装备程度提升较慢，拖拉机、汽车、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器普遍不足。1965 年，农庄、农场所需要的重型拖拉机与谷物播种机分别只能达到需要量的 40% 与 20%。农用技术装备和备件定价过高，使工农产品剪刀差扩大，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很多代表在发言中都谈到了这一点。有人举例说：买一条履带（它每年都要换），需要卖给国家 3 吨谷物。另外，农机涨价太快。1955 年，一台 CYB－48 型播种机价值 180 卢布，而 1965 年已升至 340 卢布。

第四，农业劳动力萎缩。由于农村生活条件差，缺乏必要的福利设施，导致农村人口外流，使农村严重缺乏劳动力。集体农庄的很多居民点没有福利设施，没有水、学校、医院、诊疗所、俱乐部与取暖设备。由于恶劣的生存

① 参见《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速记记录（1965 年 3 月 24～26 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第 123 页。

状况，在一些农庄中，大约有 60% 多的男劳力从事私人经济（这包括个人副业和家务劳动）。[①] 有人在发言中深刻地指出，在苏联农村出现了“农民不再爱惜土地，丢开不管，任其荒芜，要求少种，不种等等”现象。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集体农庄制度束缚了农庄庄员的积极性。

（3）大力推行农业改革措施

自这次苏共中央全会后，针对农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勃列日涅夫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以下政策与改革措施。

首先，实行固定收购和超计划交售奖励的制度。在赫鲁晓夫时期，国家收购农产品的计划是每年下达一次，并且下达的时间过晚，在征购过程中还经常发生变更与追加收购任务的情况。这就影响了农庄、农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正确地计划自己的生产。为此，1965 年 3 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实行若干年的收购农产品固定计划。后来，规定 5 年不变的收购计划，并且降低收购计划指标。[②] 为了使国家能得到足够的农产品，在降低收购计划后，还实行奖励超计划交售农产品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凡是农庄、农场超过固定收购计划指标交售给国家的农产品，国家按比收购价格高出 50% 的价格收购。

第二，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尽管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在其执政后期工业品价格也随之提高，从而使农业生产费用不断增加，形成收购价格不能抵偿生产成本的现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提高物质刺激在促进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一个重要的改革措

① 参见《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速记记录（1965 年 3 月 24 日～26 日）》，第 131～132 页。

② 《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速记记录（1965 年 3 月 24～26 日）》，第 10 页。

施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65～1979年，农产品共先后提价7次（分别在1965、1969、1970、1975、1976、1978和1979年）。在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过程中，实行了稳定零售价格的政策。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稳定，但也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出现了价格倒挂。某些农产品收购价格超过了零售价格水平，从而产生一些极不正常的情况，如近郊农民拿着大麻袋到城市大量购买面包，以此作为猪饲料。二是财政补贴不断增加。1961～1965年，国家财政为此支出的补贴额为87.9亿卢布，占同期国家预算支出的2%；1971～1975年为860亿卢布，占9.2%。

第三，国营农场推行完全经济核算制。1967年4月13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加强对农产品生产的经济刺激，提高国营农场及其他国营农业企业的工作人员对改进企业工作成果的物质兴趣，决定在国营农场、种畜场和种马场、养禽工厂、苗圃、试验农场和教学实验农场及其他国营农业企业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的农业企业，应能保证靠自有资金偿付一切生产费用，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进行生产性基建投资，组成基本畜群，增加自有流动资金等等），设立各种经济刺激基金和其他资金，以及按时归还银行贷款。[①] 完全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农场的经营自主权。为此，缩减了上级机关对这些农业企业规定的计划指标。二是改革利润分配和使用办法。在改革前，国营农场与整个国营工业企业一样，大部分利润上缴国家预算。为了提高利润对农场发

① 详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6卷，第388～400页。

展生产的积极性，必须改变利润分配和使用办法，以便使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的农场，把大部分利润留为自己支配，而不是上缴预算。

第四，为加强农民个人物质利益采取的重要改革政策。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有：一是改革农庄劳动报酬制度。农庄庄员的劳动报酬制度虽经多次改革，但其基本办法是按劳动日计酬。这种计酬制度，简单地说，其缺点主要有二：报酬水平低；庄员收入不稳定并得不到保障。为了迅速改变这一局面，1966 年 5 月 16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提高集体农庄庄员对发展公有生产的物质兴趣的决议》，决定从 7 月 1 日起，按照国营农场相应工种职工的工资标准，对庄员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发给货币与实物）。农庄参照国营农场同类工作的现行工作定额，结合本身的具体条件，制定庄员工作定额。除了按完成工作量发给庄员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外，还按他们劳动的最终成果（按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或按实际总收入）发给劳动报酬。应该说，这是苏联在农庄庄员劳动报酬制度方面一次重大变革，它表现为从劳动日为基础的报酬制转为等级工资奖励制，从以实物为主转为货币现金为主。这些改革措施明显地提高了庄员的收入水平，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庄员按月获得现金收入的要求，固定等级工资与按最终成果发给奖金相结合，有利于促进庄员对生产与改善经营管理的关心。

第五，在农村试行和推广小组包工奖励制。赫鲁晓夫时期，已进行过机械化小组包工包产制度。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小组包工奖励制形式逐步加以推广。简单地说，就是实行分田到组、包工奖励的制度。它的最大特点是把劳动者的报酬与最终成果紧密联系起来。包工小组拥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土地、拖拉机与其他机器设备）和

固定的人员，人数视生产的条件而定，从几人到几十人，大田作物人多一些，技术作物人少一些，小组领导人经选举产生。包工小组实行内部经济核算，要包产包工包费用，多产多得，节约归己。其劳动报酬支付办法是，在农活结束前，发包人先要预支一部分基本工资（70% ~ 90%不等），年终收获后总结算。如超产、提高产品质量和节约费用有奖，反之则罚。试行这一制度的农庄农场，在产量、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效果。但在推行这一制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很大，这主要有：一是农庄农场领导人，不愿因实行这一制度而丧失自己的权力，也不愿为自己的工作“增添新的麻烦”；二是小组包工奖励制本身也不完善，一系列数据与标准计算起来很麻烦，从而难以准确反映小组内每个人的劳动贡献，从而容易发生纠纷；三是受到整个农业体制的制约，如计划、物资技术供应体制在未改革前，很难适应小组包工奖励制的要求。

第六，对农庄庄员实行社会保障与保险制度。在1964年之前，从法律上讲，对农庄庄员生老病死国家并没有予以保障的规定。1964年7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集体农庄成员优抚金和补助金法》。该法指出：苏联现已有可能在集体农庄中设立养老金、残疾优抚金、丧失赡养人员优抚金以及女庄员的妊娠生育补助金，从而实行更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规定的优抚金和补助金，用农庄和国家的资金来支付，不得从农庄庄员收入中作任何扣除。几经变更后，农庄的社会保障与保险基金，1/3来自农庄，2/3来自国家预算拨款。1965 ~ 1982年，按法律规定领取优抚金（主要是养老金）的农庄庄员人数由800万人增加到1080万人。

第七，增加农业投资。从发展政策来看，勃列日涅夫

上台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以进一步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农业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的进程，开发俄罗斯联邦的非黑土地带，加强农业的科研工作。苏联1982年的农业投资比1965年增长了2.1倍，而同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投资总额增长了1.57倍。从1973年到勃列日涅夫逝世，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投资总额中一直占27%左右。如果把与发展农业直接有关的化肥、农药、农机、混合饲料、微生物工业部门的投资计算在内，农业投资要占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30%以上。苏联对农业投资的数额，在世界各大国中居首位。[①]

第八，积极发展跨单位合作与农工一体化。这一组织形式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并被视为苏联农业生产组织发展的基本方向。采取这种农业组织形式，其主要目的是使农业进一步加深专业化，把各单位的力量联合起来，广泛利用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就，以利于合理利用土地、劳动、技术设备以及集约化的其他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加速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和效率。跨单位合作与农工一体化，反映了科技进步与社会劳动分工深化的要求，即在客观上，使农业提供的最终产品（食品和各种消费品），越来越变成农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工业部门共同活动的成果，这也就要求农业与工业部门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即农工综合体。这种综合体，在当时的苏联基本有两种形式：一是农工企业。它是农场、农庄和工业企业联合从事农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企业。农工企业有统一的经营领导，农场的场长同时也是企业领导人，农工企

① 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第633页。

业有统一的资产负债表，是法人。农工企业以生产水果、蔬菜与罐头的居多。二是农工生产联合公司。它是由若干农业企业与在生产上和农业有关的从事加工、废物利用、农产品保管及包装的企业和生产单位组成的。后来经过不断发展，出现了一些规模更大、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农工生产联合公司。它包括的部门有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服务的“农业前”部门、农业生产部门、“农业后”部门与专业化生产部门。

4. 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

在对赫鲁晓夫后期已酝酿的经济改革进行继续试验与对农业改革的基础上，勃列日涅夫决定在工业部门推行新经济体制。

（1）改革的原则与目标

1965 年，苏共召开中央九月全会。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在会上作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9 月 29 日，苏共中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决定苏联推行新经济体制。决议提出，苏联工业管理体制之所以需要进行改革，这是因为：“工业中现行的管理组织结构、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方法，不适合现代条件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工业领导中也有严重缺点，那就是喜欢用行政方法，而厌弃经济方法。企业经济核算大多徒具形式，企业在经济活动方面的权利受到限制”；“妨碍了部门专业化和不同经济区企业之间合理的生产联系的发展，使科学远离生产，导致工业各部门领导的分散和层次繁多，使工作失去效能”；“为了进一步发展工业，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加速技术进步，提高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并在此基础

上保证苏联人民福利的进一步高涨，要求完善工业生产的计划方法，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使工作人员更加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改进企业工作结果”。[①]

为了消除工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并达到工业改革的目的，柯西金在报告中指出：“这一切只有在集中的计划领导同企业和全体职工的经营主动性相结合、同加强发展生产的经济杠杆和物质刺激相结合、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样，经营管理体制才足以适应提高生产效率的任务。”

自1965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以后，9月30日，苏共中央与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的决议；10月4日，通过了《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同一天，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这些经济改革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新经济体制正式推行。可以认为，1965年9月至10月，通过上述经济改革决议，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所进行的各种改革的基础，以后的各种改革措施，都是这次改革的继续和修补。

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强调，改革要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进行：一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以利于提高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这三条，既是实行新经济体制的原则，也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同时也是达到提高经济效率、克服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措施。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5卷，第667～668页。

从 1965 年通过的决议和柯西金所作的报告看，新经济体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它关系经济体制的各个领域，主要有：改进工业管理的组织，恢复部门管理原则；改进工业计划工作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和巩固经济核算制；加强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对改进企业工作的关心；提高信贷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完善工业品批发价格和改革物资供应体制等。按柯西金在报告中的说法，这些改革内容大体可分为两方面："第一是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加强企业的经营主动性和经济刺激；第二是关于改进管理工业的组织。第一类问题与批准的社会主义企业条例有密切联系；第二类问题是同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经营权限的决议密切联系。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①] 而这些改革内容，实际上都是为了实现上面提到的三项改革原则和目标。

（2）改革政策与措施

首先，重新建立部门管理体制。柯西金在 1965 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的报告中说，从 1957 年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管理开始出现巨大的缺点。工业部门在生产技术方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对它的领导，却分散在许多经济区，因而完全遭到破坏"。"实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能够通盘地审查和解决部门的发展问题。" "在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制度的条件下，只有应用部门的管理原则才能使工业领导的力量达到应有的集中。" "为了改进工业领导，必须建立按部门原则设置机关。各工业部应当成为这样的机关，它们拥有领导各生产部门的全部权力，并对这些部门的发展负完全责任。"[②]

① 《真理报》1965 年 9 月 28 日。

② 《真理报》1965 年 9 月 28 日。

1965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为了克服按地区性原则管理工业所产生的弊端，“必须按部门原则组织工业管理，按工业部门成立联盟兼共和国部、全联盟部”。[①] 可以说，苏联在为推行新经济体制做准备的同时，也着手研究工业如何重建部门管理体制，所以，在苏联中央通过有关新经济体制决议后的第一天，即9月30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就又通过了有关改进工业管理的决议。这一决议，集中解决重建工业部门管理体制问题。决议重申：“必须按部门原则组织工业管理，把领导有关工业部门的企业、科学研究组织、设计组织和支配拨给它们的物质资源和财政资源的工作，集中在统一的联盟兼共和国机关或全联盟机关进行。”决议认为，这样组织工业管理有利于“加强工业部门，使其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技术和经济综合体；保证该工业部的生产领导、发展科学技术的领导和经济领导的统一，改进物质资源和财政资源的使用；提高经济因素在工业企业工作中的作用；消灭现有的管理机关层次繁多的现象和它们工作中的重复现象，提高工业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对他们所担负的工作的责任感”。[②]

在重建工业部门的同时，决议决定：撤销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委员会改为苏联部长会议直接领导，并设立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通过改组，苏联工业管理体制大体上又恢复到1957年赫鲁晓夫大改组以前的状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讲苏联工业管理体制大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5卷，第668页。
②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5卷，第674页。

体上回归到1957年以前情况，是从总体上来说的，并不是说没有任何区别。1965年9月，苏联在决定恢复部门管理原则时，与1957年以前相比，还是有些新的情况。最为重要的是，1965年，恢复部门管理是在推行新经济体制大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改革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不是像赫鲁晓夫时期的大改组那样，主要局限于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问题上，即在“条条”和“块块”上兜圈子。因此，在恢复部门管理原则时，它需要充分考虑推行新经济体制的要求。例如，新条件下恢复和发展部门集中管理，它不应妨碍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勃列日涅夫在196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讲：“我们今天在全会上讨论改善工业领导问题，不是说机械地回到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前的制度，而是在计划和评价企业经济活动的新原则基础上、在进一步发展集中管理和扩大企业的业务经营自主性的基础上的部门性管理制度。”① 在恢复部门管理原则时，还是十分注意发挥共和国和地方积极性的，力图“把集中的部门管理同共和国和地方的广泛的经营主动性结合起来”。② 从1965年改组后到1970年，加盟共和国（包括地方）所属工业产值与联盟所属工业产值一般各占50%左右（见图2）。

其次，在加强企业经营独立性与经济刺激方面实行的改革措施，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一是改革计划体制。一方面，扩大工业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减少上级组织为企业规定的计划指标的数目。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主要靠下达大量指令性指标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也使企业丧失了独立性。1965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集，第304页。

②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5卷，第6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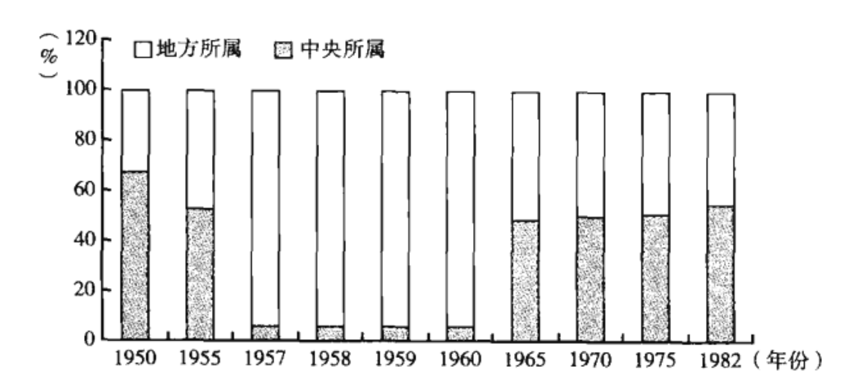


图 2　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的工业产值

资料来源：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第 122 页。

年改革时，国家给企业下达的指标，由赫鲁晓夫时期的 8 类 20 多项减为 6 类 9 项。另一方面，改变考核指标。1965 年前，考核工业企业的指标主要为总产值和成本两项；1965 年实行新体制后考核指标改为产品销售额、利润与盈利 3 项指标。

二是改革企业利润分配制度。1965 年，改行新经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目的是，调整或者说理顺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之间利益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合理地分配和使用企业创造的利润。这必然涉及经济关系中重要的利益关系。从 1965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来看，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主要涉及国家财政与企业的关系，即利润上缴财政制度与财政对企业拨款制度的改革，企业基金的建立和使用制度。

在改革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方面，具体包括企业向预算缴款制度的改革。1965 年之前，苏联企业一直以周转税和利润提成两个渠道向预算缴款，周转税和利润提成一直被视为企业创造的纯收入。由于周转税是商品价格中硬性规定的一部分，它不取决于企业降低产品成本和积累计划的完成情况，因此，它可以保证预算收入的稳定性。企业

把创造的纯收入通过周转税渠道上缴预算后，把纯收入的另一部分以利润提成渠道上缴预算，提成率最高可达81%。由于提成率过高，使得企业的全部利润（除了少量用于鼓励基金外）都缴入了预算，这自然会影响企业及职工的积极性。这种企业利润缴纳制度在1965年前，没有发生重大变革。1965年实行的经济改革，重视企业这一环节，强调企业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把解决国家与企业利益相结合的问题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方面下了更多的工夫。

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财政关系方面，力图体现以下四个原则：既要做到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保证企业在上缴财政后仍保留有相当数量的利润；既要考虑到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要考虑到能刺激企业关心改善经营管理；既要考虑到企业发展生产的需要，又要考虑到提高职工物质福利的需要；既要把集体福利与个人奖励两者结合起来，又要把个人奖励放在首位。

为此，实行新经济体制的企业由原来上缴的利润提成改为三种缴款，即生产基金付费、固定（地租）缴款和闲置利润余额缴款。建立基金付费制度。过去，企业无偿使用国家拨给的固定基金和流动资金，造成企业争投资、争资金，而争来以后又不能合理而有效地使用，形成积压和浪费。1965年苏联改行新经济体制时，规定企业使用固定基金及定额流动资金的付费制度。基金付费的具体提取办法是：根据企业生产固定基金（不扣除磨损）的原始价值（个别部门，如石油工业则按残存价值）和定额流动资金的年平均定额价值的一定比例即付费率（基金付费率一般规定为生产基金总额的6%），把一部分利润上缴预算。实行基金付费制度，主要目的是促使企业改进生产基金的使用。实行基金付费，有利于用经济方法来管

理经济，并在使企业的权力和责任统一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企业一方面有权使用拨给的生产基金，而另一方面又要对使用基金的效果负责。由于基金付费的来源是利润，因此，资金使用的好坏又能与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有利于生产者改进资金的利用。实行基金付费的另一个目的是，力图拉平不同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条件。生产基金不付费，生产设备好、基金占用多的企业在经济上就处于优越的地位，而规定了基金付费制度，这类企业势必多付费；反之，设备差、占用基金少的企业则少付费。这样做，还便于按实际经营成果来考核企业。就其实质而言，基金付费是企业与国家之间分配利润的一种形式。它同过去上缴利润的提成形式不同。利润提成完全取决于企业获得利润多寡，而基金付费不管企业利润多少，都要首先缴纳。这样，基金付费的数额反过来直接影响企业实际利润额。企业只有从总利润额中扣除上缴的基金付费及其他缴款之后，才能提取企业经济刺激基金。这就使企业关心有效地使用基金，以最少的基金来完成生产计划。为了刺激企业用自己的资金来扩大生产，采用新技术，苏联对基金付费还规定了一些优惠措施。固定（地租）缴款。这项缴款，主要是采掘和加工工业部门，因所处自然、地理、运输和其他条件的优越而获得的收入的一种缴款形式。采取这种缴款制度，可以把不是由于企业的努力而获得的那部分利润征入国家预算，同时可以消除盈利率悬殊，避免因盈利率过高而不关心改善经营管理的情况，也为客观地评价企业经济活动创造条件。苏联采用企业利润与部门平均利润之间的差额（超过部分）作为确定固定（地租）缴款的标准。计算固定（地租）缴款的办法取决于应征产品的种类。闲置利润余额缴款。所谓闲置利润余额，是指企业获得的利润总额中，除去企业的各种义务缴

纳、向银行支付贷款利息以及按规定建立经济刺激基金以后所剩下的那部分利润。闲置利润余额缴款是最终使企业经营条件均等的一种利润缴款制度。其目的是把超出企业资金需要量的那部分利润征入国家预算。

三是国家财政对企业拨款制度的改革。长期以来，由于企业利润基本上全部上缴，因此，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靠国家财政的无偿拨款。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经济改革时，强调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与企业经营活动结果之间要挂钩，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利润留归企业，这样，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家财政拨款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长期贷款。但是，财政拨款一直是企业增加固定基金的一项重要来源。

四是企业内部的利润分配和使用制度改革。在前面，我们着重从企业向国家财政的缴纳制度和国家对企业拨款制度两个方面，论述了苏联国家与企业在分配企业创造的纯收入方面的关系。但是，从财政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关系，还必须进一步分析企业上缴后所剩下的、留归企业支配的那部分利润的分配和使用制度。因为，这对在财政上保证企业权限的扩大，调动企业集体和广大职工积极性有直接的关系。1965 年之前的企业基金或经理基金，总的来说，在刺激企业集体和职工个人的生产积极性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主要缺点是：首先，由于基金数额太小，加上有半数的企业没有能力靠自身的利润来建立这项基金，所以，就很难发挥这项基金的刺激作用。其次，在基金形成制度方面又有严重缺点，即超计划利润的基金提成定额大大高于计划利润的基金提成定额。这就导致企业有意压低计划任务，为超额完成计划提供方便，以便更多地提取基金。1965 年，苏联下决心搞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想解决经济管理体制中存

在的企业缺乏自主权，在经济管理中过多地使用行政命令，以及企业和职工不关心整个经济成果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解决从物质利益上刺激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问题。

另外，改革要使企业的每个车间和工段，以及全体职工，不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且还要关心改进企业工作的总成果。为此目的，苏联在体制改革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一些奖励制度，使物质刺激制度有利于使每个职工和生产集体关心企业生产经营总成果。通过经济改革，一方面要着重解决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刺激，调整留归企业支配的那部分利润的分配和使用制度。勃列日涅夫力图通过改革建立各种经济刺激基金来调整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企业经济刺激基金包括：物质鼓励基金、社会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设基金及发展生产基金。

具体来讲，物质鼓励基金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根据批准的奖励条例，对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进行奖励；对在完成特别重要的任务中表现出色的优秀职工的一次性奖励；支付给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全年工作总成果奖金；对企业职工进行一次性补助。经济改革后，随着物质鼓励基金的增加，奖金在职工工资中的比重也从1965年的8.7%，后来逐步提高到16%。社会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设基金就其经济内容而言，属于社会消费基金的一种形式。所不同的是，一般社会消费基金是通过国家预算对国民收入再分配来形成的，它为全国居民服务；而企业设立的社会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设基金，是在一个企业范围内使用和分配的，是改善该企业职工劳动和生活条件的主要资金来源，它是靠该企业的利润提成建立的。

社会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设基金的具体用途是：建设、

扩建和大修企业职工住房、文体卫生和食堂等工程项目，以及购买与上述各项工程有关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设备、器材；支付文化教育、体育运动、医药卫生和生活服务等措施的费用；增加幼儿园、托儿所、少年营的儿童营养，补贴职工食堂伙食费。

发展生产基金是专门用于改善和发展生产的基金。当时苏联党和政府认为，要加强企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如果国家不给企业以足够的资金用于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用于设备现代化，那么，就不能实现企业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苏联党和政府还考虑到，随着科技进步，生产条件变化也很快，很多问题需由企业独立自主地解决，不能都依靠国家预算拨款，这也需要在企业设立专门的基金解决这一问题。发展生产基金的主要用途是：采用新技术、设备现代化和固定资产更新；偿还银行提供的采用新技术贷款；完善劳动和生产组织；发展生产的其他投资，如扩建生产用房、生活住房和仓库以及组织日用消费品生产等等。发展生产基金在经济刺激基金中的比重日益提高，后来占首要地位，1982 年工业企业的发展生产基金占当年经济刺激基金总额的 42.9%，它在刺激企业改进生产和经营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另外，为了适应扩大企业自主权与刺激其积极性的要求，在推行新经济体制时，苏联对物资技术供应体制与工业品批发价格制度也做了一些改革。

应该说，对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起步阶段的苏联来说，勃列日涅夫推行改革的三项原则与目标，具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勃列日涅夫一上台，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改变落后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抑制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他对改革还是持积极态度的。由于这些因素，在勃列

日涅夫执政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经济状况要明显好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第七个五年计划（详见表1）。

表1 "八五"与"七五"计划时期苏联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年均增长率）

单位：%

	1961～1965年	1965～1970年
社会总产值	6.5	7.4
国民收入	6.5	7.8
工业产值	8.6	8.5
农业产值	2.2	3.9
基建投资	5.4	7.3
社会劳动生产率	6.1	6.8
居民人均实际收入	3.6	5.9
国民经济盈利率	8.0	15.4
零售商品流转额	6.0	8.2
对外贸易额	7.1	8.3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纪念统计年鉴），俄文版，1987，第51页。

从表1可以看到，在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八五"计划时期，从总体来看，经济形势有好转，一些综合性经济指标（除工业产值外）年均增长率要高于上个五年计划，从"八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增幅来看，一些重要指标也高于上个五年计划，如社会总产值"八五"和"七五"分别增加了43%、37%；国民收入的增加分别为45%与37%；农业产值的增加分别为23%与12%。[①] 俄罗斯学者菲利波夫对第八个五年计划的评价是，它"是作为斯大林时代以来最成功的一个五年计划载入苏联

① 根据苏联有关年份公布的统计资料。

历史的"。他在分析上述成效的原因时指出："尽管犹豫不决和保守主义不允许改革者的计划得以彻底地实施"，但"新办法开始在绝大部分工业企业实行，并波及运输业和其他一些国民经济部门"，因此，"到1960年代末期，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①] 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个时期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早期"，他懂得改革的必要，"他与柯西金一起进行了在农业与工业方面的某些改革，使得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至少从开始实行五年计划以来）"。[②] 但俄罗斯学者也注意到，这个时期的改革，并没有使传统体制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后来，改革实际上停了下来。

①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67页。

②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72页。

三　经济改革停滞不前

客观地讲，勃列日涅夫在执政的头几年，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社会经济情况较好。从勃列日涅夫本人来说，执政初期，他对问题的处理也持谨慎的态度。然而，就在这一时期，随着其领导地位日趋稳固，他的一些亲信逐步进入各级领导岗位，依赖旧体制生存的既得利益的官僚权势阶层和反对改革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作为本质上保守、怕承担责任，以及从来不想对传统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勃列日涅夫来说，一方面，越来越自信，并发展到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对改革的态度开始消极起来，乃至最终取消了改革。自 1971 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改革”一词了，而改用“完善”一词，认为苏联对原有的体制不需要改革。俄罗斯学者说得好，这一改变标志着苏联步入“停滞”期。

1. 经济改革停滞的突出表现

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兜圈子，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则是在减少还是增加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扭来扭去；他们均未跳出传统体制的樊篱。改革停滞在工业领域的突出表现

是，原来确定的三项改革目标未能实施。

首先，在现实经济中经济规律受到极大抑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没有改变按行政指令下达计划任务的传统做法，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往往被严重忽视。加上苏联长期存在的随意给企业下达指标的做法，使得计划难以符合市场需要等客观条件。同时，苏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一般是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条例、法令等行政措施加以解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各种指示和规章数以千计，无数繁琐的规定，不仅使人们难以了解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而且严重束缚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第二，企业自主权问题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解决。经过改革，企业自主权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但并未得到实际解决，企业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据苏联调查，大多数经理认为，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权限太小，即便是企业条例中规定的一些权限也经常遭到上级机关的侵犯。这一直是苏联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苏联著名学者 A. 阿甘别基扬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中说："被调查的 1064 名大企业经理中，有 80% 的人认为，各级机关仍然像以前一样，侵犯企业权力；90% 的经理认为，企业权力太小，今后必须面临一整排军官们指挥的士兵，而当其中一个军官下达'前进'的命令时，另一个军官却高喊'卧倒'！……"[①] 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得不到实际解决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从计划制度来看，尽管减少了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指标，但一些主要指标仍由国家控制。而且，减少下达指令性指标的数量，毕竟还只是量的变化，并没有使计划制度发生质的变化。二是改革以来，企业的法律地位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未得到解决，企业实际

① （苏联）《工业生产的经济与组织》1975 年第 5 期。

上仍面对几十个“婆婆”，各上级机关不时地发出各种指示或某些禁令，但对企业执行它们的种种指示所需要的资金和条件却不加过问，而且对执行它们的指示的后果也不负任何责任。苏联报刊发表不少文章，要求从法律上切实解决企业地位问题，制止各机关任意指挥企业的做法，并强烈要求每个企业只能有一个上级领导机关，其他单位都只能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三是没有解决企业实现经营自主权的客观条件。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和主动性。

第三，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仍处于矛盾状态。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经过改革，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有了一定改善，但在不少场合下，这三者之间仍然矛盾重重，并没有很好地协调起来。从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来看，主要是通过物质刺激来提高劳动者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改革后，虽然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奖金，但奖金对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并没有起多大作用。长期以来，由于没有真正解决奖金与企业的最终成果挂钩的问题，奖金慢慢成为固定的附加工资，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另外，一些企业领导人经常利用职权和非法手段捞取奖金。这些都使得奖金难以起到调整企业和职工利益关系的作用。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由于行政手段领导经济仍然盛行，造成行政领导不顾企业自身利益，强制企业去从事行政领导认为社会需要的各种经济活动，由此造成企业严重缺乏经济动力。

从农业领域来讲，勃列日涅夫一上台首先进行了改革，但原来高度集中的统制农业的思想与体制并没有大的变化。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强调的是，加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致使苏联农业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问题未能改变。“左”的

教条，即生产资料越公越先进、生产规模越大越优越的思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仍占统治地位。这突出反映在不断合并集体农庄，把农庄改为国营农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集体农庄由 1965 年的 36300 个减至 1982 年的 26400 个，而国营农场在上述时期由 11681 个增加到 22000 个。对农业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实际上不加区分。国家对它们下达一样的指令指标，领导人均由上级委派，不尊重农庄的自主权利。二是在管理体制方面，特别在农业计划制度方面，虽然在农业改革时明确规定国家只下达主要农产品的采购量，但实际上，农庄、农场并未摆脱上级机关的琐碎监督，仍然是从上到下，从共和国的部，经过州和区的机关，向农庄、农场下达播种计划、牲畜头数，有时甚至闹到向农庄下达母猪交配任务的荒谬程度。[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庄、农场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只是一句空话。三是农业劳动者实际上无权参与生产与经营活动。尽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曾批评由于农业劳动者无管理权，农庄理事会流于形式，从而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但这个问题一直到勃列日涅夫 1982 年逝世时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农业生产在自然、气候等十分多样化的条件下，特别需要农业生产者的主人翁态度，要给予他们作出决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的可能。由于农庄农场缺乏真正的自主权，农业劳动者又没有民主决策权，在这样的情况下，物质刺激并不总是能把积极性刺激起来。

阿尔巴托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体制改革的总体评价是：“到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在斯大林专制的艰难年代中保存下来的向前发展的潜力看来已经耗尽。而苏共二十大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人》1982 年第 2 期。

所激发的，而在随后的岁月中被保守主义的灭火队竭力加以扑灭的那股新的热情也已逐渐泯灭。1964 年上台的领导人甚至不想去使国内政策恢复活力。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法所代替。"[①]

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认为改革已经失败的议论多了起来。有的学者在《真理报》公开发表文章说："往往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似乎经济改革已经失败，不得不放弃这一改革。"[②] 西方学者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改革的评价比较一致：一方面认为，1965 年的经济改革完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认为，这次改革和后几年实行的改革措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触动了经济计划和管理方式的具体安排，更多的是改变了计划和指标等表现形式，没有触动苏联经济运转机制。谈到改革成效时，西方的一般的评价是：收获甚微。1977 年 12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全国国际情况估计中心编写的《苏联经济的组织与管理——无止境地寻找灵丹妙药》的研究报告，与美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布鲁斯亦持类同看法，认为苏联 1965 年的经济改革，其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2. 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1）"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大背景

1967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③] 后来，把发达社会主义与逐渐发展为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266 页。

② 《真理报》1977 年 11 月 10 日。

③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3 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 190 页。

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勃列日涅夫在1977年10月4日所做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及全民讨论的总结”报告中作了论述。他说：“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着手进行共产主义建设。”他解释说：“苏联现在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新社会达到这样一个成熟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内在和固有的集体性原则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的改造即将完成。从这里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规律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以及社会主义生活各个领域显示其优越性的广阔天地。从这里可以看到社会制度所具有的有机的完整性和活力，以及它在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在统一性。从这里可以看到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团和各民族在日益接近，人们在我国结成了历史上崭新的国际主义的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从这里可以看到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诞生和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确立。”[①] 自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并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理论后，可以说，有关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充斥着苏联的出版物，真可谓连篇累牍。这些论著都在强调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性、社会的一致性和矛盾的统一性。有鉴于此，苏联所需要的是发达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可见，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也不认为需要进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说根本性的改革。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所通过的各项有关经济改革的决议、决定，就可以发现，在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都强调不能影响国家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1965年，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有关决议中指出：“统一的国家计划对所有企业、组织的活动，对苏联人民的集体劳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300~301页。

动，发挥保证和指导作用。”“进一步改进工业的计划领导，是解决这些任务的最重要的条件。”① 到了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勃列日涅夫还强调：“经济管理上的集中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② 从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来看，有的措施是为了加强管理的集中，如建立联合公司，虽有多方面的目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为了使经济更加集中和加强集中管理。

另外，就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客观条件而言，也容易使改革朝着原来设想的原则的相反方向发展。在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经济面临很多困难，经济紧张并混乱，市场供应严重不足，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等。就是说，当时苏联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很多，改革的任务又非常广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解决这些问题，往往就会较多地利用行政手段，加强集中控制。这样，使扩大企业自主权、更多地利用经济方法的经济改革方向，容易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出现倒退的现象。

（2）理论上的教条主义

在理论方面，主要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左”的教条主义。苏联各届领导，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对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勃列日涅夫也显得十分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也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5卷，第684页。
②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3集，第130页。

日涅夫时期，对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像灭火队一样很快把它压下去了。纵观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的思想理论，从大的方面即社会主义模式来看，仍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处于“成熟”，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这也是“左”的教条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勃列日涅夫时期“左”的教条主义反映在许多方面。他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十分卖力的，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是最起劲的。在批判时，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影响最大和最为直接。与“市场社会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涉及商品货币关系理论问题。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这一理论问题上有了一些进步，不再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画等号，而是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观点是：第一，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属性，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是直接社会关系，商品关系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第二，直接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商品关系是形式。第三，在强调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又强调它的“新内容”、“新特征”。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一切作用都要通过计划来实现。第四，与第三点相联系，不恰当地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特殊性，忽视其共性，从而导致否定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是“新内容论”。“新内容论”的实质是，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体系之中，具有计划性的特点，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勃列日涅夫时期坚持认

为，市场调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邪说”。它会使中央计划机关只起情报中心作用，它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实际上会使经济离开党和国家的政策，造成经济混乱。1979 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发表文章强调说：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①

在对于“市场社会主义”展开批判之后，少数学者如利西奇金、列昂捷夫主张市场调节的观点，也就销声匿迹了。在这种理论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有重大进展，更不可能使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取向，而只能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的范围内进行修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一直坚持全民所有制是最高形式和最先进形式的观点，并认为，经济改革不涉及改变所有制形式问题。因此，在改革有关生产资料实际由谁来支配、决策和使用问题上，与改革前没有什么区别，在理论上也没有深入展开讨论。关于领导经济的方法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理论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过程中，竭力主张不要削弱行政方法的观点一直占主导地位。并且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抓住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对经济方法进行批判，似乎经济中出现的问题都是由于强调经济方法而造成的。

从苏联经济改革的历史来看，围绕改革展开的理论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探索的问题越来越狭窄，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日益采取回避的态度。

---

① （苏联）《经济报》1979 年第 26 期。

因此，讨论问题的气氛也远远没有改革一开始那样活跃。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一些代表官方观点的经济界“权威人士”，经常对一些新提出的理论加以批判，并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把争论压下去。这种情况，很难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发展。

（3）经济改革引发的权力之争

从本质上讲，经济改革是对既定利益格局的重要调整。因此，势必要涉及各个系统、各级领导之间的权力再分配。在苏联，由于官职、地位和权势与物质利益是密切结合的，因此，改革实际上也会导致物质利益的再分配。

从苏联中央最高领导层来看，现行的管理体制虽有不少问题，但在这种体制下，可以通过国家计委、价格委员会、供委和财政部等这样一些中央经济机关，把全国的经济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苏联害怕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会从根本上破坏以高度集中计划原则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从而影响到资金聚集到国家预算中来，减少国家集中调配全国的物资和资金的可能性。而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可使全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都隶属党和国家机关的指令之下，这尽管大大限制了人民实行民主管理的可能性，影响了地方和广大生产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却是实行集中控制经济的有效方法。

从各管理机关与企业的关系来看，自改革开始后，围绕权力问题的斗争和争论从未停止过，有关各方经常在报刊上互相指责和质问。矛盾的焦点是，企业要求扩大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认为权力小是妨碍提高积极性和经济效率的主要障碍；而计划管理等机关则认为，企业工作没有搞好，主要不是由于权力小的问题，指责企业是用客观原因来掩盖自己由于经营不善而带来的损失。苏联报刊经常透

露：许多主管部门反对对其权力给予任何法律上的限制，一直喜欢发号施令，“俨然以管理机关自居”，竭力反对扩大企业权力。

从执行决议来看，由于涉及权力和利益问题，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效。例如，在苏联，长期以来存在破坏供货合同的现象。1973 年，由于破坏合同而引起的财产纠纷事件比 1965 年增加了 50%，每 4 个供货单位中就有 1 个破坏合同。为了加强经济纪律，在 1974 年 3 月公布了有关企业不执行合同必须罚款及其主要领导人不能获得奖金的规定，但由于遭到企业经理和一些主管部门的抵制和反对，一直到 1978 年 1 月，即经过了 4 年多的时间才开始执行上述规定。在这个过程中又经过不断修改，留下了很多空子，使这一规定起不了多大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苏联决定通过合并企业和撤销管理局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联合公司，把原来的四到六级工业管理体制改组为二到三级，这使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联原计划要在 1975 年在工业领域普遍建立联合公司，但到 1975 年底，联合公司的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 24.4%。1976 年苏共通过的决议中，又明确规定，到 1980 年要完成建立联合公司的任务，但到 1980 年联合公司的产值还不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从联合公司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争夺权利的斗争也日益发展与尖锐化。苏联的各个领导层，从自己切身的利益考虑，想方设法阻止建立联合公司。这种斗争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企业领导人不愿意放弃领导独立企业的权力。通过合并中小企业建立联合公司的办法，首先触动企业领导人的利益。因为，参加联合公司后，按条例规定，这些企业在法律上失去了独立性，即失去了法人的地位，从而变成了公司的分支机构或车间。这种情况下，原来这些企业

的经理、厂长，不过是一个车间主任而已，权力大大受到削减。因此他们竭力想保持原来的地位。苏联报刊公开批评这些领导人不愿失掉自己独立性的做法，是为了维护“个人威望”，“要保‘当家人’的地位”，不愿失去“直接接触上级领导的权力”，等等。另外，尽管苏联一再强调，加入联合公司的原企业领导人和专家，不会受到物质上的损失，但实际上往往发生由于企业合并而使得他们的劳动报酬有所降低的情况。这一情况，使企业领导人对加入联合公司采取抵制态度；不少企业就是在参加联合公司之后，仍然闹独立性，不愿失去法人地位。据透露，组建联合公司以来，一直有50%到60%的企业在参加联合公司后仍保持独立性。这样，实际上联合公司把一切技术、经济活动和法律上的活动权继续交给原工厂的经理来行使。苏联当局认为，“这一切只能看作是对建立生产联合公司基本思想的抛弃”，使联合公司徒有形式。

二是总管理局的领导人怕丢掉职务而不甘心撤销总局。随着撤销总管理局这一措施的实施，就会有大批干部调动，甚至发生大换班。例如，原煤炭工业部作为中间环节的各管理总局就有59个，建立联合公司后缩减为7个。这一层的管理人员要从8000人减到75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领导人。这样改组以后，势必有不少领导人会丢掉领导职务。另外，苏联一再强调，在现代化的生产条件下，要求有高度科学文化的专家来当领导。尽管当时苏联工业管理部门的领导人很多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但仍然有一部分是凭资格或某些社会关系而占据领导岗位的。对这些人来说，原来在脱离生产的总局还可混得下去，一旦到生产第一线领导一个直接指挥生产的联合公司就困难了。还有一些党政干部必然要调离原来的岗位，去做不熟悉的工作。因此，取消总局，自然会引起这层领导人的不满和

反对，直至对抗。

三是部不愿交出自己的企业和权力。按规定，建立联合公司后，工业各部在管理和计划方面的权限要缩小，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部门发展远景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根本问题，以及完善计划体制和管理方法”等。另外，有不少联合公司是跨部门的，因而有些企业就会转到另外的部门去。再加上原独立企业参加联合公司后，产值的重复计算减少了，从而最后从整个部的角度来看，总产值指标会降低，这会影响基金的提成。这些因素，都使得部不积极建立联合公司，对制定联合公司的总方案工作也一再拖延。

四是地方行政机关怕丢掉自己的企业而反对组建联合公司。联合公司是以生产同类产品的部门为原则而建立的，往往是跨地区的。大的联合公司可以包括一个州、一个边疆区、一个共和国甚至全国范围内的一个部门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企业。各级地方行政机关都无权插手联合公司的事情。这样，地方利益受到很大影响。如原属地方的生产日用品的企业，缴纳的税收大部分属于地方财政收入，而当企业参加联合公司后，地方的财政收入就要减少。据苏联报刊透露，这一矛盾在闹得厉害的时候，财政部不得不对地方机关采用财政补贴的办法来缓和矛盾。又如，地方企业参加联合公司后，就会有部分产品运出本地区，地方机关失掉了支配权。再有，地方机关过去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从其所在地区的企业捞取各种实惠，像占有企业用自己的基金建筑的住宅（尽管这是违反企业条例的)，经常让这些企业为本地区完成某些工作，等等。由于这些非常实际的利害关系，地方机关不愿失掉这些企业。苏联报刊在谈到地方机关阻碍建立联合公司的态度时认为，它们有时比主管部门“还要顽固”，一再提出要与

狭隘的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作坚决斗争。

苏联中央领导层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精简管理机构，面对出现的各种阻力与矛盾，往往用党性、服从国家利益以及加强政治工作等办法来说服中下层干部，尽力糅合矛盾，适当调整分享的权力以减少阻力。但是，上述种种矛盾，在官职和物质特权不可分的体制条件下是很难克服的，谁都不会轻易放弃能带来利益的权势。

（4）“布拉格之春”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不仅反对在苏联国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把他的模式推行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苏联把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出发点是：确保苏联在欧洲与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安全和优势地位；挡住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东欧地区的影响与干预；建立一个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应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其最终目的是，把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国家。因此，苏联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仿效它先搞国有化，搬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搞斯大林式的工业化，进行农业集体化。其结果是，严重束缚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按东欧各国综合计算，经济年均增长率由1960～1965年的4.1%下降到1979～1983年的0.3%；其中，波兰是负增长1.2%。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推行改革的影响下，东欧各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都是修补性的。因此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日趋严重，这使东欧国家一些领导人意识到不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难以解决根本问题。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的改革，是东欧各国挣脱苏联束缚的明显标志。

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总产值增长率已降至0.54%，工、农业发展水平大大低于战前，外贸逆差大大

增加，职工工资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力量日益增长，1963 年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全国性的经济改革委员会，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是与中央各部平行的机构。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改革委员会提出了经济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在推行这一改革方案时，遇到了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的下台。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诺沃提尼认为，赫鲁晓夫下台主要原因之一是搞了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为此，决定把改革方案推迟到 1966 年实施。1965 年 1 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一方面认为现行体制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又认为今后的体制改变不过是“完善”，还“必须利用现行体制的优点”。到 1967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已面临严重困境，从而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期间，在捷共党内，改革与反改革势力的斗争也日益尖锐。斗争的结果是，诺沃提尼于 1968 年 1 月 4 日被解除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接着，诺沃提尼于 3 月 22 日又被迫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

新领导上台后，1968 年 4 月 5 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纲领，一般称为《行动纲领》。该纲领的实质性内容是：首先要求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实现党内民主化。《行动纲领》指出：“过去，常常把党的领导作用理解为把权力垄断性地集中到党的机关手中。它符合了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这种错误论断。这一有害的概念削弱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和责任心，损害了党的威信，使它无法履行自己最本质的职能。”纲领还强调：党不能垄断一切社会权力，必须实行党政分开。“党的目标不是当社会的‘总管家’。”其次，《行动纲领》强调，要进行以反对国家权力

垄断化与集中化，实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该纲领提出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应该是“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新模式”。纲领还认为，必须确保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社会主义社会应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原则，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行动纲领》指出，经济发展缓慢、比例失调与效率低下等问题，是由苏联模式产生的，因这个模式排斥了市场的作用。因此，主张经济改革要着重解决市场与计划、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企业要实行工人自治与民主管理。总之，这份长达63页的《行动纲领》文件，涉及很多内容，它是推行政治与经济体制全面深刻改革的纲领，“它的基本论点是承认有一条特殊的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否定了勃列日涅夫坚持的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观点，声称：党坚决谴责想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级和阶层相对立的企图……党将努力消除可能使各阶级和阶层间关系紧张的一切因素”。①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的改革，说到底，是要从根本上走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与斯大林在二战后强加给东欧各国的体制模式决裂。这样的改革目标，必然遭到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反对，并最后决定出兵镇压。这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明勃列日涅夫是根据斯大林留下的意识形态行事的。在他看来，任何背离苏联模式的行为，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与犯罪。因此，他确信：如果不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或至少是会损害自己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地

① 〔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张振第等译，新华出版社，1983，第431页。

位”。他曾对当时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契尔年科说：“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倾向胜利，他就只好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①

1968年，苏联一方面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导致走与苏联不同之路的危险，遂在镇压结束后的9月2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的文章说，捷共的改革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被推上反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这一年苏联国内保守分子异常活跃，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不赞成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浓。按照阿尔巴托夫的看法，在“1968年初，莫斯科已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放弃二十大的路线”。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苏联推行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阿尔巴托夫谈到1968年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国内改革的影响时指出：“它在助长国内的保守趋势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趋势最终导致了一个停滞时期。”

（5）因循守旧、求稳抑变

纵观勃列日涅夫18年的体制改革，不难发现，改革一直是在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为什么上述思想占据了支配地位，大致有以下三个因素。

首先，从勃列日涅夫传记等有关文献看，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周围的人，强烈地表现和反映出小市民的气质、小市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甚至小市民的某些“天性本能”。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之辈，文化水平不高，不爱学习，思想上与理论上保守僵化，性格上软弱，特别爱好虚荣与阿谀奉承，生活上贪图安逸，爱好打猎，喜欢驾驶西方进口的高

① 本段及下段，分见〔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88～189、185、184页。

级轿车。在苏联，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幽默：勃列日涅夫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看见他儿子丰富的汽车收藏后，担忧地说道："噢，这些东西太漂亮了，我亲爱的儿子！不过，要是布尔什维克回来了，那该怎么办？"勃列日涅夫工作上不勤奋刻苦，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他最大的一个弱点是，对新生事物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还应指出，勃列日涅夫思想守旧，缺乏经济知识，要准确地说出一个经济术语会很困难，这与他不爱学习理论有关。他对给他写讲话稿的助手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勃列日涅夫常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他甚至删去经典作家的引语），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①] 勃列日涅夫作报告的一贯风格是："四平八稳，既无高潮，也无水平，无聊乏味，一本正经。"[②] 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期待他不时地出现新思想，不断地改革传统的体制。

其次，勃列日涅夫的专长是搞组织工作，操纵权力可谓得心应手。在他上台初期，他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积极培植亲信，在排除异己方面很快取得进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的地位与权力，在最高领导层中已明显地高于其他人。之后，到了70年代，随着苏联国力的增长，特别是军事力量的膨胀，勃列日涅夫对苏联的形势估计十分乐观，并不认为苏联需要什么改革，还是认为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十分有效的，对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政策不满。据苏共中央机关的干部回忆，当时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报告说过以下的话："看他想出什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37、333、162页。

② 〔西德〕米夏埃尔·莫罗佐夫：《勃列日涅夫传》，第370页。

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①] 到了1974年勃列日涅夫成为一个病人之后，更不能指望他来推动改革，整个体制改革像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和这个国家一样，朝着停滞方向发展，不断地滑坡。

第三，如果说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既不反斯大林又不反斯大林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里，人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把掌握权力看作目的本身，不想改变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因为没有这个体制就难以保证他“个人专政”或者说个人专权和特权。而不触动政治体制，不把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政治体制就必然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而且相反，会日益成为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已为所有转轨国家的实践证明。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对此，阿尔巴托夫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有一种越来越清楚的现象，那就是大部分领导人倾向于倒退。”[②] 因此，体制改革必然难以推进，这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明显地表现为对传统体制不是采取根本改革的方针。

（6）实行对外扩张、争霸世界的政策

如果以苏美关系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来考察，应该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由于国内与国际诸因素的制约，出现了一定的缓和，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缓和有了较大发展。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主要是加强控制。特别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出

① 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②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64页。

现了作为控制东欧各国的理论“勃列日涅夫主义”，尤其是“有限主权论”与“国际专政论”等，像悬在东欧各国头上的一把利剑。对第三世界则是加强争夺与渗透，当然这是在支援这些国家革命、民族独立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对华政策方面，继续推行反华路线，在中苏边境增兵，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就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外政策的整个内容来看，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缓和政策所取得的成效逐步丧失，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 80 年代初，已经从缓和进入第二次“冷战”。这一时期的缓和被称为短命的和不走运的缓和，究其原因，主要与苏联实行扩张、争霸的政策有关。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继承了斯大林的传统。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加，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在后期，扩军、争霸的政策大大发展了。苏联对别国不断进行军事干涉就是例证。阿尔巴托夫指出，这个时期，“在安哥拉之后，我们沿着这条显得已经蹚平的道路大胆前进，实际上是沿着干涉升级的阶梯前进。这些阶梯就是——埃塞俄比亚、也门及一系列非洲国家（我不想涉及近东问题，它十分复杂，应该由专家研究），最后是阿富汗”。这样做的结果是，“在 70 年代下半期我们自己对一系列国家的事务实行军事干涉和‘半干涉’的政策，我们国家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的侵略国家，促使大量国家起来反对我们自己，并且给缓和带来严重的打击。实际上我们是在给美国极右派伴奏”。而推行扩张、争霸政策，必然使苏联“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施许多军事计划。在这些年内我们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很少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①]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273、279 页。

苏联推行扩张、争霸的对外政策，就必须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使“军工综合体膨胀到不受政治控制的程度”。[①] 据一般公认的估计，苏联这一时期的军费开支与美国相当，甚至还超过美国，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美国的50% ~60%。如何保证巨额军费开支所需的资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重要的保证条件。苏联通过这种体制，把大量的资金集中在国家手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1966 年占 51.3%，勃列日涅夫逝世的 1982 年提高到 67.4%。[②] 另外，苏联为了把更多的资金集中到国家预算中来，预算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得多。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几年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79 年苏联国家预算收入增长率为 5.9%，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为 2.2%，1980 年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分别为 7.5% 和 3.8%，1981 年为 5.9% 和 3.8%，1982 年为 10.1% 和 2.6%。[③] 把那么多的财政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便于集中用于发展军工和与军工密切相关的工业部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如以工业投资为 100，那么其中甲类工业一般要占 85% ~88%。国家掌握了大量资金，还保证了迅速增长的军费支出的需要。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把苏联的军事实力推向“鼎盛”时期的。

3. 经济改革停滞的严重后果

改革的停滞，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停滞。勃列日涅夫时期，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全面的停滞，当然它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280 页。
② 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 636 页。
③ 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 637 页。

有个发展过程；第二，是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开始了新的科技革命的条件下，这种停滞并不只是意味着原地踏步，而是出现了倒退；第三，停滞的结果，使苏联逐步迈向衰败。利加乔夫认为，这个时期的苏联，“已处在通往社会经济绝境的轨道上”。[①] 这里，我们主要分析经济改革的停滞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

（1）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和停滞

1965年，勃列日涅夫在推行新经济体制时，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是：力图通过改革，来扭转已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但结果是，18年的改革，不仅没有改变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反而使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在1971～1985年的3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其他一些综合经济指标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见表2）。

表2 苏联经济增长率情况（年均）

单位：%

	1966～1970年	1971～1975年	1976～1980年	1982年
社会总产值	7.4	6.3	4.2	3.3*
国民收入	7.8	5.7	4.3	2.6
工业总产值	8.5	7.4	4.4	2.8
农业总产值	3.9	2.5	1.7	4.0
基建投资	7.3	6.7	3.7	2.0

* 为1982～1983年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纪念统计年鉴），第51页；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4年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86，第355页。

从表2可以看出，从70年代初开始，经济增长率日益下降，特别到80年代初，速度已下降到使苏联“几乎

① 《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8～9期。

临近停顿的程度”。[①] 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 1982 年，国民收入比 1981 年仅增长 2.6%。以上的数字均为官方公布的，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1966～1970 年为 5.1%，1971～1975 年为 3%，1976～1980 年为 2.3%，而按苏联学者估计以上 3 个相应时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1%、3.2% 与 1.0%。[②]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88 年）上的报告指出：80 年代初，苏联经济缓慢的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正常的基础上，靠一些临时性的因素达到的。这指的是靠当时国际市场上的高价出售石油，大量生产和出售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酒精饮料达到的，如排除这些因素，差不多有 4 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国民收入的绝对额没有增加。

这里，我们完全从增长速度来考虑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的经济停滞趋势。问题是，这个低速增长，也并不能反映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的实际情况。正如前面提到的，其中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猛涨起了很大的作用。人所共知，在 1973 年爆发的中东战争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石油价格提高了 19 倍，原料价格提高了 7～9 倍。从 1969 年起的 10 年期间，石油开采量增加了 9 倍。[③] 这里不能不提及，70 年代初苏联石油增产主要靠西西伯利亚油区即秋明油田的情况。1974 年，秋明油田石油产量为 1.16 亿吨，到 1980 年为 3.12 亿吨，占全苏石油产量的 50% 以上。苏联当时作为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之一，借机大量出口石油。据统计，1974～1984 年，苏联仅从出卖石油与石油产品获得的收入，最保守的估计也达到 1760 亿外汇卢布，约

①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 14 页。

② 转引自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1991，第 104 页。

③ 〔俄〕菲利波夫：《俄罗斯近代史》，第 171 页。

折合 2700 亿～3200 亿美元。[1] 这笔巨额“石油美元”对当时苏联渡过经济难关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停滞和下滑的严重性，缓解了种种矛盾。有人说，这里不存在掩盖不掩盖的问题，因为石油产量和出口量的激增是客观事实。但是，问题在于，石油价格上涨 19 倍，比石油产量和石油出口量的增加幅度不知高出多少倍。据苏联统计资料，石油产量从 1974 年的 6.56 亿吨增加到 1984 年的 8.76 亿吨，增长了 33.5%。1974 年石油与石油产品出口量为 1.16 亿吨，1985 年为 1.67 亿吨，增长了 43.5%。[2] 非常明显，如果这个时期不是石油价格飞速上升，单靠石油产量与出口量的增加，绝不可能获得如此大的“石油美元”。正如马龙闪研究员指出的：“这笔收入在以总产值指标衡量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也掩盖了苏联 70 年代中后期经济的停滞与衰退，它像雨后天空的彩虹一样，给苏联经济以虚幻的繁荣。待短暂的彩虹逝去，依然是飘散着片片乌云的天空。”[3]

阿尔巴托夫曾分析说：当时苏联应该把这种赚取石油外汇视为一个喘息时机，并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个时机推进改革，使国民经济走上正轨，但苏联并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他接着又指出：“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不论是我还是我的许多同事都不只一次地想到，西西伯利亚石油挽救了我国经济。而后来开始得出结论，

① 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 195～196 页。

② 由于 1984 年的数字未能找到，这里石油与石油产品出口量用的是 1985 年的数字。

③ 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第 196 页。

这个财富同时又严重破坏了我国经济，它使我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许多时间，长久地推迟了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改革。”他还说：“那时我们把载能体出口无限度地增长，从这里找到了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那时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懂得‘不是挣来的财富最容易使人腐败’这句古老的谚语，不但适合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家。”①

以上的材料与分析说明，在判断苏联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情况时，应该看到，1973年以来，因石油飞速涨价而获得的巨额“石油美元”所起的作用。没有这个因素，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经济完全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2）农业问题十分突出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农业体制作了一些改革，并且扩大了对农业的投入。1973～1982年，农业投资在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投资总额中占到27%左右。如果把与发展农业直接相关的化肥、农药、农机、混合饲料、微生物工业部门的投资计算在内，农业投资要占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30%以上。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农业投资的数额，在世界各大国中居首位，它要比美国多4倍。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由于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农业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投资大、效益低，生产稳定性差、波动幅度大，仍是苏联农业的基本特点。

就粮食产量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就有10年减产。有些年份减产幅度很大，如1975年比1974年减产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00～301、299页。

5560万吨，1979年比1978年减少5790万吨。粮食产量也经常达不到计划规定的指标。更为严重的是，1979～1982年，出现连续四年歉收，这是创历史纪录的。这一情况完全打破了苏联粮食生产的一般常规，即在三年中，一年丰收，一年平年，一年歉收。

农业连续多年的不景气，给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1979年粮食产量与农业产值分别比1978年下降26.4%和3.1%，这使当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为3.4%，由于1981年农业大歉收，迫使苏联制定1982年计划时，国民收入的计划增长率只规定为3%。粮食连年减产，导致苏联不得不靠进口来满足国内的需求。197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当年，净进口1904万吨。后来，粮食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①] "1981～1982年，由于购买小麦太多，震惊了世界市场，各国纷纷表示愤怒：俄罗斯简直是在吃穷人的粮食。但是，事已至此，粮价虽然贵两倍，还是进口大量粮食。"[②] 农业占用大量资金，生产落后，还限制了其他部门的发展，仅粮食每年大约需要进口3000万吨。进口食品和食品原料所花的钱，约等于每年外贸进口总额的20%，粮食成了苏联仅次于机器设备进口的第二项大宗商品。

这种情况，使得苏联外汇更加拮据，迫使苏联出卖黄金，以弥补购买粮食所需资金的不足，1970年出卖黄金2000多吨，尽管还在不断生产黄金，但国家储备减少

① 参见〔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39页。

②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金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28页。

了一半，到 1981 年只剩下 452 吨。[①] 外汇严重短缺，难以保证对国内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技术设备的进口，从而也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一些关键部门的发展。农业不景气，还限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苏联一直在设法加速乙类工业的发展，但其轻工业原料的 2/3 和食品工业原料的 80% 来自农业，这样，甲、乙两类的比例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很难得到改善，农业的连续多年歉收，直接影响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使得一部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能实现，从而使储蓄迅速增长。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零售商品流转额与储蓄的增长速度很不协调，如 1970 ~ 1981 年期间，零售商品流转额增长了 82.7%，其中食品商品零售流转额增长了 56%，而同期居民的储蓄存款则增长了 2.56 倍。这显然是此后通货膨胀的重要潜在因素，并给以后的改革造成障碍。为此，勃列日涅夫在 1982 年多次讲话中谈到，食品问题已成为苏联“最紧迫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3）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效的经济难以改变

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出现经济增长速度的大滑坡，而且经济效率低下与资源浪费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仍占主导地位。一定的经济运行机制决定着相应的增长方式，而经济运行机制基本上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从微观经济层面讲，在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经营机制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它对市场的敏感性与适应性

① 〔俄〕A. Б. 祖波夫主编《20 世纪俄国史（1894 ~ 2007）》，俄文版，2009，第 479 页。

很差，投入多产出少的情况比比皆是。从资源配置层面讲，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是由指令性计划决定的，这必然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并且长期难以调整，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再从宏观层面讲，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方法是直接的行政命令，而不是间接的经济手段。这就排斥了市场的作用，使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盛行，往往造成重大的政策失误和经济损失。这说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生命力的脆弱性，它是苏联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被击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时，有必要较为详细与深入地探讨改革停滞是如何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问题。

首先，提出向集约型转变的背景。苏联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二战期间除外），经济一直以较高速度增长，这是靠不断地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走的是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消耗型经济。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 30%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 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大多数年份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 1961～1987 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5.4%，而基建投资为 5.6%。1950 年，苏联的基建投资只及美国的 30%，到 1971 年已与美国相等，1974 年超过美国。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 70 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 90%，耗电量多 20%，耗石油量多 100%，水泥用量多 80%，投资多 50%。70 年代初，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扭转已开始出现的速度下降趋势，提高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经济发展由粗放转向集约化。1971 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

的发展道路过渡。

20 世纪 70 年代初，苏联决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化道路的直接原因是，粗放因素日益缩小。这表现在：一是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已感到劳动力不足。据计算，70 年代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年增长率为 18%，到 80 年代将下降到 3.8%。1961～1965 年，靠农庄庄员补充劳动力的人数为 310 万人，1971～1975 年降到 150 万人，1976～1980 年又降到 80 万人。退休人员激增（从 1950 年的 85 万人增加到 1970 年的 1900 万人），使劳动资源问题更加突出。二是由于长期实行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原材料、燃料动力资源消耗量大量增加，出现供需之间的不平衡。苏联虽资源丰富，但地区分布极不平衡。进入 70 年代，集中工业生产能力 80% 的西部地区资源已近于耗尽，要靠东部地区供应，从而使运输距离大大拉长。1966～1977 年，燃料运输的平均距离从 734 公里拉长到 1152 公里，生产费用日益提高。另外，随着原料、燃料基地东移，开采条件恶化，开采成本大大提高，如 1980～1985 年，开采每吨石油的费用增加 80%～100%。廉价原料与燃料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再者，苏联每年要出口大量原料与燃料以换取外汇。这些因素，使得苏联用大量投入资源来发展经济的道路走不通了。三是资金日益紧张。60 年代中期之后，基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苏联 20 个世纪 50 年代的基建投资年均增长率为 13.3%，60 年代降为 7.1%，70 年代降到 5.3%。

另外，由于长期实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效益日益下降，如 1960 年每卢布生产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为 72 戈比，1970 年降为 55 戈比，下降了 28%。社会劳动生产率从 1961～1965 年年均增长率的 6.1%

下降到 1971～1975 年的 4.8%。70 年代初，苏联已有大量产品产量占世界第一和第二，但质次，报废率高。如钢的产量很大（1970 年为 1.16 亿吨），但仍需进口各种钢材。拖拉机每年的报废率有时甚至高于新增产量。

苏联认识到，在不少产品数量超过美国之后，要想争取优势，必须通过科技进步，由过去的数量赶超转向质量赶超。而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行集约化方针。但 70 年代初，推行的集约方针，并没有取得成效。苏联经济仍是一种粗放的增长方式，集约化因素在扩大再生产中的比重不仅没有提高，而且日趋下降（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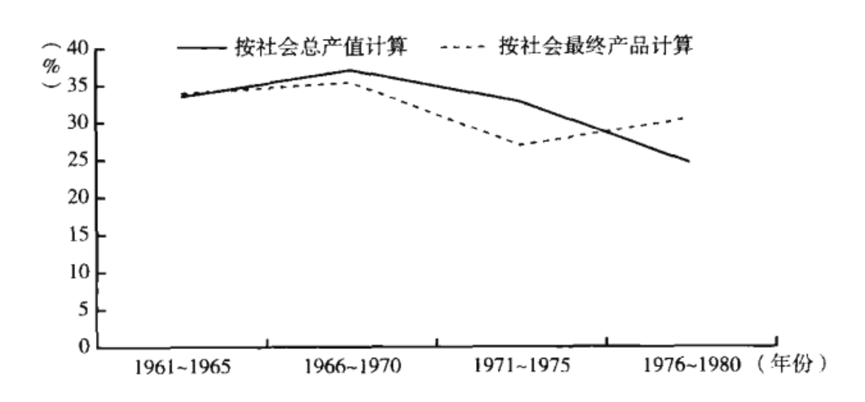


图 3 集约化因素在扩大再生产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苏）《经济科学》1981 年第 10 期。

在苏联扩大再生产的增长额中，3/4 是依赖于粗放因素得到的。无论按社会最终产品计算还是按社会总产值计算，从 60 年代至 80 年代，集约化因素的作用明显下降。整个 70 年代，集约化程度的一些效率与质量指标，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是进一步恶化。例如，苏联提出集约化方针之后，反映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劳动生产率呈不断下降趋势（见表 3）。

表 3　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

单位：%

	1961～1965 年	1976～1980 年	1981～1982 年
社会劳动生产率	6.1	3.3	2.9
工业劳动生产率	4.6	3.2	2.4
农业劳动生产率	4.8	2.6	1.0
建筑业劳动生产率	5.3	2.1	2.3
铁路运输业劳动生产率	5.4	0.1	0.0

资料来源：《1984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版，1985，第 53 页；《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纪念统计年鉴，第 107 页。

从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来看，也未取得进展，反而从 1970 年占 54.9% 提高到 1980 年的 57.2%。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指标恶化，还与苏联经济中存在严重浪费密切相关。由于集约化方针未取得成效，这一时期苏联经济中的浪费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苏联报刊大量揭示苏联经济中的浪费现象：能源的有效利用率为 43%，损失达 57%，折合标准燃料相当于 9 亿吨；每年因锈蚀而无情地吞掉 2000 万～2500 万吨金属；因质量低劣，每年有 15%～20% 的工业产品要报废或降价处理；粮食每年浪费 3500 万～4000 万吨；由于保管不善，每年要损失 500 万～600 万吨化肥，等于向农业提供化肥总量的 1/10；苏联、美国每年木材的运出量均为 3 亿立方米，苏联从产地运出，经运输、加工等要耗费掉一半。苏联每吨木材所生产的纸板几乎比美国少 9/10，纸少 5/6，胶合板少 8/9 等等。①

70 年代初，苏联提出集约化方针后，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一直到勃列日涅夫逝世，苏联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

① 陆南泉：《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情况》，收入曾培炎主编《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第 254 页。

基金产值率继续不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80年的40戈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单位产品消耗量仍然要比美国大得多，生产的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法等国同类产品高1～1.5倍。农业效率低下问题更为突出。在1976～1980年，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只及美国的20%～25%。1966年，苏联农庄与农场每生产1公斤牛奶，分别要花费16.9与10.6时/人；生产1公斤牛肉，分别要花费84.8与50.4时/人；生产1公斤猪肉，分别要花费73.6与32.2时/人。而美国在1933年，生产1公斤牛奶，只花费2.65时/人；1公斤牛肉花费5.73时/人；1公斤猪肉花费4.4时/人。[①] 西方对此评论说："苏联农业生产的效率低得出奇"，低效率是苏联农业"赶不掉的恶鬼"。[②] 效率低下加上粗放因素进一步受到限制，这些成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转向集约化难以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从70年代初开始，苏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政策，之所以未能取得进展，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这可从科技进步与经济集约化发展相互关系上得到反映。苏联长期把加速科技进步视为推行集约化方针最重要的措施，明确指出：加速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极严格的，勿庸置疑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其

① 〔俄〕Л. А. 阿巴尔金等主编《苏联经济史》，俄文版，2007，第95页。

② 参见陆南泉、周荣坤《当前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收入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第370～371页。

他“可供选择的方案”。苏联拥有巨大的科技潜力。80年代末，科技人员为150万人，相当于世界科技人员总数的1/4；每年新技术发明占世界新技术发明总数的1/3，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但巨大的科技能力，难以在经济转向集约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长期以来，只有1/4的科技成果在经济中得到应用，一项新技术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长达10～12年之久。形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经济体制对科技进步的阻碍作用。苏联学者认为，传统体制在科技进步道路上制造着一种独特的“反促进因素”。下面，从经济体制阻碍科技进步从而严重影响经济集约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来说明苏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

企业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苏联在指令性计划制度的条件下，企业的任务是竭尽全力去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总产值指标是对企业工作评价和奖励的中心指标。这是企业对采用新技术顾虑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需要改装设备，改变工艺过程，重新培训技术人员和工人，等等。这些都会打破原来的生产节奏，并在一段时间里会导致产量下降，最后完不成生产计划和利润计划，从而使企业收入减少，最终影响经济刺激基金。这样，企业领导人只愿意“稳稳当当”地进行生产，不想冒采用新技术的“风险”。这就是说，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促使企业的活动只局限于追求短期内获得最多的产量，从而阻碍了生产的革新过程。

物资技术供应制度阻碍企业技术革新。长期以来，苏联的企业主要是通过国家统一调拨制度获得生产资料的，它们无权在市场上自由购买，因此，企业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就得想方设法生产那些在物资供应上有保证的产品。采

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物资供应往往得不到保证。因为新产品在投产的最初几年常常需要重新设计，而生产新产品的企业，对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多少物资的估计，也难以做到像生产老产品那样准确。再加上生产新产品还要使用过去未用过的材料，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与原先毫不相干的新的供货单位建立关系。这些都增加了生产新产品企业在物资供应方面的不稳定性和完不成生产计划的可能性。这样，企业就自然希望尽可能地减少改变产品结构，年复一年地生产旧产品。

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一直存在矛盾。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企业，在规定新技术产品价格时，往往利用一次性定价的机会，不根据新技术产品的实际生产效率和成本，大大提高价格，以获得高额利润。这就产生下列情况：新技术产品与原来同一类型的旧产品相比，价格要高出好多，而效率并没有提高多少，即价格的提高与效率的提高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单位就对这类新技术产品不感兴趣。因改用了这类新技术，产品成本会提高，还要增加基金付费，最后会使利润率下降。据车床制造工业部统计，在生产总值中采用新技术生产的比重占10%的情况下，盈利率为23.6%，采用新技术生产占50%的情况下，盈利率则降为11%。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压低新技术产品的价格，那么，生产新技术产品的企业就会失去兴趣。

物质奖励制度弊端甚多。这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苏联长期以来把奖励的重点放在量上而不放在质上，结果是导致企业只顾数量，而不愿更新产品和提高质量；二是采用新技术获得的奖金数额，往往弥补不了因采用新技术而损失的奖金数额；三是奖金制度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新技术成果奖的获得者往往包括与新技术发明不相干

的人员。

产品供不应求，缺乏竞争。在苏联，尽管每年有一些质量低劣和不对路的产品要削价处理，但通常存在的是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加上产品由国家统一包销，缺乏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造成了一种产品可以年复一年地按老样子生产下去，可以几十年不进行技术革新。

企业资金不足，阻碍设备更新。苏联自 1965 年实行新经济体制以来，一直在扩大企业权利。但真正归企业自由支配的利润仍较少，并在使用上有严格规定。因此企业缺乏更新改造设备的自主权。留归工业企业主要用于更新设备等用途的发展生产基金十分有限，如靠这项基金用来更新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的话，那么，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约要用 80 多年的时间才能得到全部更新。80 年代中期机器设备的淘汰率为 2.2%，全部设施的更新需花 45 年之久，而按当代技术发展速度，机器设备的役龄不应超过 10 年。技术设备更新缓慢，致使苏联工业部门产生了巨大的、专业化程度很小的、经济效益很低的修理行业，它不生产新技术，而只是维修旧的技术装备。

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病。这方面的问题有：一是科研、设计、实验直到生产这几个环节是相互脱节的，各机构只对“研究—生产”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负责，这是造成新技术从研制到采用周期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很多科研机构缺乏必要的实验基地，现有的实验基地也不完善，能力薄弱，缺乏成套的工艺设备，不完全具备制造新技术工业样品的生产能力。三是苏联生产部门的科研与研制工作是按部门原则实行领导的。各部门一般都把生产计划排得满满的，主要考虑完成生产计划，这样就往往把完成科研和研制新技术任务所需的人员和设备挤掉。四是国家财政为科研机构完成科研课题提供无偿的固定经费，这样不易

保证科研成果的质量，即其实际应用价值。五是科技管理方面存在严重官僚主义。如苏联机床制造与工具工业部门，批准一项技术设计平均要经过10～12个领导人签字，要经过标准化部门及其下属技术机构的30道关口。每年仅花费在批准设计上的人力和时间就要35万个人时，即要使40%的最熟练的设计人员脱离自己的设计工作。这种官僚主义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技术人才，使最先进的技术设计投入生产时已变得陈旧。

另外，苏联保密范围过宽，造成了相互封锁严重的情况，技术情报传播很慢。军工部门的先进技术转到民用部门的速度十分缓慢，造成了同一领域的技术在军事工业部门十分先进，而在民用工业部门十分落后的现象。

以上分析说明，传统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科技进步，从而也成为阻碍苏联经济集约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一些俄罗斯学者在后来总结科技进步与体制改革关系时明确指出："要加速科技进步而不在经济上进行根本的改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另外，还应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科技进步缓慢与当时"左"的封闭的思想有关。当时，苏联对60年代末开始的世界上已发生新的一轮科技革命的信号"置之不理，直到70年代初甚至还不准使用'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概念，不仅想方设法从官方文件中勾掉，而且还从报刊书籍中删掉"。[①]

（4）经济结构更加畸形

由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资源配置主要靠行政指令，排除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加上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使得苏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17、216页。

联在军事实力方面很快达到“鼎盛”和“顶峰”。但它导致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更加畸形。[①]

以轻、重工业的比例看，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曾一度拉平甲、乙两类工业的增长速度，但在“九五”与“十五”计划期间，这两类工业增长速度的差距亦拉开了，即由 1966～1970 年间的 1.04∶1，扩大到 1971～1980 年的 1.28∶1；这一差距较 1951～1960 年间的 1.2∶1 和 1961～1970 年间的 1.18∶1 都大。在重工业内部，与军工密切相关的部门发展更快，如在 1971～1980 年，机器制造业产值增了 1.7 倍（年均增长率为 10.4%），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7.8%）高 1.2 倍。而同期的仪表制造业产值增长了 3.3 倍，其中电子计算机增长了 9 倍。[②] 这一时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同样是以牺牲人民消费品生产为代价的。因为，当时苏联的经济实力做不到“既要大炮又要黄油”。长期以来，苏联市场紧张，社会主义经济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也谈到，许多地方“向居民供应食品的困难依然存在”，抱怨“许多消费品，特别是纺织品、皮鞋、家具、电视机的生产计划，年复一年地没有完成。在质量、装潢、品种方面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一些普通食品如肉、奶、黄油等，开始从柜台上消失，尤其是小城市和农村。[③] “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人们寻找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要多。”[④] 这里想起了苏联的一个政治幽默。一天，有个西方记者来到第

---

① 关于这一问题见拙文《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的影响》，《人民日报》1984 年 2 月 7 日。

② 参见陆南泉、周荣坤《当前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收入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第 370～371 页。

③ 〔俄〕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 225 页。

④ 〔俄〕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 26 页。

一个上天的宇航员加加林的家，记者不断地敲门，但没有人出来开门，惊动了邻居。邻居出来问那个记者："你找谁?"记者回答说找加加林，要采访他。邻居回答说："他上天了。"记者说："那我采访加加林夫人也行。"邻居说："她去商店买东西了。"记者说："那我等她回来吧。"邻居说："你还是等加加林吧，因为他夫人买东西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加加林在天上飞得很快。"由于苏联军备竞赛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时期，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广大居民由于在商店通过正常途径买不到需要的消费品，只能通过"黑市"去高价购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黑市"盛行。据西方学者估计，如果苏联把它的军费预算削减25%的话，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的增长率几乎可增长1倍。

还应指出的是，由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在1966~1980年间，苏联人口寿命减少了两岁，而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同期内人口寿命增加了3~4岁。[①]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了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1954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下的几十年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定义。一个是基本经济规律，教科书引用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论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958年修订的第三版的定义有所修改，定义为："社会主义基本经

① 转引自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74页。

济规律的特点就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便充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并使他们得到全面发展。”这里把最大限度地满足改为充分地满足。

事实证明，苏联“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实行扩张政策而进行的扩军备战的需要，广大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一直不是放在发展生产的首要目的上，既谈不上最大限度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也谈不上充分满足。另一个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70多年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表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却是有计划不按比例的发展。不论是农、轻、重的比例还是工业内部的比例，都是不协调不平衡的。这些决定了如不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苏联经济不可能健康发展，也不可能持续发展，出现增速递减、停滞、全面停滞、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导致苏联最后垮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　政治体制全面倒退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对经济体制作了一些局部性改革的话，那么对政治体制不仅没有触动，而且上台后很快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曾进行的一些改革，随后出现了政治体制的全面倒退，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回归。

1. 政治体制倒退的突出表现

（1）恢复并加强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首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在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日益严重。表面上看，各政治局委员都对自己主管的领域负责，一切决策都是由政治局作出的，但实际上这些决策，往往是形式上的，主要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特别是随着勃列日涅夫的地位巩固与加强之后，他更是大权独揽。1977 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决定，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 10 月 7 日，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审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按新宪法增加的一些条款，勃列日涅夫同时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

席，这样，他就总揽了党、政、军的大权。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不只反映在勃列日涅夫这个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身上，苏联党的很多领导人兼任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另外，在党政领导的组织机构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苏共中央机关设置的与政府部门相应的部门比过去更多了，如国防工业、重工业、机器制造、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等部门，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导致各级党组织往往对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作决议与发指示，从而大大削弱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

勃列日涅夫坚持党政不分的政策，其理论根据来自斯大林。他在 1977 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决定兼任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讲话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解释说："这绝非是一个徒具形式的行动"，"这首先是共产党领导作用不断提高的表现"，"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中央政治局许多成员直接处理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换言之，因为苏共是执政党，因此苏共领导人可以处理苏联国内外所有事务。十分明显，这种观点，直接承袭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报告中的下列提法："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

苏联长期以来未能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这虽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如有关党政关系一直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也就没有确定党政关系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过多强调苏共执政党的地位；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度集权，在客观上要求党统揽一切。对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党政不分的体制也难以改革。

第二，在恢复部门管理原则后，经济管理机构日益庞大，官僚主义日趋严重。政治体制倒退导致管理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和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部从 1965 年的 29 个增加到 80 年代初 160 个。这些部门主要通过布置各种计划指标和下达文件的方式进行领导。据统计，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命令、指示和其他各种法规竟达到 20 万种之多，它们几乎为企业全部活动规定了详尽的细则，使地方和企业不敢也无法越雷池一步，严重地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必然导致国家机构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增长。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 64 个部和 20 多个国家委员会及直属机关的正副部长级领导干部达到 800 多人，以黑色冶金工业部为例，这个部共有正副部长 19 人，其中部长 1 人，第一副部长 3 人，副部长 15 人。一件普通公文的传阅，经常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①]

第三，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随着勃列日涅夫领袖地位和权力基础的巩固，个人集权日益发展。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形成的“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也不是三者之间的力量与权力处于均等状态，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权力。苏共中央 1972 年十二月全会上对由柯西金主管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否定性评价之后，勃列日涅夫把在经济方面的决策权控制在自己手里，随后又控制了外交权，此后，柯西金的地位大大下降。1977 年解除了波德戈尔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并宣布他退休。此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大大膨胀，决策权高度集中。据不少材料披露，像 1979 年底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事

① 转引自江流等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 51 页。

情，只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四人商量后作出决定的。[1] 从这一件事就可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专权的情况。

由于个人集权的加强，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和苏共代表大会按规定举行，但并不意味着党内有真正的民主生活。戈尔巴乔夫在 1987 年举行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讲："让我们坦率地说，多年来，党和人民关心的许多迫切问题没有被提到全会日程上来。同志们都记得，虽不止一次地举行时间很短和形式化的中央全会，许多中央委员在其整个任期内没有可能参加讨论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全会的这种气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更加突出。沃尔戈诺夫所著的《七个领袖》一书说：政治局讨论问题的程式，如由谁发言，如何发言等，事先都由党中央机关秘书班子作好仔细安排。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讨论，而是相互念自己的助手们为他们写好的 2～3 页讲稿。大家总是表现出"英雄所见略同"，照例不会发表同事先由起草班子起草的决议草案有多少出入的意见。[2]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一书中说：在那个时期，政治局有些会议，开会的时间只有 15～20 分钟，用于集合就座的时间往往比用于讨论工作的时间还多。即使是十分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作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3]

---

① 详见〔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274～279 页。

② 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8 年第 1 期。

③ 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8 年第 1 期。

(2) 个人崇拜盛行

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从1975年到1977年三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列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有44人之多。如果翻开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苏联报刊，对勃列日涅夫令人作呕的颂扬言论到处可见。1976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掀起了颂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而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的是基里延科，他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党的领袖"，当时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1] 那些阿谀奉承、恭维勃列日涅夫的言论更多："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对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2] 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组织人代为撰写的、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垦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3]

---

① （苏联）《巴库工人报》1976年11月25日。

② 《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③ 《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而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①] 苏联新闻媒体在报道198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作报告的情景时写道，在他报告的过程中，被74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这里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为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费尽了心机。个人迷信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条件，相互促进。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②]

（3）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日益严重

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执政时，看到了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因此，他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改革，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46页。

② 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294页。

目的是要废除像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腐朽的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富有活力。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因此，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在这方面的倒退，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

第一，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49.6%，到二十二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上升为79.4%，二十五大时上升为83.4%，二十六大为90%以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变动更小，18年中只换下12人。[①] 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是苏共历史上没有过的。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②] 由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重要干部由"一号人物"来决策，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不可能由年轻干部去担任。勃列日涅夫后来提拔的和任命的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情况就说明这一点。如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1976年去世时为73岁，而接替他的乌斯季诺夫当时已经69岁；苏联交通部长科热夫1975年去世时为70岁，接替他的索斯诺夫为67岁；造船工业部长托马1976年去世时为69岁，接替他的叶戈罗夫当年也是69岁。勃列日

① 参见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549页。

② 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涅夫兼任国家元首之后，竟选择比他大 5 岁的库兹涅佐夫担任自己的副手。1976 年吉洪诺夫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时已 72 岁。[①]

第二，终身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老化。1952 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 55.4 岁，书记处成员为 52 岁，到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 1964 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 61 岁，书记处成员为 54 岁。到 1981 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 70 岁，书记处成员为 68 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 75 岁。最高领导层的老化，同样反映在地方党政机关。戈尔巴乔夫在 1981 年一月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一系列党委的书记和成员，地方、共和国和全苏一级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往往好几十年没有发生必要的干部变动，没有增添新人。"干部的普遍老化，是苏联社会死气沉沉、保守、僵化和各种消极现象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个问题，从勃列日涅夫本人就可充分说明。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于 1974 年 12 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军用飞机场刚送走美国总统福特，即感到身体不适，患了大脑脉粥样硬化症。第二天前往蒙古，从那里乘火车返回莫斯科时又发生了第二次中风，从此，他病得很重，病了很长时间。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还活了 8 年，并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体制下，他还"统治了" 8 年。在这期间，他的病情不时地有某些好转，但他一直没有能恢复到哪怕是自己正常的工作状态。他极易疲倦，无兴趣处理手头该解决的问题，说话越来越困难，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在他生命的晚期，就连起码的谈话内容和礼节性的应酬话也要别人替他写好，没有这种"小抄"

① 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3 年第 2 期。

他简直无法应付。[①] 对此，博尔金作了以下的描述："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论并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②]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8年中，他已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已经无力正常执行领导者的起码职责"。这在当时的苏联上层都很清楚，但在传统的集权体制下，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条件下，只有等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他才离开苏联最高领导的职位。这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现行的机制、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排除了'正常'接班的可能性。"[③]

第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带来不正之风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正如利加乔夫指出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的关系。这种程序（确切些说是无程序）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在于主观方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① 参见〔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7～268页。

②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0页。

③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6～268页。

那些忘我工作的书记，由于没有注意到在中央和中央委员会的个人关系，当到退休期限时便处于‘无人过问状态’。”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这使不少干部不是把精力用于如何做好工作，而是搞投机钻营，那些吹吹拍拍、讨好上级、唯上是从、在上层寻找保护伞的干部越来越多。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对其家属与沾亲带故的人给予“照顾”，让这些人升官、捞取私利。他女儿的最后一任丈夫丘尔巴诺夫，如果仅凭个人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在仕途上青云直上，但却在几年之内当上了中将，从一个普通的民警政治工作者一跃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此外，勃列日涅夫的儿子被提拔为外贸部的第一副部长，他的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这两个人都有酗酒的恶习。[①]

2. 政治体制倒退的重要原因

（1）斯大林主义的深刻影响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笔者借用了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很符合实情。“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②] 应该说，在勃列日涅夫

① 参见〔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341 ~ 343 页。

②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191 页。

时期，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并不是困难的事。这主要因为：一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个人崇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想得很肤浅的，可以说还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经历了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并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很难工作，又会失去特权与利益。

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人仍然持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他们要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在上述条件下，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机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1] 所以，正如有人指出的："断言我们似乎告别了斯大林主义，此话说早了，太早了。"[2]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90页。
② 〔俄〕雅科夫列夫等：《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323页。

勃列日涅夫在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方面，首先的步骤是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最简单的办法是1965年利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提及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1970年在斯大林墓为他建立半身雕塑像。后来，利用撰写各种各样的有关二战的回忆录把斯大林重新抬出来。官方要求回忆录也好还是二战史也好，要符合当时的苏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需要。这样，连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也要把有损于斯大林形象的内容删去，如从书的原稿中砍掉有关1937年斯大林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①

（2）“特权阶层”的形成

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使得苏联的“特权阶层”进一步扩大与稳定，这一阶层的人思想更趋僵化，这也成为阻碍整个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的，“特权阶层”是在斯大林时期就逐步形成起来的。阿尔巴托夫指出：“早在30年代所有这些已经形成完整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特别是同人民生活相比更是如此。”在战后，对苏联上层领导人的配给制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特别是各种商品的购货证与票券大大发展了，逐渐成了高中级负责干部家庭日常生活

① 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完整的未经删改的版本现在已经问世。自1937年5月至1938年9月，遭到斯大林镇压的有近半数的团长，几乎所有的旅长和师长、所有的军长和军区司令员、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大多数军、师旅的政工领导干部，近1/3的团政委，以及高等和中等军事学校的许多教员。参见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02～205页。

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这方面越来越起带头作用。有些将军大胆妄为到这种地步，以致向来对这种腐化行为睁眼闭眼的斯大林不得不出来纠正，命令把某些人逮捕。但特权并没有消失，后来很快地扩大了，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高低，装在信袋里秘密发给。一个部长可拿到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卢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不纳税，这个数目相当于前苏联总统规定的工资的两倍。[①]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形成。[②] 他们把特权阶层的特权归结如下：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等等。对苏联上层领导来说，高薪并不是主要报酬，远为贵重得多的是上层所享有的特权。他们一切的获得主要靠特权。因此，不论苏联的任何时期，作为特权阶层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即他们是掌握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是实现特权的基础。

赫鲁晓夫时期，领导人的特权虽有些削弱，但依然存在。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开始悄悄地斯大林化。这期间特权阶层扩大化与稳定化，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人数与特权的膨胀，这个阶层享受的特权亦日益增多。1976年开始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85年任苏共政治局候

---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11～312页。

② 参见陆南泉等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第81～83页。

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后来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其自传中，根据个人亲身经历对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特权加以揭示：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为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一个花匠。”“特权阶层”享受着现代化的医疗设施，“所有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医院的病房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同样很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制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形吊灯……”“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就行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且那些级别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所有的东西都是专门的——如专门提供服务的师傅；专门的生活条件；专门的门诊部、专门的医院；专门的别墅、专门的住宅、专门的服务……”“每个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配有一个卫士长。这个卫士长是受上级委派办理重要公务的职员，是一个组织者。”“他的一个主要职责是立刻去完成自己的主人及其亲属请求办理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还没有吩咐要办的事情。譬如要做一套新西服。只要说一声，不一会儿裁缝就来轻轻敲你办公室的门，给你量尺寸。第二天，你便能看到新衣服，请试试吧！非常漂亮的一套新西装就这样给你做好了。”“每年3月8日妇女节，都必须给妻子们送礼物。这同样也不费事，会给你拿来一

张清单，那上面列出了所有能满足任何妇女口味的礼品名称——你就挑吧。对高官们的家庭向来是优待的：送夫人上班，接他们下班；送子女去别墅，再从别墅接回来。”“每当政府的‘吉尔’车队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沙沙地飞驶而过时，莫斯科人通常停下脚步。他们停下来不是因为此刻需用敬重的目光瞧一瞧坐在小车里的人，而是由于这确实是个令人有强烈印象的场面。‘吉尔’车尚未来得及开出大门，沿途的各个岗亭就已得到通知。于是，一路绿灯，‘吉尔’车不停地、痛痛快快地向前飞驶。显然，党的高级领导们忘了诸如‘交通堵塞’、交通信号灯、红灯这样一些概念。若是政治局委员出门，则还有一辆‘伏尔加’护卫车在前面开道。”叶利钦谈到自己的别墅时叙述道：“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 50 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 10 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地下冰柜。我们沿着宽敞的楼梯上了别墅的二楼。这儿也有一间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

他东西。"[①]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访问莫斯科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享受贵族待遇，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在罗兰的《莫斯科日记》里写道：苏联已出现了"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攫为己有"。[②]

事实上，苏联特权阶层享受的特权是很多的。那么，在苏联为何需要建立这样一个让苏共党内少数领导干部享受的特权制度，为什么要实行那种财富帮会式的官僚机构配给的方式。关于这个问题，阿尔巴托夫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③]

应该说，不论是斯大林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斯大林为苏共领导层提供的种种特权，是他建立的一种制度，或者说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一个内容，是用来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扩大化与稳定化的主要原因有：首先，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干部领导职务搞任命制与终身制，干部队伍较为稳定，因此，特权阶层也比较稳定。而斯大林时期，虽

① 参见《叶利钦自传》，朱启会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140～147页。

② 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下），新华出版社，2010，第1193页。

③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12页。

然形成了特权阶层，但它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斯大林一方面给予上层人物大量的物质利益和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消灭这些人。在 1930 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个特权阶层。其次，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干部数量大大膨胀，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 50 万～70 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 300 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①] 人们对特权阶层的人数估计不一。英国的默文·马修斯认为，连同家属共有 100 万人左右。西德的鲍里斯·迈斯纳认为，苏联的上层人物约有 40 万，如果把官僚集团和军事部门的知识分子包括进去，约 70 万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利姆别尔格尔估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有 400 万人，另一些人估计不少于 500 万人。[②] 第三，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状，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就是说，这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成为抵制与反对改革的主要阻力，是阻滞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3）传统意识形态为政治体制倒退提供了“合法性”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不仅没有任何突破，反而使其成为维护传统体制的思想屏障。

第一，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宣传，都要符合推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纲领的要求。这一理论在 1971 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正式提出，并在 1977 年写进通过的苏联

---

① 〔俄〕A. H. 博哈诺夫等：《20 世纪俄国史》，俄文版，1996，第 571 页。

② 陆南泉等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第 82 页。

新宪法。当时苏联认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在现实生活中已是“全面而协调发展”的社会，已是建立了“成熟的社会关系”，并强调“社会统一性”。这些观点完全脱离了苏联的现实生活状况，掩盖了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让人们对已出现的与潜在的危机处于麻痹状态，不去正视现实，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为了实现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纲领，苏共在文化意识形态工作方面采取虚伪的、形而上学的态度，用教条主义的说教向广大群众灌输，着力地宣传苏联社会已是多么和谐、协调与统一，一旦在这方面出现揭示问题、矛盾的文学、艺术、电影与戏剧等作品，就被视为“离经叛道”并加以批判。另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更多强调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绝对的对立，对资本主义文化与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持拒绝的态度。

第二，强化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监控。一个重要办法是，对社会科学与文艺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不断地把不按党指示的报刊主编调离，任命与党保持“一致”的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出版领域特别严格控制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被视为与党的方针政策不一致的作品，特别是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这是绝不许问世的；二是那些遵循苏共二十大路线批判斯大林的作品，同样经常遭到查禁与删改。严密的审查制度，不放过任何一个在一般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作品。据当时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回忆，1969年，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哲学教研室代理室主任萨德科夫出版了《人民团结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一书，从书名来看就与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强调的全面协调、和谐、统一等思想是不一致的。检查机关发现了，这时“莫斯科传来了信号：狠批。于是5月13日举行了边疆区

党委会，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哲学教研室副教授 Ф. Б. 萨德科夫书中的严重错误。我们可以说是把他批了个体无完肤。这的确是一个喋喋不休的批判会。我们的主要‘思想家’利霍塔要求将其开除出党……我的发言充满了火药味。萨德科夫受到严重警告，并宣布撤销其教研室主任的职务”。[①]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文化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反映在很多方面。如对一些重要报纸规定报道选题、报道重点，对要求发表的有关重要文章需向苏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记者到国外采访与进行国际学术交流都要经过审批同意，报刊连改变纸型等亦要征得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勃列日涅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十分关注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与《真理报》，这两个机构的领导人直接由他指挥。

第三，增强文化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久，1966 年 5 月，把赫鲁晓夫在 1962 年由联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科学、高等教育与学校部和文化部合并成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撤销，又重新分成三个部，即苏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科学与学校部，并把这三个部门的工作职能与管辖权划归苏共中央书记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苏共中央宣传部在控制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所起的特殊重要作用。该部下设 13 个局：俄罗斯联邦局、加盟共和国局、党务宣传局、群众性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局、报刊局、广播电视局、出版局、杂志局、出版物和印刷品发行局、体育文化和运动局、讲师团、专家咨询组与办公厅。十分明显，这 13 个局几乎监管了文化意识形态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 129 页。

的全部领域。但是，勃列日涅夫与主管意识形态的被称之为“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对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往往不满意，认为其贯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方针不力与控制不够，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整个领导干部十分稳定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出现了多次更迭：1965～1970年斯捷帕科夫任部长；1970～1973年雅科夫列夫任部长；1974～1976年斯米尔诺夫任部长；1976～1982年佳热利尼科夫任部长。与此同时，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对宣传部与各届领导都没有良好的印象，更多的是有一种厌恶的感觉。

谈到严控文化意识形态的机构，不能不提及克格勃第五局。它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作用日益凸显。克格勃就其性质来讲是安全机关，但它在反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决定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这期间，“秘密警察”机关作用加强了，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的话题时，也常常看一看电话机，作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①

勃列日涅夫时期文化意识形态出现停滞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思想概念上的停滞，是勃列日涅夫一班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上，把苏联模式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无视变化了的时代的要求”。②

---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17页。

② 〔苏〕费奥多尔·布拉茨基：《领袖与谋士——关于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其他人……》，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1992，第333页。

3. 政治体制倒退的严重后果

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一步一步地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后来逐步巩固与发展的高度集权体制回归，它对苏联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显然，政治体制倒退首先成为阻滞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因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政治体制倒退，从而它不仅不能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丧失了头几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一些成效，最后使经济全面的停滞与衰退。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三章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1）社会、政治问题日趋增多与尖锐

在这一领域的问题反映在诸多方面，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等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别在后期，苏联在社会、政治与精神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异常情况。由于从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到各级地方领导，弄虚作假，言行不一，使得苏联广大群众，对党与国家提出的政策、口号持不信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号召的东西，对讲坛上讲的东西，对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就开始不那么相信了。”①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这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最上层作出的，与此同时，‘上边’却不能真正采取任何一个决定——其中每一项决定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此外，领导

---

① 〔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46页。

人任何一项决定作出后，在贯彻时又受到机关的专横的阻挠。”“几乎没有人对某件事真正承担责任。”“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①] 据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这一时期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出的决议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②] 官僚主义的盛行，勃列日涅夫本人表现得尤为突出。阿尔巴托夫在其回忆录中，列举了不少事例，其中有关科技革命问题最为生动。在60年代末，考虑到苏联加速科技发展的紧迫性，苏共二十四大后，政治局作出决定，准备专门就科技革命问题召开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会议的准备工作与通常一样委托一个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数名中央书记组成。经过多个月紧张的工作，终于拟就了一份篇幅长达130页的总结性文件。文件于1973年5月按期交基里延科等三位书记。自然，这份文件交给了勃列日涅夫，但长久没有下文，召开讨论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的整个设想石沉大海了。到了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一个专门委员会清理他的档案时，发现了这个文件。之后，再转到戈尔巴乔夫手里。但科技体制改革拖延了20年，从而使科技进步问题大大加重了。[③]

社会道德堕落。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酗酒的人数急剧增加，1980年有4000万酒徒，占全国人口的14.81%。酗酒者扩展到妇女和广大青少年。同时，酒精中毒程度也日益加深。1968年苏联酒精中毒死亡人数为18150人，每10万人的酒精中毒死亡数7.6人，而到1976年上述两个数字分别增加到39800人与15.9人。据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5页。

② 《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③ 详见〔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16～218页。

统计，苏联3/4的暴力犯罪是在酗酒以后发生的。俄罗斯联邦法院1971年审理的案件中约有80%抢劫案、69%的流氓袭击案、56%的盗窃案是在罪犯酒后发生的。由于酗酒，每到星期一上午，1/3的工人仍睡眼惺忪，不能集中精力工作，旷工、误工情况十分严重，还造成大量的废品与次品。据苏联专家估计，全国因酗酒造成的经济损失约350亿～400亿卢布，另一个问题是离婚率迅速上升，1960年离婚家庭占全苏家庭的10%，到1979年上升到33%。[①] 酗酒与离婚两大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迅速发展，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也说明衰败与腐朽在滋长。在苏共中央工作几十年的瓦·博尔金指出："勃列日涅夫及其家人还热衷于受送礼物，当时总书记收到的礼物数不胜数。"[②]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吸毒和犯罪日益滋长，莫斯科市登记的吸毒者就有3600名。下流无耻、低级趣味和精神空虚的文化、艺术流行。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奖赏、称号和滥发奖金，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真正关心。苏联报刊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一个"拍马屁和阿谀奉承"的时代。[③] 这个时期，赠送礼物大大盛行起来，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勃列日涅夫每次出行，必须带大量礼品。既然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能赠送这么贵重的礼品，那么地方官员就自然要回赠贵重的礼品了。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岁诞辰，掀起了一阵送礼高潮，赠礼在苏联找到了肥沃土壤，发展到顶点。[④]

---

① 有关酗酒与离婚率的资料，均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第168、178、179页。

②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4页。

③ 陆南泉主编《苏联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9，第10页。

④ 参见〔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4～35页。

社会精神生活军国主义化，也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特点。苏联军事部门为了他们所需要的资金与其他东西，使用了各种手段，而首先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的。“这些年来，我国实质上展开了无先例的军国主义宣传运动，积极地试图使社会精神生活军国主义化。利用伟大卫国战争这个对苏联人说来神圣的主题，无耻地进行投机：回忆录，接连不断的文艺作品（往往同艺术性没有任何共同点，更确切些说是粗糙的手工制品），多集连续的艺术影片，电视转播，宏伟的、造价极高的纪念碑的建设，各种各样仪式引入日常生活（包括纪念碑和烈士墓旁身穿军装手持冲锋枪的学生的仪仗队）。所有这些整年地冲进国内精神生活。而且根本不是在国家上空笼罩战争威胁的条件下发生的，恰恰相反，是在缓和时期发生的。”[①] 意识形态军国主义化，对开展军备竞赛无疑是个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大约形成了 2400 个黑手党组织，它们大多数有官僚背景。80 年代初莫斯科已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②] 1973 ~ 1983 年的十年间，苏联每年出现的犯罪总量几乎成两位数增长，这其中针对个人的重大暴力犯罪增长 58%，抢劫犯罪增长两倍，而入室盗窃和受贿案件增长 3 倍。[③]

贪污、盗窃、行贿问题日趋严重。据勃列日涅夫 1982 年下台时的调查材料，已查出了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在贸易中存在数万起侵吞行为。由此产生的刑事案件涉及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281 ~ 282 页。

② 《环球时报》2006 年 12 月 18 日。

③ 参见〔苏〕B. B. 茹拉夫廖夫主编《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积聚》，俄文版，1990，第 164 ~ 165 页。

1.5万个负责人，其中2500多人是大贸易机构的领导人，包括莫斯科总局的领导人。揭露出多年来大规模棉花欺诈的“乌兹别克事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还有牵涉部长尼·安·晓洛科夫及其副手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的“内务部领导层案件”。问题暴露后一些人受到惩处，有些人自杀，有些（大约有30%以上）党的工作人员被迫辞职。[①]

（2）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死气沉沉

拿经济科学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在走回头路，精力集中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上，不切实际地去拨弄从马列主义奠基人著作中摘出来的一连串抽象原理，而且主要是用他们最粗糙的、纯粹斯大林式的诠释来研究。这种斯大林式的诠释，早已成为被推销得贬了值的理论，还在强迫人们接受，而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断升级，并纳入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张更多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学者如阿甘别基扬和扎斯拉夫斯卡娅等，则成为被围攻的对象。非商品派的理论一直居主导地位。在史学方面，歪曲与伪造历史的现象日益多起来，特别是尽量掩盖斯大林的错误与罪行。宣传性读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行量大幅增长。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说：“我们的报纸一次发行的份数约为1.4亿份，杂志1.5亿多份。”苏联平均每个家庭拥有4种以上的出版物。另据统计，每天出版430万册书籍和小册子（1970年15亿多册），10年下来，书名的数量达到8.5万个，但这些作品中绝大部分是社会政治书籍，不少是苏共领导人的讲话、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宣传材料。而人们需要的真正的好书出现“饥荒”。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被认为是世界上

① 参见〔俄〕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80～181页。

最大的出版者。至于有多少人阅读与相信那些枯燥无味的、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官话套话的政治宣传读物，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俄罗斯学者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人民对官方宣传的那一套所评论的：“官方意识形态仅是一种流于表面的形式，它们已经不能操纵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① 当时的大学生反映说：“三年中我从来未看过现代苏联作家的作品，我的朋友们也是如此。”② 不用说青年学生，连许多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苏联党政干部，对自己宣传的那一套也并不相信，至于普通百姓，他们对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的漠视与怀疑已是普遍现象了。这一时期，科技人员也失去了创新的积极性，据一项统计表明，70 年代列宁格勒的 30 个科学研究所中，55% 的科研人员没有任何创造和新贡献；在 80 年代初对 12 个科研所的 5000 名工作人员的调查表明，40% 的人花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上的时间不足工作时间的一半；莫斯科一家工厂的厂长发现，工厂工程师只发挥了他们的潜能的 20%。③

（3）出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持不同政见者”是俄语中的外来语（Диссидент），意为“脱离国教的人”。有人认为，译为“异议者”更为确切。后来在苏联国内及在西方，把各种对苏联制度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一般称为“持不同政见者”。但苏联官方则称为“反社会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④ 从广义上讲，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指不同意现行

---

① 参见〔俄〕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 209 页。
②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 18 年》，人民出版社，2009，第 304 页。
③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 18 年》，第 303 页。
④ 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中），第 911 页。

规则和制度的人；在苏联，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人和人权保卫者是这个概念的同义语”。[①] 按苏联著名历史学者、“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的看法：“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光是私下对自己的妻子或挚友发发牢骚而已。”[②]

在苏联从出现“持不同政见者”发展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重要的特有的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体制倒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时期都存在“持不同政见者”，但都没有形成“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我们之所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形成“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是因为：一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已从较为隐蔽的活动转为公开的活动，活动的主要方式是集会与游行。二是“持不同政见者”不论在形成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还是在人数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据苏联克格勃的统计，1967 年有 502 个被官方认定的反苏组织，有 2196 名参加者；1968 年有 625 个组织与 2870 名参加者；1969 年有 733 个组织与 3130 名参加者；1970 年有 709 个组织与 3102 名参加者。1967～1971 年共出现了 3096 个被认为是“有政治危害性的团体”，参加这些团体的有 13602 人。1967～1974 年克格勃就发现了 4408 个地下秘密组织。[③] 三是“持

① 〔俄〕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 216 页。

② 〔苏联〕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刘明等译，群众出版社，1984，第 1 页。

③ 转引自郭春生《勃列日涅夫 18 年》，第 157 页。

不同政见者”各种方式的自行出版物[1]大量增加，揭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种种弊端，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四是在“持不同政见者”影响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夜间人”与“厨房政治”的现象日益普遍。这些人并没有公开加入“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他们十分有兴趣地阅读各种地下刊物，“夜间人”表现为双重人格，他们白天上班所说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夜间回到家与家人或朋友在厨房谈的是另一套，抨击各种社会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与幽默，这种“夜间人”现象，明显地反映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出现了一种‘口是心非’的状况——内心不同意意识形态方针及其引起的生活方式，表面上却对现实认同或容忍，当时人们不得不采取说一套，想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的方式”。[2] 实际上，普遍存在的“夜间人”现象，已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广泛的群众基础。

那么，缘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最为根本的或者说深层次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实行向斯大林体制回归的政策，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悄悄地斯大林主义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捅了一下斯大林，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的很多错误乃至罪行，应该说这对推动苏联历史进步并为推行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斯大林时期留下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如有不满时，“持不同政见者”也就在反对斯大林高度集

① 自行出版物是指未经官方审查同意的私下出版物，俄文为 самиздат，该词有两词组成，前半个是 сам 即自己之意，后半部分是 издат 为出版之意。音译为“萨米兹达特”。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持不同政见者”广泛利用的一种出版物。

② 〔俄〕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 209 页。

权模式的旗帜下展开种种活动。同时，也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文化意识形态实行专制主义的结果。他上台后像灭火队一样把赫鲁晓夫时期出现的某些“解冻”与活跃的气氛扑灭了，这引起了文艺界、理论界的强烈不满，为了争得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不起来斗争与反抗，斗争与反抗又遭到镇压，结果使矛盾进一步加剧，尽管在某个时候由于受到高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削弱了，但始终未被彻底消灭，在某个时期还得到发展。我们可以从该运动发展的简要过程中看到这一点。

最早的起因是，两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与达尼埃尔）先后于1959年与1961年在西方发表讽刺斯大林的文学作品。这两人于1965年9月遭逮捕，两人分别被判处7年与5年的强迫劳动。此事发生后，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几百名青年学生与知识界人士在普希金广场公开集会，集会者打出的标语是“请尊重苏联宪法”，“要求法院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与达尼埃尔”。克格勃抓走20多人，40多名大学生被学校开除，这可视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开端。此后，每年的这一天，普希金广场差不多都有人要求保障实现苏联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民主权利的集会。到60年代后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组织纷纷出现，如1970年11月萨哈罗夫等三名著名物理学家成立了“人权委员会”。同时地下刊物大量出现，如《播种者》、《时事纪事》与《政治日记》等广泛流传。1964年麦德维杰夫写成《让历史来审判》一书初稿，虽不允许公开出版，但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在西方出版。[①] 这是一部作者花了十年时间在收集大量史

① 该书1981年译成中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中国学者研究斯大林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

料基础上深刻揭示斯大林主义起源及其后果的专著。1959年索尔仁尼琴完成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第一圈》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后一本书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1962年被允许出版，引起了苏联社会的轰动。但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此书出版表示不能容忍，提出要追查出版此书的责任者，苏联开始批判索尔仁尼琴，他的作品后来在苏联不再允许出版了。

我们上面提到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与索尔仁尼琴，可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三人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派别与思想。萨哈罗夫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派，主张尊重法律与保护人权。麦德维杰夫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派，他的主要观点是，斯大林搞的那一套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因此，他的著作主要是集中批判斯大林模式。索尔仁尼琴被称为新斯拉夫派，他是“集中营文学”的创始人。他对斯大林统治残暴的一面进行深刻的揭露，但他崇敬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反对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主张建立俄国式的专制制度，而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无穷无尽的‘阶级’仇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①] 1970年10月8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通过授予该年文学奖的颁奖词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具有全球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贯穿于许多伟大前驱作品中无可比拟的俄罗斯传统的继承。他和他的前辈作家各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地表达自己对俄罗斯苦难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②] 普遍认为，这一段话反映了索尔仁尼琴作品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也是他本人

① 〔俄〕A. B. 科罗特尼科夫等：《克里姆林宫死刑——政治局关于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文件》，俄文版，1994，第264页。

② 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中），第919页。

的基本思想。他由于苏联政府的阻挠未能前往瑞典参加授奖典礼。尽管以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三个代表人物其主张是有差异的，但有其共同点：反对在苏联建立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维护人权；尊重宪法，要求给人民言论与出版自由；主张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是爱俄罗斯这个祖国。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与发展，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社会、经济、政治与外交等领域出现的严重问题的强烈不满，也反映了对阻碍时机已成熟的改革采取的官僚主义及其各种错误政策的不满。上述领域的各种问题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论述。可以说，这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社会与群众基础，也是苏联在这一时期难以应对与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不能不提及 1968 年入侵捷克与 1979 年入侵阿富汗，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影响。1968 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扼杀了这个国家为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改革，亦使苏联的改革向后退缩；同时，还导致苏联国内不少知识界人士对苏共与苏联政府产生不满，引起了“持不同政见者”对侵捷事件的抗议活动，示威者高举着“不许沾手捷克斯洛伐克”、“占领者可耻”等标语口号。俄罗斯学者认为，侵捷是苏联的一次“政治道德失败”。对此，索尔仁尼琴指出，一个作家“应当对他的祖国或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承担同样的责任，如果他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裹在作家的脸上”。[1]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少“持不同政见者”谴责与抗议苏联对别

① 〔俄〕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 196、206 页。

国的侵略行径，萨哈罗夫表示："如果对祖国的爱国主义反对了对人类的爱，那么他宁愿放弃爱国主义。"1980年7月，"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达吉亚娜·玛莫诺娃发动了反战签名运动。10月16日，7900名西方科学家为抗议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苏联科学家，宣布中止同苏联的科学交流活动。[①]

谈到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时，不能不看到它对苏联剧变所产生的影响。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最终的失败，使苏联这个国家的形象一落千丈，并且还给苏联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截至1980年底，苏军死于阿富汗战争中的官兵达1.1万余人。战争期间，每昼夜苏联平均的耗费为1984年430万卢布，1985年720万卢布，1986年1000万卢布，1987年1470万卢布。[②] 1985年5月至1989年2月，苏联决定撤回驻阿富汗的100300名苏军。由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决定的这场战争留给后人的沉重负担，亦成为促进苏联最后发生剧变的一个因素。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持不同政见者"通常采取各种强硬的镇压办法，如逮捕、判刑、驱逐出境、流放、软禁、剥夺苏联国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禁止出国、禁止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等。1974年2月，苏联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并于2月13日将其押上飞机驱逐出境；1980年萨哈罗夫被捕，将其从莫斯科驱逐到高尔基市，实行"准监禁"；麦德维杰夫多次被抄家，日常活动一直受到克格勃的监控，失去了自由，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1985年5月才撤销了对他的监控；苏联政府对女权运动代表人物达吉亚娜·玛莫诺娃的处置提出两

---

① 转引自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第164、165页。

② 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中），第954页。

个方案——服无期徒刑或离开苏联，用这种威胁的办法迫使她离境。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持不同政见者”除了采取上述镇压办法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做法，那就是把“持不同政见者”说成精神病患者并关进疯人院，这种把健康的自由思考的正常人关进疯人院的做法，是对民主、人权、自由的践踏，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行为。

（4）从全面停滞走向衰亡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与政治体制倒退，最后导致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一个全面停滞时期。

如果以主要领导人来划分苏联历史发展阶段的话，撇开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时期不算，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在对苏联国内情况进行分析后，把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概括为停滞时期。雷日科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 年）的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惰性和停滞不前的力量当时占了上风，一切都回到了旧的轨道”。1988 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对过去那些年里的扭曲和停滞的深度和严重性估计不足。许多东西过去根本不知道，只有现在才看到，各经济领域的松松垮垮状况比原来估计的要严重。”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还指出：“经济中的障碍和停滞现象，不可能不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消极现象严重地触动了社会领域。”①在苏联，从领导层到学术界，把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视为停滞时期，是较为一致的总体评价。例如，阿尔巴托夫指

① 〔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 16 页。

出："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这毕竟是18年），我国没有出现过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当然，由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间长达18年，在这期间，有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各个阶段也有所区别。对此，阿尔巴托夫接着指出："考虑到历史遗产的重负和斯大林专制年代形成的社会特点，而采用较为具体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这18年就可能不是那么单一，不是那么全然灰暗无光。其中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期，开始在工业中实施某些改革，在农村贯彻某些重要决定，这是国民经济相当顺利发展的时期。"我以为，阿尔巴托夫上述两段话并不矛盾。如果从总的发展趋势看，从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角度去分析，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完全可以说是停滞和衰颓时期，僵化的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很多方面"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①] 就是说，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朝着进步与完善方向迈出大的步子，总体上讲，仍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

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如有些学术论著明确指出：在勃列日涅夫这18年中，"苏联积累了大量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从最近十多年来苏联和俄罗斯发表的许多材料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②] 笔者认为，

---

① 〔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5、190页。

② 徐葵：《勃列日涅夫年代：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见《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停滞，是在走近衰亡，这是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定位。

这里，我想再次强调，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从对苏联剧变产生的影响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矛盾冲突和社会的严厉管制，无疑是苏联走向衰亡的历史拐点。当然，如果从这 18 年的前期与后期来看，从某个具体领域来看，是有差别的；但总体来说，是走下坡路的。

五　值得思考的几个重要问题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经过一个短暂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时期后，逐步走向停滞，成为苏联走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时期，也为1991年底苏联最后发生剧变积聚了种种内在因素和准备了条件。苏联在这一历史时期提供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1. 不改革的确是死路一条

从客观条件来看，社会主义社会绝不是夺取了政权，就会在短时期形成的制度；必须通过不断改革，才能达到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一再丧失改革机遇，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试验终归失败，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汲取。

1921年初，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当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由于列宁在1924年1月21日逝世，因此实践他提

出的“新经济政策”时间很短，“新经济政策”的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到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这样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也就是说，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方式上来了。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经济状况的“新经济政策”被中止，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也就停止了。“新经济政策”只执行了八年。这个八年苏联的政策与体制较符合当时的实际。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①] 这里讲的模式僵化了，指的是在斯大林宣布1936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之后，他就把在20、30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超高速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9页。

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在战前最后确立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显出来。另外，还要看到，在战争时期，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反战同盟国，自然会发生各种交往，这对苏联中上层人士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从下层士兵来讲，由于战争的需要他们越出国家，与盟国的士兵接触来往，还与国外的人民来往，从而看到了也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战争结束后，这些士兵回国后，很自然地相聚在小饭馆与小酒店，议论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小酒店民主”。[①] 这也反映了人们渴望改革的心理，人民期待改革机会的出现。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开始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另外，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其地位是空前的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也空前提高。再说，苏联当时国内也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思潮，如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沃兹涅辛斯基就提出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对待这个情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有可能出现崭新的局面。

---

① 转引自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6页。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斯大林在战后仍坚持原来的体制，并不断强化，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主要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 1946 年 2 月 9 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斯大林还特别强调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作用。为什么在工业化与集体化早已完成，到了 1946 年斯大林要讲这么一通话，十分明显，目的有二：一是通过战争的胜利，证明他搞的工业化与集体化是完全正确的，不可怀疑的；二是证明通过工业化与集体化形成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从而，在战后苏联排除了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丧失了改革时机，并且使体制更加僵化与凝固化。

第二，战后，斯大林个人迷信大大发展了，达到了神化的程度。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四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二是广大苏联人民与苏联红军强烈的爱国热情，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三是战前已建立起来的实际上主要是适合战争需要的战备体制；四是不应忽视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的作用，这既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像中国等那样落后国家，没有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全力支持，苏联取得战争的胜利将会困难百倍。

第三，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 492 页。

备的政策。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所以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他还接着说："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①] 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把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用于军事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他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而是实行强化这种体制的政策。

第四，进一步统制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谁都清楚，农村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主要是集体农庄制度。集体农庄庄员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出了工也不出力。很明显，集体农庄制度面临危机。这个时期，苏联农村传播着解散农庄的消息。为什么当时苏联农村如此盛传解散农庄的消息呢，又说得有鼻子有眼像真的那样，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二是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战争胜利了，农庄的主要使命（向国家上交大批粮食）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解散农庄了。简言之，解散农庄的

① 〔南斯拉夫〕米洛凡·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89页。

传言，是广大农民强烈愿望的一种反映。遗憾的是，农民这种要求改革集体农庄的强烈愿望不仅没有实现，相反的，斯大林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以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

还应指出的是，斯大林战后不进行改革的同时，随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展，个人崇拜已成为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次错失改革良机的是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虽然看到传统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但由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① 赫鲁晓夫要解决面临的种种难题，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改革才能找到出路。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为此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尽管赫鲁晓夫作为战后苏联第一个改革者，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

① ［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编《别无选择》，第584页。

由于在指导思想与政策等方面的失误，改革未能取得成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并产生了严重后果。

第四次错失良机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本来，如果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总结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推行前任已启动的改革以及利用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其创造的改革的政治前提，可把改革推进一大步，但他不仅经济改革半途而废，并且政治体制出现倒退，这样在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浪费了 18 年的时间。这一切向人们清楚地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的停滞，导致苏联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

第五次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1985 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执政七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1）经济体制仍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2）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效益下降趋势得不到遏制；（3）农业继续衰退；（4）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是拉大的趋势；（5）越来越难以应对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6）社会危机因素在增加；（7）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戈尔巴乔夫上台最初采取的一个行动是，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与著名学者，对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并作出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作出苏联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这个调研材料，也是后来戈尔巴乔夫撰写《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重要素材。戈尔巴乔夫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强调不能把人视为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而是应该把人当做主人，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戈尔巴乔夫认为，应该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着手根本改造经济机制，目的是解决企业内在动力，发挥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其总目标是使企业成为真正的

商品生产者。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阻碍机制的作用已非常强大，1988 年之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往往处于空转状态，主要阻力来自政治体制。在此背景下，1988 年 6 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会议，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专门有一个题目："始终如一地实行根本的经济改革"。在这次会议上，他把社会主义新形象最后归结为是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后期，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最终亦以失败告终，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改革。到了这个时期，由于以往历次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改革，只是对传统体制进行修修补补，这样，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已是积重难返，政治体制方面的阻碍机制作用越来越大，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力图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十分困难了。正如资中筠主编的《冷眼向洋》一书中所说："70～80 年代，苏联体制病入膏肓"，"待到 80 年代中期，一代新人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已然为时晚矣"，"当这久病不愈的机体已经溃败，而手术台边又缺少这么几位高明的医师时，一场毫无把握的手术的结果，就是把病人送进太平间"。[①]

综上所述，不论从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条件来讲，还是从苏联改革的实践来看，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改革，正如胡绳指出的："20 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

---

① 转引自《同舟共进》2007 年第 11 期。

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① 1991年底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事实，亦明确无误地证明，不改革是死路一条。同样也证明，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停顿与政治体制改革倒退，导致了苏联走近衰亡。

2.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之所以成为苏联历史上一个全面停滞的时期，是苏联走近衰亡的时期，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期不仅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出现了倒退，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教训。

（1）要着力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实际上是实行党领导一切的做法，从而使党政合一、以党代政的制度进一步发展。这种党政不分的制度，使得国家事务、政府行政事务都受制于党，从而使党陷于日常行政事务，处于行政工作的第一线，这不仅削弱了党的领导，并且在客观上为维护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一些领导人专制独断提供了制度保证。

（2）正确对待斯大林与斯大林模式

勃列日涅夫政治体制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仅不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深入进行下去，即进一步揭示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悄悄地重新

① 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斯大林主义化，其主要目的是维护斯大林模式。这样就不可能对导致苏联剧变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在这个模式条件下，苏共垄断了权力，垄断了真理，垄断了利益。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如果能在正确认识斯大林及其创建的社会主义模式基础上，在这不算短的 18 年期间对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在推进苏联进步方面有可能作出大的贡献。遗憾的是，他没有顺着历史发展潮流而进，结果是严重阻滞了苏联的发展。

至于对斯大林，绝不像有人说的，在俄罗斯全国掀起了“重评斯大林的高潮”，“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①] 就是在 2010 年，在为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举行的庆祝二战胜利 65 周年的活动期间，俄罗斯领导人也一再谴责了斯大林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行。梅德韦杰夫总统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个人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2011 年 1 月中旬召开的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梅德韦杰夫说，斯大林对自己人民犯下了大量罪行，不允许美化斯大林，今后要全面解密政治迫害档案。实在难以理解的是，时至今日有人还以“九评”作为评价斯大林的标准。读这些看法，真让人有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一反斯大林就有人“如丧考妣”[②] 的感觉。有人还引用了据说是斯大林 1943 年说过的话：“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

① 刘书林等：《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 1、5 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 15 页。

毫不留情把那些垃圾刮走。”有人紧接着说：这个“历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吹起来了”。[①]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所希望的那个历史的风并没刮起，而是刮起了一阵阵要求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之风；刮起了一阵阵要求建立给人民生活幸福和有尊严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风；刮起了一阵阵要求消除独裁、暴力、践踏人权和滥杀无辜之风。可以说，这个历史的风一直在强劲地刮着，可以肯定，这股风谁也阻挡不了，因为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

(3) 实现党内民主是推行民主制度的关键

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斯大林时期不断破坏党内民主制度，最后使苏共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没有人敢对斯大林说半个不字。赫鲁晓夫虽反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但后来他亦搞个人崇拜。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在站稳了脚跟、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之后，也同样搞起个人崇拜。从这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度集权体制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性基础，而个人崇拜又是党内缺乏民主的伴随物。少数人乃至一个人说了算，作出重大决策，一旦出现问题又没有人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这是党内缺乏民主的普遍性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重大问题往往在小圈子里决定，党内讨论问题往往流于形式，在这种条件下，苏联的民主政治无从谈起。

(4) 消除政治体制改革的两大障碍

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情况来看，政治体制倒退虽有多种原因，但最为重要的，一是维护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二是理论上“左”的教条主义。这两个问题前文都已有论述，这里只对第二点再作强调。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持不同观点者挥舞政治大棒，乃至

① 刘书林等：《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第85页。

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加以打压，长期坚持“左”的教条主义，其结果是导致理论僵化与改革停滞。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 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永远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理论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座右铭。勃列日涅夫时期严密地控制文化意识形态，造成了全民的沉默，而苏联同时亦在全民沉默中走近衰亡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3. 关于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的问题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把斯大林确立的一些社会主义理论视为经典，因此如果在改革过程中背离了这些“经典”理论，都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个原因，决定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坚持批“市场社会主义”，坚持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从来不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政治体制改革也从不朝民主化方向发展。

而所谓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这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

4. 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不少俄罗斯学者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全面停滞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43页。

的原因时指出，它与一味地、片面地维持“稳定”有关。勃列日涅夫靠稳定来维持其领导地位，为此，也用稳定来压制改革，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勃列日涅夫的关键问题与他成功攫取国家最高政治地位的秘密完全一致。这个秘密就叫稳定。”① 我认为，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给人们留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这个时期，苏联最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体制上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缓解矛盾，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当然，改革的力度要根据当时社会承受的能力。但我们同时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改革都是权利在各阶层的一种调整，都会打破原来的平衡，从而也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波动，之后出现新的平衡。如果只是求稳怕乱，不敢冒一点风险，最后只能是问题越来越多，积重难返，走向停滞。实际上，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稳定也不应该以放弃改革而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为代价。我们要特别警惕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换取社会短暂的、积聚大量矛盾与问题的稳定，最后为苏联衰亡创造条件，这个惨痛的教训值得总结与吸取。

5.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考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缘何从增长率递减发展到停滞，那么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是，这个时期的苏联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从粗放经济转向集约化道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 1971 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正式提出了这

① 〔俄〕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 230 页。

个问题。之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说到底是受经济体制的制约，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论述。这个问题长期拖了下来，一直到苏联剧变20年后的当今俄罗斯来讲，其经济仍受其严重影响，20年来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在俄罗斯也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前进，俄罗斯!》一文中指出："我们大部分企业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得可耻。这还不是很糟糕。最糟糕的是：企业经理、工程师和官员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低效的经济，半苏联式的社会环境……所有这些对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都是很大的问题。"2010年1月12日，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会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一个会议上讲："俄罗斯每生产一吨钢，要比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多消耗两倍的电力，每生产一吨化肥要比阿拉伯国家多耗费五倍的电力。"

至于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独立以来一直在努力从资源出口型向以高新技术、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但并未取得多大进展，梅德韦杰夫总统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指出："二十年激烈的改革也没有让我们的国家从熟悉的原料依赖中摆脱出来。""简单的依靠原料出口来换取成品的习惯导致了经济长期的落后。"他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应不应该把初级的原材料经济……带到我们的未来?"目前，俄罗斯能源等原材料出口占出口总额的80%左右，高科技产品出口不仅数量少，而且逐年下降。2004年俄罗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世界中的比重为0.13%，这一比例比菲律宾少67%，比泰国少78%，比墨西哥少90%，比马来西亚和中国少92%，比韩国少94%。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受能源与其他原材料产品国际市场

价格大幅度下跌的影响，2009 年俄罗斯 GDP 下降了 7.9%。

以上的情况告诉我们：第一，一个国家实现经济转型，不能只局限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应与此同时，适时地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阻碍因素是经济体制问题；第三，不论一个国家资源条件有多么优越，不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益，更不可能使经济现代化，最后迟早会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走近衰亡的时期，与他执政 18 年未能改变落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在研究中国体制改革时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第二部分

专题讨论



何迪：我们有幸请到陆南泉老师，讲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的原因及其后果。之所以提出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看到陆老师《苏联走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章，感到其中的观点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今天，来参加讨论的有新朋友、老朋友，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下面，先请陆老师介绍他的主要观点。

陆南泉　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的原因及严重后果

谢谢博源基金会的邀请。我是50年代中期到苏联留学的，大概待了四年半。之后又去考察，前后加起来，在苏联待了大概六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我的主要精力都是在研究苏联的体制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更加关注苏联的转轨问题。2007年，我出版了一本书——《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历史跨度90年（即1917～2007年），主要是写苏联经济的体制改革史。其中，勃列日涅夫这部分占的比例也比较大。究竟应该怎么看勃列日涅夫时期？我自己定了一个题目，叫《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的原因及严重后果》。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这个时间的确是很长。但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研究很薄弱。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1991年苏联发生剧变以后，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研究苏联发生剧变的原因，似乎勃列日涅夫时期跟苏联的兴衰关系不太大，因而忽视了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同时，勃列日涅夫时期比较平稳，没有像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多的事。诸如，斯大林时期，搞农业全盘集体化、超高速工业化，又搞

“大清洗”，以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然后这个模式发展到其他国家，从而使苏联模式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上来以后，二十大报告主要是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58年展开了经济体制的大辩论，又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口号，还提出要埋葬帝国主义的豪言壮语，这个时期也是很热闹，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赫鲁晓夫时期。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因为苏联垮台毕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大家怎么研究戈尔巴乔夫，特别是他提到了什么新思维，提出了全人类高于一切究竟怎么看，都成了学术界讨论的重要问题。在1991年垮台以后，人们很自然对戈尔巴乔夫时期更加重视，进一步探讨问题。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来讲，表面上是平静稳定的，这是为什么中国对勃列日涅夫这一时期研究比较差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初，苏联经济保持了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核武器与美国持平，真是不可一世。因而，有人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最强盛的时期。正是由于这两个因素，我们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不像别的时期那么深入。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讲四个问题，供大家研究讨论。

一　勃列日涅夫上台初始实行调整与改革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在强调不改变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大路线方针的同时，主要是调整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在改变赫鲁晓夫时期新政策的时候，还要坚持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大的方针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党内议论纷纷，出于“宫廷政变”合法性的考虑，勃列日涅夫不得

不强调这一点。

调整政策涉及几个方面。第一，1964 年，取消赫鲁晓夫按生产原则建立的工业党和农业党组织，改为按地区原则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和领导机构。第二，1965 年，取消赫鲁晓夫时期实行的 106 个经济行政区的管理原则，恢复原来的部门管理原则。第三，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建立了“三驾马车”（即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第四，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改进党的作风，强调民主和法制。第五，没有全面否定赫鲁晓夫，而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后期实施的经济改革试验。

勃列日涅夫刚上台时，苏联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经济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因此，他也主张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扭转经济下滑的局面。1965 年 3 月，苏共中央召开解决农业问题的全会，通过了解决农业问题的具体措施。为什么当时农业问题那么尖锐呢？这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执政以来，一直实行剥夺农民的政策。因此，在他执政后期，农业问题已经很糟糕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这缘于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模式的一个基本政策，就是把农业看作工业化的“殖民地”，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支撑国家的工业化。

1965 年 9 月，苏共中央全会又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即“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确定了三项改革原则和目标：第一，扩大企业自主权，提高企业经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第二，由用行政方法转向以行政方法和经济方法结合，最后实现以经济方法为主的原则；第三，解决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利益结构的问题。应该说，这是符合苏联当时的情况的。我国刚改

革开放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这个思路，通过放权让利，来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经济形势比较好，扭转了经济下滑的趋势，使他站稳了脚跟。然而，从70年代上半期开始，就逐渐走向保守、僵化。

二 为什么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改革停滞？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出现停滞的一个大背景是故步自封。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此后，一直到他去世前，有关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充斥着苏联，都是讲发达社会主义如何如何，文化是什么样的，经济是什么样的，体制是什么样的。发达社会主义基本含义是什么呢？我翻阅过大量的材料，实际上，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就是三条：一是说苏联已建成一个新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到了成熟的阶段；二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改造，已经处于完成阶段；三是已经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结论是，苏联面临的只是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需要再进行重大改革，更不用说是根本性的改革。

70年代上半期，苏联国内的因循守旧势力占了支配的地位。在勃列日涅夫周围，有一大批保守分子。当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无论是调整，还是改革探索，也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改革从一开始就强调不能影响集中统一的原则。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勃列日涅夫时期通过的各项决议、政策，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不能改变集中统一的原则，经济

管理的集中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一直到 1981 年，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勃列日涅夫还强调说，党一直把计划看作法律。这不仅因为计划是由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还因为只有遵循计划，才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在高度集中的体制条件下，行政管理机构一直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把权力紧紧掌握在政府手里。

第二，改革引发的权力之争和利益冲突。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官僚机构庞大，而且党控制一切。从最高领导层的讲话中可以发现，他们害怕改革会使其失去对经济和财政大权的控制，管理机关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例如，把原来的工业管理四到六级改为二到三级，领导人就不甘心被撤掉，地方管理机构怕丢了自己的企业，削弱了自己掌控的经济资源，也反对这样搞。在中央管理机关中，最糟糕的是国家计委。我记得，有一次会见匈牙利经济代表团时，匈牙利学者跟我说，改革的阻力是计委。只要有计委的存在，什么事都做不成。党政官僚机构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要想打破，阻力非常大。

第三，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过去，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所谓体制模式实际上是理论模式。勃列日涅夫对市场经济始终持否定态度，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一种邪说，是企图冲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像所有制理论的探讨，不能涉及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最高、最成熟的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我认为，勃列日涅夫的意识形态存在两大误区，一个是批判市场社会经济，一个是所有制理论不能动，国有企业不能动。所以，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非商品派理论一直占主导地位，少数主张搞市场调节的理论家一直受到压制。在国际问题上，也

是如此。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助长了苏联国内保守势力的发展。因为捷克当时改革的前提条件，就是脱离斯大林模式。所以，勃列日涅夫下决心镇压。在他们看来，离开这一模式，就是离开了社会主义。

第四，政治体制倒退制约了经济改革。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党政不分、个人集权、独断专行现象越来越严重。1976 年底，在庆祝勃列日涅夫生日的时候，掀起了颂扬勃列日涅夫的高潮，在报刊上开辟了 7 天专栏，阿谀奉承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77 年，勃列日涅夫当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又是党的总书记，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体制又回到了斯大林时期，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干部终身制，出现了严重的干部老化现象。比如，二十六大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个都没变，完全是原班人马。

第五，实行对外扩张政策，特别是战略核武器，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国家财政的二分之一要用到这方面，所以他不可能搞削弱集权体制的改革。

当然，在集权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品行，对改革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勃列日涅夫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理论水平差，不爱学习，不懂经济。后来，苏联报刊在评价他的时候说，要让勃列日涅夫讲出一句准确的经济术语都很困难。他办事很谨慎，善于妥协，爱慕虚荣。他非常喜欢荣誉奖状，一生得了多少奖状和勋章呢？有 200 多枚。给他送葬的时候，由 44 名军官捧着这些勋章。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人提出新的思想，提出新的理论呢！所以，我认为，制约勃列日涅夫改革的阻碍因素很多，指望他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三 改革停滞不前产生的严重后果

应该说，改革停滞产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我大致理了一下，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导致经济增长明显递减和停滞。1966～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是最好的5年；1971～1975年开始下滑；1976～1982年下降了4.2%，1982年是勃列日涅夫去世那一年，降至3.3%。这个下降趋势还不能说明问题，实际情况更严重。戈尔巴乔夫上来以后，组织中央主要经济部门和经济学家做了一次调查，以了解苏联经济到了什么程度，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其中一个重要结论，反映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果去掉油价大幅度上涨的因素，再去掉酒性饮料因素，3个五年计划的国民收入实际上是没有增长。

第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效的经济没有改变。70年代初期，苏联面临一个重要任务是，怎样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当时，粗放经济条件已经不具备了，靠大量投资、大规模劳动力和大量的消耗原材料，来支撑经济增长已不可能。资源开发的条件越来越恶化，所以勃列日涅夫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在其执政的18年中，不仅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投入产出比例越来越粗放。比如，1976年，每投入1个卢布的基本建设投资产生的国民收入是18.9戈比；到了1980年，投入1个卢布的投资回收率是11.9戈比。基本建设战线越来越长，投资分散越来越严重，没有完成的工业项目大量增加。现在，我们中国领导人不断地讲，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经济停滞和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遏制了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一时期，跟美国大搞军备竞赛，国家实力达到了鼎盛时期；但片面发展军事工业，是靠牺牲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的。在苏联，斯大林讲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后来教科书改为“充分满足”，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这个时期，农业问题越来越大。从 1973 年开始，苏联成了一个粮食净进口国，每年粮食进口是 2500 万～3000 万吨。1979～1982 年，粮食连续四年减产，打破了苏联农业的一般规律。当时，由于苏联到处抢购粮食，引起了一些粮食主要靠进口的国家的抗议。当时的农业书记是戈尔巴乔夫。他的重要任务就是筹集资金，购买粮食，保证国内市场供应。后来，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经济已相当困难。过去，有些文章说，苏联出现转轨危机，主要是因为叶利钦搞了休克疗法。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长期以来的经济停滞、结构不合理，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已无回天之力。

第四，特权阶层扩大化和稳定化。由于勃列日涅夫搞了干部终身制，特权阶层被稳定下来。实际上，特权阶层并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才有的，斯大林时期也有。但是，斯大林时期有一个特点，今天上一批，过一段时间会杀掉一批，这个阶层不固定，经常变化。而勃列日涅夫搞干部终身制以后，则比较稳定。据统计，当时的特权阶层大概有 50 万到 70 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大体上为 300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1.5%。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权阶层与斯大林时期相比，还是有区别的，不单单是一个稳定一个不稳定，一个人数多一个人数少的问题。在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主要是维护和巩固斯大林模式，服从于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任务是抵制实行新的改革，维持现状。

第五，社会政治问题日趋严重。这个问题表现在几个

方面：一是对党的领导人不信任。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老百姓对领导人在讲台上讲的和报纸上宣传的东西都不相信，官僚主义、行政专权史无前例地泛滥，社会道德的堕落越来越严重。盗窃、吸毒、青少年暴力犯罪越来越多；文化艺术下流低俗，精神空虚；贪污、行贿越来越严重。社会科学方面，理论研究越来越教条化、僵化，有创新意义的思想理论被排斥于社会科学领域，肤浅的、伪证的推断开始泛滥。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道德都持有不同的见解，并且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出现呢？我认为，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从根本上来讲，在苏联一直存在对斯大林模式的不同看法；二是赫鲁晓夫反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又悄悄斯大林主义化，对这种回潮、倒退的趋势，这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促使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勃列日涅夫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开除党籍，免职，判刑，强制劳改，驱逐到国外去，让他离开莫斯科，不让他见新闻记者等办法；还有很毒辣的手段，将这些人送到精神病医院；采用这些办法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四 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有几点想法。

第一，如何对勃列日涅夫执政的 18 年进行历史定位。简单地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国家政治进入了全面停滞的时期。这个时期，积累了大量问题，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时期，它为苏联后来的

垮台准备了条件。因此，我感到，不对这个时期进行深入研究，很难理解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的苏联。同时，在苏联的各个时期，由于没有对斯大林创建的高度的集权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失去了很多改革的机遇，这一体制走向衰亡是历史的必然。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尽管倡导改革，但已无回天之力，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不能将苏联的解体简单地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之过。

第二，改革的停滞是导致全面停滞的一个主要因素。导致改革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理论创新，缺乏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没有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与时俱进，提出新的理论，当然不可能有体制创新。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与倒退，是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苏联的情况看，尽管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进行了改革，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退回去了。我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进行。

第四，不能用稳定压制改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以稳定遏制改革，贯穿整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和问题只会日益积累，最终拖累了经济发展。所以，以保持稳定为由，来压制改革，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第五，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显然，勃列日涅夫反对市场经济，反对所有制改革，反对否定斯大林模式。那么，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我认为，改革的方向，不能简单归结为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否则，马上就面临一系列问题：斯大林搞的是否是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前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你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应该跳出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站在新的高度来认识改革方向。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

的，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取向的。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普世价值观，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正等等，这些应成为我们改革的基本取向。普世价值是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也是全人类普遍认可、接受和追求的一种价值，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应该为实现普世价值作出努力，作出贡献。所以，我认为，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这个方向，不要去争论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里顺便说一下，关于怎么去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问题。现在，一些人讲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经济市场化，政治高度集权；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奥妙所在。我认为，这种模式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不能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闻一　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大的问题是丧失民心

我基本上同意陆南泉教授讲的观点，他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总结，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今天是讨论，同意的就不说了，我就说说不同意的。在陆南泉教授的报告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陆南泉教授讲，勃列日涅夫时期没什么大事。我觉得，这个判断不是很充分的。第二个问题是，先讲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后来又讲他不改革。我认为，这中间是矛盾的。我觉得，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我们中国学者研究最不充分的领域，也是我们目前想进一步研究的领域。现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有许多矛盾，有许多困难，听了陆南泉教授讲的，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包括进去。当然，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档案还没有公开，现在没有看到比较完整的解密材料，我只能从外交方面获得的资料来谈一些看法。

要谈勃列日涅夫时期，不能把经济孤立地作为一个领域来看。我们在研究苏联历史过程时，常常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斯大林时期。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反复思考，我觉得，如果把苏联历史进程中的许多问题归罪于斯大林时期，那是不完全公正的。的确，斯大林模式产生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还不足以触及民心到反叛的地

步。为什么苏联人民没有起来反对斯大林？斯大林的社会制度为什么没在他那个时期垮台？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斯大林在社会上制造了很多矛盾，但这些矛盾最终没有发展到刺伤苏联民心使民众起来反对这个社会制度程度。而真正促使苏联社会解体的，就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斯大林时期那些政策，是打着无产阶级革命国际主义旗号的。我们说集体化不好，工业化不好，但是当时很多老百姓宁可相信斯大林的话，宁可相信苏联政府，宁可勒紧裤带，期待着有一天，我们可以过上领导人所阐述的光明的、富有的、灿烂的共产主义，人心没有完全丧失。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有几件事使苏联的人心完全丧失。

首先，从布拉格之春到阿富汗战争，尤其是阿富汗战争，现在很多档案解密了，尽管不是很全，我们可以研究怎么打的，怎么撤的。但是，在苏联进行阿富汗战争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忽略了研究这场战争对苏联人民精神的瓦解。我看到的材料表明，当年发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苏联人民是极端不愿意的，因为送自己的子女去打仗，送的时候就知道是回不来的，这场战争不可能给苏联人民带来直接利益。而在斯大林时期，他可以说把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搞好了，生活就可以富有。作为普通老百姓，感受不到阿富汗战争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因此，这场战争的进行，不在于损失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武器，丧失了多少国力，而在于人民不再相信苏联政府为进行这场战争而打出的漂亮的国际主义旗号。从布拉格之春一直到阿富汗战争的消耗，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认为，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研究阿富汗战争，应该把重点放在这场战争对苏联民心起了多大的破坏和振荡作用。我这次去俄罗斯 25 天，走了 12 个城市。不访问官员，不访问学者，就靠两条腿走路，自己来观

察。我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无论政府多艰难，国家多艰难，只要民心相信你，这个政权就能坚持下去。如果丧失民心，再怎样进行蛊惑、宣传，最终也会垮台。

第二，陆南泉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老化问题，我认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政权面临的不是干部年龄老化的问题，要比这个问题严重得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整个领导阶层严重官僚化和有组织地集体贪污腐败，裙带关系，官官相护。实际上，苏联官员贪污腐败的最大红伞就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已经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在摄取全社会的资源。当安德罗波夫要改革的时候，想改变这个贪污腐败的现状，就是动不了。这样一个党，这样一个政府，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会存在这么大规模、有组织的贪污腐败，最后导致没有关系、没有金钱就什么事也办不了的程度。这个问题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我们经常注意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石油、天然气。确实，西方报刊当年讲过的，石油、天然气的收入给将死的苏联打了一剂强心针。我觉得，勃列日涅夫时期没什么改革，他一开始讲的那些东西不是改革。因此，陆南泉说的改革和停滞是矛盾的，既然停滞了，就不是改革。在俄罗斯人看来，讲停滞不是说的勃列日涅夫后期，而是从他执掌政权开始，他就不主张改革。

第四，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苏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赫鲁晓夫跟毛泽东关系很不好。勃列日涅夫一上台，我国政府发给勃列日涅夫贺信，调子是非常高的，包括他在过生日的时候，也是这样。应该说，中苏关系突然缓和，突然改善，是中国方面对勃列日涅夫执政的一种支持；而这种支持赫鲁晓夫是没能得到的。

最后一点，在全世界范围来讲，在斯大林时期，苏

联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霸权国家。真正成为霸权、霸主国家的，恰恰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它能够发展成为对全世界具有威慑力量的，且能和美国在全世界所有地区抗衡的霸权国家？尽管它的石油、天然气是很主要的因素，但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军事力量的发展，军事力量的主导，成为这个国家决定一切的东西。

因此，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非常复杂，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导致苏联体制最后解体的催化剂；或者说，是勃列日涅夫给了致命的一击。在苏联解体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不起什么重要作用。倒霉的是，这个历史时刻落到他头上了。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其他人，苏联也会解体。我认为，应该从一个新的比较全面的方面看待勃列日涅夫。

前天，我们所里开国际会议，来了几十位专家。我和一个俄罗斯人谈，现在俄罗斯有个倾向性的东西，俄罗斯人都不喜欢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不像中国人那么到处嚷嚷，我这次走了12个城市，拍了4500张照片，我没有看到街头政治宣传的标语，人心很宽松。从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到现在，俄罗斯人现在是处于一个心境比较宽松的时期，并不像我们国内某些学者，某些记者所写的那样，经济危机造成了多么重要的损失。俄罗斯现在商品市场琳琅满目，社会整体有序，人心不像前几年那样紧张、怀疑，而是比较舒坦，也没人查护照，警察也不管你。现在，有人说，普京、梅德韦杰夫重蹈斯大林覆辙，我想这是个笑话。看看事实，就会承认，这个国家至少回不到斯大林时代，也回不到勃列日涅夫时代。

（闻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龙闪　意识形态化与既得利益阶层是改革滞后的根本原因

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最突出的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问题。苏联是一个典型的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无论什么问题都从意识形态出发，连执政的合法性也基于意识形态。在赫鲁晓夫时期，由于对斯大林的批判，实际上是个思想大解放。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思想完全退回去了。中国跟勃列日涅夫是互相误会，让他们的国防部长搞坏了，要不然会非常合拍的。当时，毛泽东跟勃列日涅夫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一样的。在意识形态方面，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计划经济，勃列日涅夫时期搞的还是斯大林的那一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能改？

第二个原因是既得利益阶层。勃列日涅夫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把握着权力，管理机构非常庞大，干部特权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谁都不愿放弃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能改。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高放　汲取苏联教训，关键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在我看来，今天讨论的问题，不是作为历史学者来研究外国历史，而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考虑从苏联剧变当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此推进我们国家的改革，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

从 1950 年开始，我就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苏联共产党党史。当时所讲的马列主义基础原理，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因此，马列主义基础课，实际上讲的就是苏联历史，后来扩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到今天，这个课我整整教了 60 年。

1956 年以前，我对苏联体制崇拜得五体投地，以为苏联经验都是对的。苏共二十大，我开始清醒一点，认为苏联存在很多问题。到了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就意识到中国此前搞的是超苏联模式。从 1979 年开始，我写的文章和讲课就提出苏联根本问题在哪里。应该说，苏联剧变在我心中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看了不少材料。简单地说，人们把苏联剧变归纳为六点原因，即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空想，列宁的激进，斯大林的模式，赫鲁晓夫的背叛，

勃列日涅夫拖延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葬送。我个人同意第三点原因，即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搞的体制。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文明史的歧路》，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他给贵州省委党校尹振环写的《列宁主义批判》一书作序。这本书是根据一个不可靠的材料来批判列宁主义的，即所谓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书中透露，普列汉诺夫早就意识到，苏联不能搞社会主义，所以十月革命一开始就是错的。有很多老同学、老朋友问我："你是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辛子陵的文章认为，苏联问题不是体制问题，而是道路问题。也就是说，落后国家不应该搞社会主义，应该是发达国家先搞。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路走错了。你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在20世纪，社会主义先在不发达国家实验，这是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不是哪一个人决定的。如果群众没有要求，社会发展没有要求，列宁一个人能搞成十月革命吗？是搞不成的。所以，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是一种实验，是一种探索。不发达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封建主义糟粕很多，而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够多。因此，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是要清除封建主义的各种影响，充分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苏联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没有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是过多地继承了封建主义。尽管列宁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列宁有一个优点，有党内民主、党内自由，党内各派别可以提出不同观点，可以通过党代会进行争论，按照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斯大林搞的体制，不是列宁体制。很多同志认为，斯大林搞的是高度集权体制。我认为，这样概括斯大林体制是不准确的。斯大林的体制是过度集权，高度、过度，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在特定历史时期，高度集权是

必要的；在任何情况下，过度集权都是过头。斯大林体制的要害是政治体制，最要害的是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这三制都是斯大林带头搞的，都不是列宁搞的。这三制说明，从斯大林时期起，苏联实际上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制度最根本区别就是这三制。民主共和国家是权力制约制、权力任期制、权力选举制。斯大林搞的是权力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还搞了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等级任命制，控制选举制，高干特权制，铲除异己制，监控干群制。正因为斯大林搞了这十制，所以斯大林其他一系列错误就没办法改。好多学生问我，苏联为什么出不了邓小平、胡耀邦这样的人物？道理很简单，如果有邓小平、胡耀邦这样有独立思想的人物，早就被斯大林杀掉了。

1978 年以来，中国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从封闭转向开放，从单一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中国现在的模式仍然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苏联模式，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所以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官商勾结越来越多，腐败越来越厉害。有人问我："你觉得中国模式怎么样？"我说："中国模式是四不象的模式，有一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一部分苏联模式，还有一部分美国模式，恐怕还有欧盟一些国家的模式。"

我觉得，中国下一步要从苏联剧变根本原因中吸取教训，中国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是危险的，很可能在若干年后步苏联共产党的后尘。我觉得，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盛世危言，逆耳忠言。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秦晓　追问斯大林模式产生的思想基础

在谈到苏联问题时，人们通常将之概括为“斯大林模式”。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这个概念？在座的很多人是苏联问题专家，我没有专门研究，但我认为“斯大林模式”、苏联的解体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和思想的问题。

沈志华老师提出另一种说法，叫做“列宁—斯大林模式”。这意味着，我们是不是要从斯大林模式再往前追溯，进一步谈列宁的问题。我认为，列宁搞“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目标和发展方向，而是被迫采取的调整。所以，后来倒退回来也是必然的。在列宁时期，党国体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国有企业制度（“制高点”理论）等一些体制和思想都已形成。这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体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列宁以前，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形成完整的体系。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出现的问题有些是后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之的偏离、变身和异化，有些则是马克思学说本身的局限。对于这个历史演变过程，要不要反思和清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斯大林，不再往前追问了，对于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就难以有一

个深刻的、历史性的认识。

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做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一个是唯物史观，一个是劳动价值论，被后人视为马克思学说的两大支柱，并将之演变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就造成了对马克思学说的曲解、僵化和封闭。“文革”后我们已经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如股份制、鼓励非公企业、按要素分配等实际上也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价值理论。

追溯到马克思，不仅仅是要对马克思理论体系重新认识、理解，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学说后来演变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而意识形态则不是科学，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是和科学相反的。意识形态需要信仰，科学则倡导怀疑；意识形态不能证实、证伪，科学可以。我们的改革不仅是体制的转轨，也是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仍未完成，在主流话语中，在一些对内、对外的政策上依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总之，我们在谈到苏联问题时，解析斯大林模式是非常重要的，“斯大林模式”已为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所抛弃，但“斯大林模式”的思想基础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理，要继续推进中国的现代社会建设就不能只停留在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上。

（秦晓，博源基金会理事长）

沈志华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研究很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把社会主义问题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改革初期，邓小平不让争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先抓耗子，别的先甭管。现在，耗子已经抓到手了，还得回过头来搞清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很多问题都很难往下谈。客观地讲，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一派学者提出的一套思想体系。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现在还用一百年前的理论教条地指导今天的具体国策，肯定会出问题的。

对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很赞同秦晓讲的观点。简单地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必须要追溯到马克思。上大学的时候，高放老师跟我们讲科学社会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共产主义才从空想变成科学。我现在琢磨出来，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苏联成功了，手段可行了，有很多国家就照这个理论掌握了政权。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我们搞历史研究的时候，经常是同样一件事，希特勒杀人，就说法西斯主义；斯大林杀人，就说杀得好！二战期间，瓜分波兰是德国和苏联一块儿干的，怎么能说德国

就是法西斯主义，苏联就是国际共产主义？我们评价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的时候，如果采用双重标准，就根本没法儿科学地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苏联究竟是个什么社会？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不是成功的？事实上，它已经失败了。

以往，我们对东欧和苏联剧变的研究，基本上利用两方面材料，第一是公开报道，第二是回忆录。从历史研究角度来讲，这两个都不是核心材料，核心材料是原始档案，是背后怎么商量的。所以，以往对苏联和东欧剧变的研究，不是在历史的层面上。为什么？因为档案都没解密，至少没有全面解密。2010 年 5 月份，我到东欧七个国家走了一圈。我去了所有国家的档案馆，档案已经全部解密，特别是共产党的档案没有解密期的限制，完全开放了。从历史的角度看，把历史过程真正搞清楚，对于最后做政治性结论是很有好处的。

最近，我在研究斯大林最后八年冷战到底是怎么发起的。在我看来，苏联的船走到最后，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最后撞墙就碎了。其实，它本来是有机会回头的，这就涉及冷战到底怎么发生的。斯大林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看到了苏联社会面临的困境。战后，苏联地位的上升，也使他客观上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所以，他决定跟美国合作，但是为什么短短两年，就重新爆发冲突，冷战就重新起来了呢？我的结论是，二战以后，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思想体系，解决利益平衡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解决了问题，斯大林也非常满意。但是，为什么美苏合作没有继续走下去？是制度问题。制度还是对立的，意识形态还是对立的。所以，就不可能永久地解决和平与平衡问题。斯大林在冷战背景下又回过头，苏联政治体制越来越僵化。赫鲁晓夫那会儿，也有一个机会和条件，但很大程度上与中

国有关，失去了机会。所以，体制越走越僵化，没有出路。现在，我们还是面临这个问题。地缘政治的平衡容易达到，但是，在根本制度对立的情况下，永久解决是不可能的。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三部分

相关链接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代新沙皇

高　放

在苏联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是继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之后的第四任党政首脑。以往中国研究勃氏的学术成果较少，当今我们考察苏联兴亡74年全史时，应该看到勃氏统治的18年，几乎占1/4长度。它是属于停滞和走向灭亡的时期，又一次错失了进行社会主义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自我改革的大好时机。这时表面上苏联人民生活大有改善，工资和集体农庄庄员收入提高约1倍，物价基本稳定，社会在高压下显得相当稳定。对此高高在上的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更加自满自足，实际上这个时期苏联模式的积弊更为加深，斯大林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过度集权的体制不但没有改革，反而更加严重，特别是表现为苏联在经济上逐步陷入困境，在政治上僵化、保守，领导层老化，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现象日趋严重，对外扩张背上沉重包袱，外交上陷入孤立，进退维谷，社会潜在的危机四伏。这就为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灭亡铺平了道路。

在当今客观、冷静、公正评价苏联兴亡的历史经验教

训时，要求我们历史学者对勃列日涅夫在苏联74年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定性、定位和定名。经过长期思考，用简单的文字来概括，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是苏联第三代新沙皇。

一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是第一代新沙皇和第二代新沙皇

最早给勃氏戴上“新沙皇”帽子是在1969年。那一年3月2日苏联军队在勃氏指令下，悍然入侵中国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人员多名。为此，《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于3月4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文中指出：苏联对东欧国家和对我国的一系列侵略行径，使全世界人民看清了苏联领导人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市曾经举行盛大的群众示威游行，抗议苏军入侵我国珍宝岛。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员工的游行队伍，手持写满标语口号的小红旗，从西郊步行到城区，还路过东直门附近的苏联驻华大使馆，振臂高呼：“打倒新沙皇!”“打倒社会帝国主义!”喊声如雷贯耳，响震遐迩。随后《人民日报》在4月24日又发表《新沙皇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的文章，揭露了苏联各族人民遭受迫害的惨状。可见当时认定勃列日涅夫是新沙皇，显然不是光指他的对外扩张侵略行径，而且也包括他在国内的反动专制统治。从那时起，我就时常考虑：在苏联历任党政首脑中，勃氏是否是第一个或者唯一的新沙皇？改革开放以来，我重新研究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我认为，苏联历史上的新沙皇，斯大林是第一代，赫鲁晓夫是第二代，勃列日涅夫是第三代。这三代新沙皇既一以贯之、一脉相承，又略有变化，各具特点。

要辨明这个问题，先要认清老沙皇的由来和特点。俄国历史上第一代沙皇是莫斯科公国的第11个王公伊凡四世。他于1547年加冕为“沙皇”，自比为古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撒”与“沙”发音近似）。从1547年第一代沙皇登基到1917年末代沙皇被革命人民推翻，俄国370年间共有过23个沙皇的统治。老沙皇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前300多年间是封建农奴制度，1861年被迫自上而下废除了农奴制度后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也同英、法、德等国一样，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1861~1917年老沙皇又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老沙皇的基本政治制度是通行君主专制，主要是这样三种政治体制：其一，君主集权制，沙皇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其二，君主终身制，沙皇没有任期，终身独掌大权；其三，指定继承制，由老沙皇指定其子、其妻或其孙等继承皇位。老沙皇还实行官僚等级授职制、官僚特权制等，豢养一个官僚特权集团作为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基础。老沙皇的基本文化制度是鼓吹皇权主义，宣扬对沙皇的个人崇拜，把沙皇说成是“上帝的使者”，通过东正教和各种文化媒体向臣民灌输忠君爱国、安分守己的思想，尽力维护社会的安定。老沙皇的基本国策是对内专制独裁，严厉统治臣民，以维护封建农奴制度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对外实行军事扩张，从第一代沙皇到末代沙皇，国土面积扩张了约10倍。老沙皇因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危机加深。1917年2月俄国爆发民主革命，人民群众终于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软弱无力，未能使俄国走上西方立宪民主的道路，未能满足广大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迫切需要。这样以弗·伊·列宁为首的工人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即多数派就争取到多数工农兵的

支持，于1917年举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国经济文化落后，不具备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但是俄国的工农兵却在二月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种新的基层政权政治组织形式。

列宁认为，俄国可以把工农兵创造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化经济和社会主义大众化文化。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三种体制。其一权力制约制。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出身农民家庭、当过镟工的革命家加里宁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实际上即国家主席；领导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托洛茨基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苏维埃共和国采用这种“三人驾车”模式，分权制约，共同治理国家。1922年俄共（布）才设立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由斯大林担任，专管党中央日常工作，不在政府兼职。其二权力任期制。1918年苏俄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都没有规定国家领导人的任期，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经引用俄国思想家、文学家屠格涅夫的话对托洛茨基说过：“人到55岁开外就败事有余。”[①]意即到那个岁数就要退休，不能搞终身制。其三权力选举制。1918年苏俄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都规定国家领导人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下一届领导人也是选举产生，不能由上一届领导人指定接班人。至于俄共（布）中央领导人的接班问题，列宁在1922～1923年病重期间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其中并没有授意由何人接班，只是指明原有主要领导人每个人的优缺点，主张

① 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第675页。

扩大中央委员名额，增强集体领导。列宁还特别指明："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斯大林太粗暴"，应该挑选另外一个人接替他的职位。①

列宁主政5年多初步开创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度，在1924年1月21日列宁溘然长逝后，即遭到斯大林逐步破坏。首先，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部争取到多数支持者，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其次，从1925年至1929年，他把党中央内部三个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都清洗出党，进而诬陷他们是"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大多予以处决；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又冤杀冤关了300多万人，被他镇压的共产党人总数远超过老沙皇100多倍。这样斯大林在党内就完成了总书记个人专断制。1941年斯大林进而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和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他任职到1953年3月5日73岁中风过世，又带头实行职务终身制。1952年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他授意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代替他在大会上作中央工作报告，并把马林科夫列为新的中央书记处名单的第一位，这显然是指定他为接班人。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显然是老沙皇的皇帝集权制、皇权终身制和皇位指定继承制那"三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延续和翻版。斯大林还加深了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干部层层任命制、官员特权制等，尤其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培植了党政军高薪高官特权集团。斯大林不仅对内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严密控制压制人民，纵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且对外实行扩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5~746页。

张。例如，1917年十月革命后已经脱离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又于1940年并入苏联领土。斯大林时期比老沙皇时期领土又增加60万平方公里（包括1929年占领中国东北的黑瞎子岛），达到2240万平方公里，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其领土约等于美国两倍半。他在1945年9月2日发表的《告人民书》中回顾1904年俄日战争沙皇俄国被打败的惨史，说现在终于打败日本，夺回被日本占领去的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使苏联在东方有出海口了。[①] 斯大林还真像是以新沙皇的口气吐露告慰老沙皇在天之灵的心声。所以我认为，斯大林虽然功绩巨大、功大于过，但是在特定意义上把他定位定名为第一代新沙皇还是恰如其分，并不为过的。与老沙皇有所不同的是：他旨在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即便那是带有官有制色彩的公有制），而不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信奉共产主义理想（尽管含有空想成分并且急于求成），而不是宣扬东正教的“弥赛亚”普世主义。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是第二代新沙皇。赫氏于1953年9月取代马林科夫担任苏共中央首脑之后，曾经改革斯大林体制的某些弊病。例如，他把总书记改称为第一书记，要加强集体领导，实行党政分开，自己不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猛烈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经济文化体制也有一些变动。但是他在地位巩固之后故态复萌，又恢复了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制。1958年3月赫鲁晓夫以党中央第一书记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独揽党政大权，又煽起对自己的个人崇拜。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新党章规定中央领导人“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

① 《斯大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62，第437~439页。

但是又写明：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者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多的时间内进入领导机关”。[①] 这显然是赫氏为自己搞终身制提供组织依据。赫氏在党内国内依旧实行专制。他于1957年把党内反对他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1952年苏共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近70%被他清除了。赫氏多次对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进行血腥镇压。1962年乌克兰、乌兹别克、西伯利亚等地的多次武装抗暴斗争，也都遭到野蛮镇压。赫氏还于1956年派兵干预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同时加强对东欧各国的控制；1962年为加强控制古巴，把导弹秘密运往古巴，引发了“加勒比海危机”，差一点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赫氏由于主观主义决策独断专行，在党内遭到很多人反对。1964年10月14日他终于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迫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他无法实行终身制，更没有料到他预定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竟然提前接班了。然而赫氏统治苏联11年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确实是苏联第二代新沙皇。

二　勃列日涅夫怎样成为第三代新沙皇？

第一，按照斯大林带头定下来的老体制、老规矩，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预定的接班人，得到党中央主席团成员绝大多数拥戴，顺利晋升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冶金工人家庭，中学毕业后自己也当过冶金工人，后来他又取得了农学院和冶金学院毕业文凭和工程师称号。勃氏于1931年加入联共（布）党，20世纪30年代主要在他的故乡第聂伯从事地

①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209页。

方党政领导工作。1941～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勃氏担任过红军团（旅）政委、军（军区）政治部主任。战后勃列日涅夫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深得他的顶头上司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赏识。1949年12月赫鲁晓夫升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后，就把勃氏推荐给斯大林，从此他平步青云，稳步高升。1950年夏勃列日涅夫升任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勃氏当选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即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党中央书记，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勃氏继续当选连任这三个职务。1957年6月勃列日涅夫支持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斗争，被升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核心。这时勃氏即把他故乡的一批老部下调进莫斯科，形成"第聂伯帮"。1960～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即国家元首。1963年4月赫鲁晓夫意中的接班人、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突然中风不起，同年6月赫氏即调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1964年7月，勃列日涅夫辞去国家元首虚职，专任苏共中央书记，也就是说勃列日涅夫这时实际上已经是苏共中央的第二把手，是赫氏预定的接班人。勃氏比赫氏小12岁，这一年（1964年）赫氏已经70岁，勃氏才58岁。如果任由赫氏也像斯大林那样搞终身制，他何时才能接班呢？勃氏心中不免悬念此事。真是天赐良机，1964年秋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在密谋"倒赫"时勃氏成为主角。勃氏善于联络，沟通苏共中央主席团大多数成员，所以在10月14日中央全会上"倒赫"成功后当即选举他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第二，勃列日涅夫大搞个人集权制。勃氏刚上台，照样大讲要加强集体领导，以安抚党心、民心。新的领导班

子表面上是“三人驾车”模式，即勃列日涅夫任党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了防止再现斯大林、赫鲁晓夫那样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为了实行党政分开，1964 年 10 月中央全会还专门做出决议：今后决不容许一个人同时兼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这两个职务。勃氏明知中央委员会选举他为第一书记只是把他作为过渡性人物，为了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他必须处心积虑地逐步独揽党政军三大权。首先，在 1966 年 4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上，勃氏把赫鲁晓夫于 1953 年 9 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定下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这个职务又改为总书记，把斯大林于 1952 年 10 月苏共十九大上定下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改称政治局，并且在大会通过的部分修改党章的决议中增加了“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①] 别以为这是无关宏旨、无足轻重的规定。自从 1922 年 4 月俄共（布）党十一届一中全会决定在中央书记处设总书记以来，在历次党章中从未出现过“总书记”一词。即是说总书记本来只是党中央书记处的首脑，它并非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谓，所以党章中从未写有“总书记”。列宁晚年在党建问题上的疏漏是在设立总书记的同时，没有在党中央设立主席。这样就便于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之后以总书记名义掌握了党中央大权。即便这样，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在新党章中写上“总书记”。他在中央下发文件中还时常只写“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现在勃列日涅夫在党章中写明“总书记”，那么他就是名正言顺地集最高党权于己身了。1971 年苏共二十四大，勃列日涅夫进而修改党章，把斯大林于 1952 年苏共十九大上定下来的每隔四年至少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 262 页。

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改为“每五年至少召开一次”。这样离列宁在1917年就定下的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的年会制就更远了，党内民主就更少了。五年之中都不开党代会，那样党的最高权力实际都归党中央了。其次，勃列日涅夫还掌握国家最高权力。1936年苏联宪法规定最高苏维埃是苏联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可是在斯大林体制中最高苏维埃已经变成“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已转归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手中。鉴于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已决定今后党政首脑不能由同一人兼任，为此勃氏就想出另外一种高招。这就是由他再去兼任从1960年到1964年他曾经当过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样就要修改宪法，把原是空头的国家元首改为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首脑，也就是使苏联由原来类似西方国家的内阁制（实权在政府总理）改变为总统制。勃氏经过精心操控，终于在1977年5月24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免去原任政治局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波德戈尔内的党政职务，同时决定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10月7日通过的苏联新宪法，扩大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团的权力。这样勃氏就以新的方式又实现了党政合一。到1980年10月23日，勃氏进而免去主张经济改革的柯西金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勃氏亲信取而代之。这样勃氏上台之初的“三人驾车”体制就变为由他个人独揽党政大权了。最后，勃氏还要掌握军权。鉴于赫鲁晓夫没有直接把军权紧紧抓在手里，这样就便于勃氏在“倒赫”政变中联络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逼迫赫氏下台，所以勃氏上台后还要恢复斯大林的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的铁三角体制。1977年6月勃氏在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同时，又兼任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而且在1977年10月7日通过的

新宪法中增加了这样一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组织苏联国防委员会和批准其成员”。至此，勃列日涅夫就完全是斯大林式的新沙皇了。

第三，勃氏还要跟斯大林一样，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本来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后不久，苏共中央已明文规定：凡年满70岁者不能在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但是勃氏还要从斯大林的成功和赫鲁晓夫的功败垂成中充分汲取经验教训，挖空心思要搞终身制。首先，在完成个人集权制的同时，一定要大力鼓吹个人崇拜，在文化宣传舆论上形成个人崇拜制，这样才能为终身制奠定思想基础。勃氏深知在斯大林逝世和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全党全国都批判过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但是他利令智昏，还是执意在党内国内又掀起个人崇拜的第三次浪潮。报刊上把勃氏吹捧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当今的列宁”，经常发表歌颂他功绩的新闻和文稿。全国出现众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乡、街道和企业。1966年勃氏的60岁生日时被授予金星奖章，1976年70岁寿辰时被授予元帅军衔，在全国还上演反映他一生功绩的大型传记影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1978年发表的他人捉刀代笔撰写的回忆录，后来发行高达1800万册。其次，勃氏要巩固并扩大党政官僚集团，作为维护他的个人集权制和终身制的社会基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最初培植高薪特权集团之时，高低工资差距约为30倍，到50年代初期斯大林晚年已扩大到约50倍。赫鲁晓夫时期进行改革时曾经为缩小差距降低了一些高工资，遭到广大高级干部的反对，这也是赫氏被迫下台的因素之一。鉴于历史经验教训，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经济实力更加雄厚了，勃氏就大幅度提高高干工资，高低工资差距竟达到约100倍。况且，高干除了高工资之外还有诸多特权，如特供商店、高级轿

车、宽敞公寓、休假旅费、海滨别墅等等，俨然是社会主义贵族阶层，这样岂不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最后，勃氏为了能够做到终身任职，还善于灵活温和稳妥地处理领导层中的人事关系，求得宫廷内部平衡稳定，相安共处，以免祸起萧墙或者留下冤假错案和骂名。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错定了三个反党集团、30年代镇压了300多万人，赫鲁晓夫在50年代还定了一个反党集团。勃列日涅夫时期不采取这些极端做法。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1977年被免职后让他安心静养五年，为他送终；原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1980年10月被免职后，12月即病卒；原“倒赫”集团主谋谢列平在勃氏上台后擢升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可谓权倾一时，成为勃氏劲敌。勃氏费尽心思，花了11年时间才把谢氏这四大要职逐个剥夺掉，最后将其调任苏联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副主席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总之，勃列日涅夫依靠第聂伯帮为支柱，统治苏联18年之久。1976年勃氏满70岁时，健康状况愈益恶化（他60多岁时已患过心脏病和脑血管梗塞，而且长期患失眠症），本应按照中央的规定70岁退休。可是他贪恋权位，拒不退位，硬要搞终身制。最后几年，勃氏每天只能工作3～4小时，在大会上念别人起草的稿子时常出错，还非要在电视上频频出现。他拖到1982年11月10日病故，享年76岁。勃氏是苏联党政首脑搞终身制活得时间最长的第三代新沙皇。

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18年之久，照样对内压迫人民，对外侵略扩张。勃氏在国内设置了1000多个“劳动改造营”，关押了100多万敢于反抗者。从1967年起勃氏下令调动军队多次镇压了阿塞拜疆、哈萨克、乌克兰、乌兹别克等地少数民族的抗议活动，使苏联又成为像老沙皇时期

那样的“民族大监狱”。勃氏在1968年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捷人民的独立自主运动；1969年入侵中国珍宝岛和新疆地区；1979年出动10万大军强占阿富汗，征战10年之久才被迫撤离。勃氏除了更加严密控制东欧各国和蒙古这些卫星国之外，还大肆向亚非拉三大洲扩张，与美国争霸世界。勃列日涅夫继承并发展斯大林开创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以及对内压制、对外扩张的基本方针，表明他确实是第三代新沙皇。勃氏上台后搬进斯大林原来住过的孔策沃别墅后，曾经得意地对身边人说过：“我就是沙皇。”这也印证了，在他的心目中斯大林是第一代新沙皇。

直到勃氏逝世前一天，他还到克里姆林宫主政，绝对没有想到当晚就会归天，所以他没有明确指定谁是接班人。但是在他最后抱病苦撑危局的几年里，已经形成由他掌控的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为主的一个影子内阁在主持日常工作。所以勃氏死后，安德罗波夫即顺理成章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安氏虽然锐意改革，但是拖延到68岁才以带病之躯接班，只主政1年又3个月，于1984年2月9日病故。随后是另一个比安德罗波夫还大3岁、已经73岁的病夫契尔年科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契氏思想保守，反对改革，只上任1年又1个月，于1985年3月10日病故。随后，按着党内几个元老的主意，在安·葛罗米柯等人的支持下，挑选出54岁的戈尔巴乔夫作为契氏的继任者。1985年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最后这3个总书记任期都很短，都没有能够成为一代。但是他们仍然承袭了旧体制和旧方针，所以这3个领导人依旧是新沙皇。由于3代新沙皇在60年之中沉积下来的旧体制、旧方针的弊端积重难返，以致

最后这三个新沙皇已经回天无力。在国内外各种压力合围冲击之下，终于迫使戈尔巴乔夫从 1987 年转而去引进西方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那种政治体制，结果导致苏联于 1991 年解体，苏共也自行消亡。由于俄国老沙皇君主专制制度长远深重影响，即便俄罗斯转轨到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之后，仍然还出现了像叶利钦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新沙皇。叶利钦当上俄罗斯总统之后，依然是搞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叶氏当了近 10 年总统，期间还发生过 1993 年 10 月叶氏下令军队炮打俄议会大厦白宫的“十月事件”。六年后，心力交瘁、统治地位难以为继的叶利钦，于 1999 年 12 月 31 日，以体弱多病为由，突然宣布辞职，并指定普京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三　简要的结束语

纵观苏联 74 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 18 年是注定苏联自取灭亡的决定性的阶段。如果勃氏能够幡然悔悟，从体制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使最高苏维埃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行党政分开，恢复列宁定下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使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中央政治局转向党代表大会，废除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废除高干高薪特权，以党内民主来推进苏维埃民主，使苏联人民真正能够当家做主，不对外扩张，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也许苏联还不至于灭亡。如果勃氏能够在 70 岁时按规定退休，不搞终身制，给继任者们增加 6 年改革时间，也许苏联也还有救。历史上朝代兴亡更替有其发展演变进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老沙皇制度虽然亡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

世，但是其父皇亚历山大三世，因畏惧遭受革命党人暗杀，自我禁锢宫中，在全国加强警察恐怖统治，初期略作一些改革以收买人心，后期转向反对改革乃激化社会矛盾，这就注定了沙皇制度必然灭亡。所以与其说沙俄亡于尼古拉二世，不如说它亡于亚历山大三世统治那 13 年（1881～1894 年）的暴政。鉴之我国历史，也可以得到明证。有明史专家这样说：明朝虽然亡于末代皇帝思宗崇祯朱由检，实则亡于神宗万历朱翊钧。因为万历长达 48 年的专横统治，明朝已经走向衰败。也可以进而说，清朝虽然亡于末代皇帝宣统溥仪，实则亡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皇太后的残暴干政。所以苏联虽然亡于末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实则亡于第三代新沙皇勃列日涅夫。这绝非由于勃氏搞“非斯大林化”，而正是由于他承袭了斯大林开创的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又一次延误了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后迫使苏联去搞体制外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招致苏联灭亡。这才是苏联灭亡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千万不可被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而看不清问题的本质和实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报刊上发表了多篇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的很有见地的文章。如严秀（曾彦修）的《闲话勃列日涅夫》（《百年潮》1998 年第 2 期），陆南泉的《苏联走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6 期），叶书宗的《“庸才”治国——勃列日涅夫何以能当政 18 年》（《探索与争鸣》2007 年第 7 期）。尤其是出版有四部专著：（1）吴伟著《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年 9 月出版，约 26 万字；（2）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第 4 分册：勃列日涅夫和安—契过渡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 6 月出版，约 28 万字；（3）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出版，约 29 万字，此书由 20 位作者合写，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协调组专项课题；（4）郭春生著《勃列日涅夫 18 年》，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4 月出版，约 28 万字。这四部专著都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等等作了全方位的考察，都指明了勃氏主政时期由于停滞而对后来苏联的发展和灭亡起了消极作用。最新出版的郭春生的这本专著还着重剖析了苏联特权阶层与苏联社会停滞及苏联剧变的关系，引人深思。统观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迄今似乎还没有见到把勃列日涅夫作为第三代新沙皇来集中论述其政治体制基本构架及其与第一代、第二代新沙皇的历史联系的内容。

我以耄耋之年病弱之躯，在盛夏酷暑中费心尽力来写了这篇长达万言的序文。此举但愿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勃列日涅夫所坚持的基本政治体制的特征、由来及其在促使苏联灭亡中的历史惯性作用。如果我们能够从中汲取教训，大力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我国就必能彻底改革掉苏联模式的弊端，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能够唤起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增进共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千秋伟业取得全面成功，则炎黄子孙幸甚！幸甚！

（原载《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0 年第 5 期）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

（根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资料）

闻　一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如下："致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同志们！鉴于年已古稀并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我请求苏共中央满足我的请求，解除我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鉴于上述原因，我已不可能履行我所承担的职务。我向苏共中央保证我将把我的余生和精力献给为党和苏联人民的幸福、为建成共产主义的利益而工作。赫鲁晓夫。"①

32年来，对于这份文件，对于赫鲁晓夫的"自动退休"，对于勃列日涅夫几乎在一夜间就成了苏联的新的最高领导人，历史学家有过无数的评述和争议，致使1964年10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

① 转引自《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然而，1964 年 10 月毕竟是十分重要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一个重要时代在这个月结束，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另一个重要的时代在这个月开始。随着当年这些事件参与者的回忆录的陆续问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十月全会”部分档案的解密，我们今天就有可能对 1964 年 10 月苏联领导人的更迭和路线及方针的变动做出新的评述。

1964 年 10 月是有准备的

1964 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十月全会”并不是突发事件。它是反对赫鲁晓夫路线的领导人所精心准备的一场重大行动的最终结局，是赫鲁晓夫离开苏联最高执政舞台的落幕尾声。

赫鲁晓夫原来想在 11 ~ 12 月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讨论国家的农业状况等重要问题。[①] 苏共最高层领导人却利用这一机会收集反赫鲁晓夫的材料，并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根据现有的材料，这一工作在 7 月就开始了。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后来提及此事时说：“现在常常可以听到和读到关于反对赫鲁晓夫的某种阴谋的说法。情况不是这样的。当然，全会要进行筹备，而这件事是复杂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应该去了解中央委员们对赫鲁晓夫行为和错误的态度。”[②] 这种反赫鲁晓夫的组织工作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般是没有第三者参加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诺维科夫回忆说，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乌斯季诺夫曾把他找去，要

① 谢·赫鲁晓夫：《全苏意义的退休者》，《莫斯科》，1991。

② 《苏共二十二大后——和尼·格·叶戈雷切夫谈话录》，《苏共党史问题》1991 年第 5 期。

他从经济计划工作的角度准备反赫鲁晓夫的材料，要向中央领导人证明“赫鲁晓夫搞得一团糟”，“我问：‘是不是准备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乌斯季诺夫予以肯定。我又提出一个问题：军队和克格勃将持何种态度？答复是：这方面没有问题，将会全力支持。我当即表示同意”。[①] 在公开场合，中央领导人绝对回避这种谈话。叶戈雷切夫对此有过记载。但他肯定地说：“他们所有的人都在准备在中央全会上来讨论苏共二十二大后在党内形成的状况。”[②]

到9月时，这种秘密的组织工作还是被赫鲁晓夫得知了。现在有两份回忆录证实了这一情况。一份是叶戈雷切夫的。他是这样叙述的：“……事情发生在1964年的秋初。一天早晨，勃列日涅夫给我打城市公用电话，要我在去中央上班前到他那里去一下。同一天早晨约8时，我和他见了面。列昂尼德·伊里奇处于惊恐状态之中。他脸色苍白，双手发抖。他把我带进里面的房间，小声说：‘一切都完了。赫鲁晓夫知道了筹备全会的细节。’我说：‘难道这有什么不合法的？召开中央全会并不违背党章。’列昂尼德·伊里奇说：‘你对他不了解，他会把我们大家都枪毙掉的。’勃列日涅夫又说了些张惶失措的话。他完全泄了气。我劝他说：‘我们的行为中没有什么不符合党性的，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了，应当捍卫二十二大的路线。’”[③] 叶戈雷切夫没有指明谁告诉赫鲁晓夫的，只是说是“他们”中的某个人。

---

① 《历史问题》1989年第2期。

② 《苏共二十大后——和尼·格·叶戈雷切夫谈话录》，《苏共党史》1991年第5期。

③ 《苏共二十大后——和尼·格·叶戈雷切夫谈话录》，《苏共党史》1991年第5期。

另一份是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的回忆。9月下旬，一个叫加柳科夫的人向他讲述了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密谋反对赫鲁晓夫的一些情况。这个密谋牵涉到了包括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谢列平、谢米恰斯内、伊格拉托夫在内的一系列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谢尔盖把此事告诉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听后先是持怀疑态度。他的第一反应是："不，难以置信……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是完全不相同的人。这不可能。伊格拉托夫有可能。他很不满，并且总的来说，他这个人不好。可他和他们能有什么共同点呢?"赫鲁晓夫当即关照谢尔盖"对谁也不要讲"，[1] 事后他曾经通过米高扬查询此事，但直到10月12日也没有任何结果。

所以，反对赫鲁晓夫的组织行动在经过一阵骚乱之后，走上了最后的坚决的步骤。10月12日，当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一起在皮聪大和成功围绕地球飞行三圈的宇航员通话，向他们表示祝贺时，在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大多数委员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主席团委员沃龙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里申、叶夫列莫夫，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杰米契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和谢列平。他们在撤销赫鲁晓夫职务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2] 与会者以苏共中央全会的名义做出一份"绝密"决议——《关于因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和制订新时期的远景国民经济计划而出现的问题》。这份决议不长，全文如下：

---

① 谢·赫鲁晓夫：《全苏意义的退休者》，第108页。

② 《赫鲁晓夫是怎样被撤职的》，《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1. 鉴于计划于今年11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的问题的主要性质和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中所出现的不明情况，苏共中央不断接到询问，因此认为在赫鲁晓夫同志参加的最近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会上对此予以讨论是刻不容缓的和必须的。责成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同志与赫鲁晓夫同志电话联系，将定于1964年10月13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本决议通知他。

2. 鉴于赫鲁晓夫同志于1964年7月18日向各级党组织散发的《关于对转向集约化道路的农业的领导》（No. n1130）的信件在地方上所引起的混乱和其中所包含的前后不相联系的指示，从各级党组织撤回这一信件。

3. 考虑到所出现的问题的性质和即将对此进行讨论的重要意义，认为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召至莫斯科听取向全会所作的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些问题的总结报告是适宜的。

关于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时间在赫鲁晓夫同志到达时决定。

苏共中央主席团[①]

从这份决议可以看出：（1）这次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召开的会议是撇开了赫鲁晓夫的。这是反对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们在对其实行最后裁决前的统一行动，是一次缺席审判；（2）实际上，这份决议列出了赫鲁晓夫即将受到谴责的原因：他对农业前后不相联系的指示所造成的混乱状况，但决议却只字没有提及苏共二十、二十一

① 转引自《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和二十二大的方针路线；（3）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不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在 11 月，而是要提前，“在赫鲁晓夫到达时决定”。这个时间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出其不意的。

所以，赫鲁晓夫在“十月全会”上被撤职的命运实际上不是在这个全会上，而是在这个全会以前的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召开的这次会议上决定了的。

赫鲁晓夫和反对者的最后较量

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于 13 日上午回到莫斯科。同一天又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会。这次会议是由赫鲁晓夫本人主持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对赫鲁晓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抨击几乎都集中在赫鲁晓夫的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上，概括起来有下述几点：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他人，不理睬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在干部问题上独断专行，不能克制自己，作风粗暴，自我标榜和吹嘘。他的身兼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等一系列事实成为人们进行抨击的依据。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执政十年的功过提出全面的看法，也几乎没有人提及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大的方针和路线。与会者的一致要求是以“自动退休”的办法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

据说这次会议没有进行记录，所以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至今不得而知。但“据参加会议的人回忆，会议进行得十分激烈。赫鲁晓夫不同意‘自动退休’。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才不得不屈服，并且在事先准备好的退休声明上签了字”。[①] 然而事实上这份退休声明也不是他自己

① 《赫鲁晓夫是怎样被撤职的》，《历史档案》1993 年第 1 期。

写的。在他签署这份退休声明前，他还讲了一些话。这些话至今听起来还是令人有深思的余地的："你们大家在这里对我的不好的品质和行为谈了许多，也谈到了我的好的品质，为此我谢谢你们。我不打算和你们进行斗争，当然我也不能够。我和你们一起与反党集团作过斗争。我珍惜你们的真诚。而我却用另一种方法来对待你们，请原谅我犯下的粗鲁……在这里所讲的许多事情我不记得了，但我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我表现得软弱，没有注意行为不端的现象。我曾试图不拥有两个职位，但这两个职位正是你们给我的！即使我是个有才能的人，我也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的错误就在于我没有把这个问题提交苏共二十二大……现在我激动和高兴，因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可以监督第一书记的活动并能公开讲话的时代已经到来……今天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就是党的胜利。我想我是应当离开了。但是，生活是挖苦人的。我自己看到，我对付不了事情了，我和你们中的任何人没有了来往。我脱离了你们，为此你们今天狠狠地批评我，而我自己也是自食其果。我从不玩牌，也不打台球。我总是在工作。我感谢你们给我提供了退休的机会。生活再也不需要我了。我请求你们，为我写份声明，我来签字。为了党的利益我准备去做一切。我在党内已46年了，请理解我！我想，也许你们会考虑可以给我安排个荣誉职位，但我不向你们要求这个职位。我在哪里生活，由你们决定。只要该做，我准备到任何地方去。我再次谢谢你们的批评，谢谢这些年来和我一起工作，谢谢你们准备给我退休的机会。"① 当时的另一些会议的参加者的笔记也证实了赫鲁晓夫有这样的讲话，尽管每个人的

① 摘自"十月全会"的参加者、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谢列平的笔记，转引自《历史难题》，《莫斯科》，1991。

文字记载上略有不同。①

赫鲁晓夫的这个充满伤感色彩的独白否定了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一个论点，即他在中央主席团全会上没有进行过反抗。赫鲁晓夫至少在两个问题上进行了自我辩护，尽管方式是婉转的，无可奈何的。第一，他在身兼两职这个重大问题上不承认是自己的过错，相反，他指出恰恰是批评他的那些委员们使他处于这种地位的。他自己的过错就在于他没有和这种不正确现象作斗争，“没有把这个问题提交苏共二十二大”。第二，他语意双关地说：“我的主要错误就是我表现得软弱，没有注意行为不端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他在讲述对自己落到这样一个处境得出的教训，也在间接地指责主席团的委员们迫使其“自动退休”的不端行为。

这是赫鲁晓夫和反对他的人们的最后一次较量。在13日深夜和14日凌晨苏共中央主席团又通过一份“绝密”决议——《在中央主席团中所出现的问题和在苏共中央活动中恢复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的措施》，标志着这次较量以赫鲁晓夫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决议全文如下：

鉴于因赫鲁晓夫同志破坏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出现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行为，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央主席团内形成了十分不正常的局面，妨碍了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去履行领导党和国家的职责。

赫鲁晓夫同志占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把大权集中在自己的手上，在一系列情况下开始离开苏共中央的监督，不再考虑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的意见，在不经必要的集体

① 谢·赫鲁晓夫：《全苏意义的退休者》，第158～163页。

讨论的情况下决定极其重大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对主席团和中央的同志们表现得不容异见和粗暴，轻视他们的意见，在实际实现苏共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大的决议所制定的路线中犯下了一系列重大错误。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由于所形成的作为一名工作人员的不良的个人品质、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赫鲁晓夫同志已不可能纠正所犯的错误和非党的工作方法。同时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所提交的声明，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

1. 满足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请求。

2. 承认今后由一人身兼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是不合宜的。

3. 认为必须于 1964 年 10 月 14 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责成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召开全会。

责成米·亚·苏斯洛夫同志以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作报告。

苏共中央主席团[1]

从这份决议可以看出，对赫鲁晓夫的指责依然集中在他的个人不良品质和工作作风上。决议提到了苏共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大的路线和方针，但措辞是十分明确的，赫鲁晓夫的错误是其不容异见和粗暴的工作作风在实际贯彻这一路线和方针中犯下的错误，而不是路线方针本身的错误。

---

① 转引自《历史档案》1993 的第 1 期。

一个时代的结束：苏斯洛夫的“末日审判”

正式的苏共中央全会是在10月14日下午开始的。在全会正式开始之前，勃列日涅夫作了简短发言，介绍了前两天主席团会议的情况。他的讲话与主席团的决议有了明显的差异，他不仅把中央主席团的不正常状况，而且把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混乱和失误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他说：“中央主席团中的局面是不正常的，其责任主要在赫鲁晓夫同志，他走上了破坏集体领导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突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中央主席团一致得出结论，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仓促的指示及其领导国民经济的考虑不周的唯意志论的行为，产生了严重混乱，出现了被没完没了的改革和改组所掩盖的严重失误。”①

这次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苏斯洛夫列数赫鲁晓夫过失的报告。他在全会上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读完了这篇报告。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赫鲁晓夫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的抨击。苏斯洛夫的报告是十分零乱的，归纳起来大概有下述两点，（1）赫鲁晓夫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的意志，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渐渐地把这种原则“置诸脑后”。他独揽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大权，但并不总是能正确地利用这些权力，“最近一个时期他甚至实质上个人来决定重大的问题，粗暴地将自己主观主义的，常常是完全错误的意见强加于人。他狂妄自大地认为自己永远正确，自以为自己对真理有垄断权”。他还“不断地搞阴谋活动，竭力离间主席团委员”。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主席团工作中的不正常状

① 转引自《历史档案》1993的第1期。

态。（2）赫鲁晓夫在工作中不接受苏共中央和主席团的监督，自行其是。苏斯洛夫在这方面举的例子甚为零碎，有赫鲁晓夫在"7月全会"上未经主席团事先同意就发表讲话，有他随意要解散农科院的指示，有他"实际上剥夺了主席团委员到地方去的权利"的做法，有他在颁发苏联各种奖章上的随意行为，有他派自己的女婿阿朱别依充当私人代表出国访问的事。苏斯洛夫用词最严厉的是指责赫鲁晓夫实际上不召开主席团和中央全会。他说，赫鲁晓夫所召开的"全会"都是有五六千人参加的大会，在这种会上，发言者都是对赫鲁晓夫歌功颂德。苏斯洛夫认为，赫鲁晓夫是"有意识这么做的，为的是避开中央委员们可能的批评"。苏斯洛夫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些不正确行为只能解释成是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而且这些行为已具有了要予以坚决回击的危险性质。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苏斯洛夫列举了在这种不正确的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下赫鲁晓夫所犯的错误——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错误。内政方面，苏斯洛夫认为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是表现在对农业的领导上。他说，"赫鲁晓夫同志试图把对农业的领导权垄断在自己手中。在中央除了他谁也不能来负责农业，因为赫鲁晓夫同志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农业行家"。赫鲁晓夫的"玉米政策"和"向日葵政策"也受到了猛烈的批评。苏斯洛夫说，"近年来，赫鲁晓夫同志对农业工作者的指示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讽刺说："这不是领导，而是真正的旋转木马。"

此外，苏斯洛夫特别着眼于农业和工业的改革，对赫鲁晓夫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指责。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大量的信件及其所包含的没完没了的改革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真正折腾得头朝下脚朝上，瓦解了地方党组织，并在

他们中间散布了不信任的感情。”这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赫鲁晓夫试图“以政治部来代替生产管理部门的党组织”。苏斯洛夫为此举出了赫鲁晓夫于1964年7月18日发给各级党组织的信，认为这封信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消除党组织对农业的领导，千方百计地贬低党的机构。二是赫鲁晓夫甚至提出要取消生产的区域管理，由州和边疆区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直接进行领导。

在工业方面，苏斯洛夫所指责的同样是赫鲁晓夫对工业的改组。他认为苏联工业的发展情况要比农业好一些，但也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外行指示的干扰，他在国民经济的这个领域内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未经深思熟虑的措施，进行了一系列匆忙的改革，“致使科学和生产相脱离，阻碍了技术进步的发展”。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方面，苏斯洛夫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制订好了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但他突然又提出了他个人的七年或者八年计划。这就在计划的制订工作中产生了混乱，使计划人员无所适从，“使远景计划的制订工作进入了死胡同”。赫鲁晓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掩盖当前的七年计划的任务在一些最主要的指标上没有完成的事实”。[①] 在内政方面，苏斯洛夫特别加以谴责的是赫鲁晓夫按生产原则对党组织的改组。他认为这种改组所造成的结果是党组织、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在职能、权力和职责上的混乱和交叉，使它们在工作中产生平行和重复，极大地降低了苏维埃的作用。赫鲁晓夫所进行的改组人为地将苏维埃分成了两部分，使一个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政权变成了工人的和农民的各自为政的政权。他说，这种改革是在赫鲁晓夫的压力下进行

① 转引自《历史档案》1993的第1期。

的，“这些措施貌似创造性地发展党建和国家机构建设的列宁主义原则，但实际上是从列宁有关这一问题的指示和苏共纲领的要求的后退”。

在外交政策方面，苏斯洛夫承认苏共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但他指出，赫鲁晓夫在解决一些国际问题上有时表现出了匆忙和不够严肃认真。他所举的例子是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者越来越厚颜无耻，正在贯彻使国际局势紧张化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在从事分裂的反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执行旨在加强和兄弟党的领导、和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联系与友谊的极有耐心的、克制的和灵活的政策”。

苏斯洛夫还批评赫鲁晓夫喜欢在完全不必要的情况下教训兄弟党的领导人，总爱充当“指导者”的角色。他列举了赫鲁晓夫教训罗马尼亚领导种玉米的事和在与哥穆尔卡的谈判中断然表示不再接受波兰生产的安-2型飞机。

苏斯洛夫在结束报告时读了我们在本文开始时所引用的那份赫鲁晓夫的“退休声明”和我们在前面引用过的苏共中央10月13~14日的那份决议。当会议厅中有人建议“不用进行讨论”时，主持会议的勃列日涅夫就说：“同志们！你们的建议和主席团的意见相吻合。还有谁要坚持讨论吗?”于是，这份决议就被中央全会所通过。接着，勃列日涅夫建议选举中央第一书记和审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人选问题。这时大厅里又有说：“我们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第一书记。”于是，在“谁赞成”、“谁反对”、“谁弃权”的最简单的表决方式中，主持会议的波德戈尔内宣布“勃列日涅夫全票当选”。又以同样的方式选举出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个过程是非常

匆忙的，据参加会议的人回忆，也只不过进行了半个来小时。①

由此可以看出，“十月全会”对赫鲁晓夫的抨击和裁决是其主要内容，尽管这一抨击和裁决是形式上的，或者说是将中央主席团的已经不可变更的决定赋予一个合法的形式。苏斯洛夫宣读的是对赫鲁晓夫的“起诉书”，“十月全会”，对赫鲁晓夫进行的是一场“末日审判”。赫鲁晓夫就在这“末日审判”中匆匆下台，勃列日涅夫就在这“末日审判”中匆匆上台。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但一切又是那么矛盾，那么富于悲喜剧的色彩。

对苏联领导人更迭的新审视

我们在这里引用的“十月全会”的记录并不是会议现场的记录。据不少参加会议的人后来回忆，苏斯洛夫的报告是讲得杂乱无章的。会后中央主席团责成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对记录进行加工，随后以“记录报告”为题，印发给有关负责人，上面注明“绝密”，“不得复印”和“三月内必须送还苏共中央”的字样。现在解密的是这份记录，档案中已经找不到原始记录。

根据一系列回忆和研究文章，这份经过加工的记录基本上保持了苏斯洛夫原发言的主要内容和精神。从所有解密的文件来看，第一，与会者都同意苏斯洛夫讲话中对赫鲁晓夫的指责，甚至抨击；第二，与会者都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台上和台下所共有的情绪所造成的：苏斯洛夫对赫

① 转引自《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鲁晓夫的领导方法及个人作风的指责是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都亲身领教过的。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越来越独行其是，越来越自我迷信并让全党全国迷信自己，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居然同意并陶醉于“宇宙之父”的“封号”。他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作风越来越粗暴，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对他由不满、害怕、敢怒不敢言、窃窃私议到产生反对和反抗的意识和行动是势在必行的事。赫鲁晓夫的领导方法和个人作风已成了当时政治局势中的一个“热点”和“引爆点”。与会的领导人在这个“热点”上支持苏斯洛夫的讲话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行动就是理所当然的。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反对赫鲁晓夫的最高领导人也正是利用了中央委员们的这种愤懑情绪。至于赫鲁晓夫的这种作风是不是发展到了无法改正和“具有了要坚决予以回击的危险性质”，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不少与会者多年后曾作过公正的评说。当年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沃龙诺夫在1988年回忆说：“10月全会的评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赫鲁晓夫错误的扩大，也就把他所做的主要的事，正确的事都一笔勾销，予以否定了。”①

事实上，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因素是双重的。从赫鲁晓夫这方面来讲，他执政十年来的方针政策的发展方向促使他走上了垮台的道路。

第一，他领导的威信和执政的成就是建立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基础之上的。而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在他的意识里，似乎平反了冤假错案，斯大林个人迷信所造成的危害就会消除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他把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首先只看成是一种个

① 《消息报》1988年11月17日。

人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他在苏共二十大的那篇著名的报告里主要是罗列了斯大林的过错和罪行，而对产生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渊源和组织干部等等因素或是一言以蔽之，或是根本就没有作出认真的分析。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并没有在事实上采取认真的措施来保证在今后的党和国家的生活中不再出现斯大林这样的个人迷信，他并没有从制度上来解决党的领袖的活动要接受党组织监督这一极其重大的问题。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在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过程中并不反对别人对他的颂扬和溢美之词，满足、纵容，直至赞赏他人为自己树立个人迷信的形象，并且最终走上了他迷信自己也让他人迷信自己的道路。严格讲来，赫鲁晓夫所反对的只是斯大林个人的个人迷信，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个人迷信，这种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他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上所做的一切将会成为把他送上被告席的依据。历史证明，这真的成了他垮台的重要原因。

第二，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难题。赫鲁晓夫来自基层，在多年从政生涯中又一直十分关注农业问题。他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即苏联的农业还很落后，不解决农业问题苏联就无法顺利前进。赫鲁晓夫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抓住了这个机遇。可以说，他执政的 10 年基本也就是他抓苏联农业的 10 年。开荒，种玉米和向日葵，自留地，改组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即使是工业的改组和党组织的改组，他也都是首先从发展农业这个角度来考虑的。然而不幸的是，正是他始终抓紧不放的农业改革的机遇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并没有摆脱在苏联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发展农业的思维和方式。领导人的政治决策和意志以及实现这种决策和意志的方式一直是制约苏联农业发

展的重大因素。传统上，农业的发展很少考虑农民本身的意愿和可能、地区、自然和气候条件、耕作方式等方面的特点，斯大林要实现赶超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就需要有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小农经济自然要被迅速消灭掉。赫鲁晓夫要在黄油、肉和奶制品等方面超过美国，于是他就要求到处种植玉米。他执政的前五年，由于农民有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可能来从事农业的条件，再加上荒地所提供的粮食，苏联的农业情况有了改观，但随着赫鲁晓夫越来越把自己发展农业的主观意志强加于农民，农业的发展就迅速走下坡路。赫鲁晓夫反对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却接收并强化了他发展国民经济的不可变更的领袖意志和强硬方法，这是赫鲁晓夫必然要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赫鲁晓夫的文化和理论修养都不高。他的决策和行事往往凭的是他的直觉。他的许多最初的想法都是以农村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的，但这些想法只有经过他身边的"笔杆子"才能见之于世。而他身边所聚集的顾问又大都是些察颜观色、阿谀奉承之辈，他们并不真的支持赫鲁晓夫的政策，有的甚至事实上是反对他所做的一切的。布尔拉茨基曾经写过："不幸的是，包围第一书记的是这样一些顾问：他们使许多合理且成熟的革新思想化为乌有，或者代之以很少经过全面衡量、认真检查和深思熟虑的纯组织决定。"[①]

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反对赫鲁晓夫的中央领导人来讲，他们对赫鲁晓夫政策的勉强同意，私下怀疑到公开抵制必然导致赫鲁晓夫的最后垮台。

第一，在"十月全会"上，他们抨击的矛头首先是

---

① 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顾问》，《莫斯科》，1990。

指向赫鲁晓夫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农业改革、工业改革和党政机构的改革。赫鲁晓夫的这许多改革措施有致命的先天不足之处，即各种改革措施的提出和付诸实行都缺少深刻的调查和研究，离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距离，往往是凭自己的直觉来办事，对这些改革措施可能带来的巨大的和严重的后果缺少考虑。而这些改革措施首先要触及的又偏偏是干部问题，即对赫鲁晓夫认为不称职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和各边疆区的领导人进行调整、变动和撤换。在改革措施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甚至使经济发展产生某种混乱时，那些可能被调整、变动和撤换的握有实权的领导人就会对赫鲁晓夫群起而攻之，就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采取反对他的统一行动。这就是赫鲁晓夫在十月全会上面对如此完整的反对阵营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虽然很少有人谈及路线问题，但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十月全会实际上反对的是赫鲁晓夫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也就是十月全会反对赫鲁晓夫的实质。

第二，这次全会虽然猛烈抨击了赫鲁晓夫的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的行为和个人迷信，但却没有对防止这种现象再度发生做出任何重大决定。在全会的决议中对这方面没有一字提及。全会唯一所做的就是匆匆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可以看出，在十月全会上领导人的更迭是唯一重要的事，十月全会所要解决的是谁来继续掌权的问题。不管当时中央委员们各自的想法到底怎样，他们却是认为一定要结束赫鲁晓夫的统治，把经济发展的一切过失都记在赫鲁晓夫的账上，否则对全国人民无法交代。因而，他们扩大了赫鲁晓夫的错误，把本不属于赫鲁晓夫个人，而应由整个领导来集体承担的责任都说成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他当年的一

些反对者事隔多年后作出另一种评说。沃龙诺夫说："将赫鲁晓夫撤职的目的不是为了纠正错误，更不是为了准确遵循二十二大的路线，而是夺权，以便离开这条路线。"①叶戈雷切夫说："不能把赫鲁晓夫描绘成几乎是个圣人。不，他是个普通人。他为党和国家做了许多有益的事。那些年开创的事业成了经济某个部门以及整个国家发展的阶段。所以，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试图把赫鲁晓夫的一些创举，如垦荒和征服宇宙归为己有，也就不足为怪了。"②

第三，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他们在苏共二十大上赞成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不是由衷的，而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他们并不认为那些被斯大林镇压的人需要大规模的平反，更不认为需要重新来评说斯大林和更改斯大林的路线。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和机遇，对他们来说这是离经叛道的事。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哲学是：平平稳稳地工作就行了，要什么改革！所以，他不久自己就走上了一条比赫鲁晓夫要严重得多的自己迷信也让他人迷信自己的道路。

因此，赫鲁晓夫在十月全会上的垮台是必然的事，但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却有很大的偶然因素。显然有三个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一是传统的，即第二书记理所当然地要替升为第一书记，这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中几乎是一种不成文的法律；第二，当时苏联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权力再分配还不可能出现另一个人来代替勃列日涅夫的位置；第三，10月全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事实上对第一书记的候选人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可选举一个平稳的、城府深不露头角的人。对此，叶戈雷

① 《消息报》1988年11月17日。

② 《苏共二十大后——和尼·格·叶戈雷切夫谈话录》，《苏共党史问题》1991年第5期。

切夫后来说过："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选举了勃列日涅夫。"① 沃龙诺夫说："会议参加者的动机各不相同，而错误却是一致的：为了纠正一个有鲜明个性的党的领导人的错误，我们却把希望寄托在另一没有什么鲜明个性的人身上。当没有批评领导、纠正其错误的机制，而又应该撤处他时，类似的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②

这篇短文不可能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功过作出详细的分析，根据现有的档案资料只能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在十月全会苏联领导人的更迭中，权力的再分配是最主要的，然而它并没有能保证苏联领导人不再重犯赫鲁晓夫的错误。相反，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和崇尚个人迷信成了苏联领导难以逾越的致命政治障碍。从历史的渊源关系来说，这是导致苏联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原载《世界历史》1996 年第 4 期）

① 《苏共二十大后——和尼·格·叶戈雷切夫谈话录》，《苏共党史问题》1991 年第 5 期。

② 《消息报》1988 年 11 月 17 日。

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述评

刘光慧

一

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10月上台执政到1982年11月因病逝世，历时18年，执政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在苏联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既不同于列宁、斯大林时期，也不同于赫鲁晓夫时期，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首先，这个时期是苏联国内最为稳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既没有外敌的武装干涉，也没有发生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相当安稳和有秩序。可以说，这是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历史上最安定的时期。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受国际形势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实行的某些政策有关。

其次，这个时期是苏联政治上比较僵化、思想上比较保守的时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吸取了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反复多变的教训，提出了一切“求稳”的口号。[1] 在这种

---

① 参见〔苏联〕梅德维杰夫等著《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20页。

思想指导下，无论在政策方面，还是在体制改革方面，都没有大的举动。勃列日涅夫着力要做的是，纠正赫鲁晓夫时期某些不切实际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完善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对其进行小修小补，而不是实行重大改革。这种“纠偏”和“完善”具有一定的保守和复旧性质。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体制，垂直式的部门管理体制，排斥市场调节机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等等，依然存在。

第三，这个时期是苏联步入超级大国行列，以空前规模卷入国际事务最多的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苏联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迅速增强，苏联已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当然，这种大国地位，主要是靠经济的畸形发展换取的。由于苏联在军事上的迅速崛起，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中苏联愈来愈占据优势，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这个时期，苏联凭借巨大的军事实力在世界上到处插手，谋求霸权，世界上的热点地区几乎都有苏联插手。

第四，这个时期是苏联由发展到停滞、由缓和到争霸的时期。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经济实力翻了一番。进入 70 年代以后，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慢，以致最后出现了停滞和倒退。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向西方国家积极推行“缓和战略”，取得了一些成效。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70 年代中期，苏联调整了对外战略，开始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走上霸权主义道路。

二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尤其是执政初期，苏联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1965～1980年，苏联的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都有较大的增长，如以1965年为100的话，那么到1980年，社会总产值增至238，国民收入增至235，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至319。[①] 这个发展速度高于同期美国的发展速度。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经济增长尤为快。据苏联当时的官方数字，196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62%，到1975年提高到相当于美国的67%，而同期的工业产值比则从65%提高到80%。[②] 此外，苏联已有20余种重要产品雄居世界之首。正是在这段时期里，苏联的经济实力翻了一番，苏美之间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段时期，苏联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提高。1965年苏联国家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6.5卢布，1981年则提高到172.7卢布；1965年苏联集体农庄庄员月平均劳动报酬为51.3卢布，1981年提高到120.6卢布。此外，苏联居民住房状况也有较大改善，人均居住面积由1965年的10平方米，提高到1981年的13平方米。

第二，保持了政局的稳定，社会也比较安定。

由于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10年的多变，勃列日涅夫深知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对发展经济和维护其领导地位的重要性。为了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实现社会安定，勃列日涅夫首先从党内入手，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他把赫鲁晓夫搞的工业党和农业党加以合并，恢复了党的统

① 《1980年苏联国民经济年鉴》，莫斯科，1981，第39页。

② 《1980年苏联国民经济年鉴》，第123页。

一领导体制，并第一次用国家根本法（1977年苏联宪法）的形式确立苏共在苏联社会政治体制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他取消了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干部定期轮换制。为了排挤政治对手，他一般采取逐步削权的办法，等待时机成熟，以所谓“健康”原因为名，解除他们的职务。对政敌一般不搞过分的政治迫害。

1977年，苏联通过了新宪法，这是苏联历史上的第四部宪法。它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法制建设的最大成果。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苏维埃工作，提高苏维埃地位。

第三，在军事上得到了较大发展，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均势地位。

这段时期，苏联将85%以上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强调发展战略核武器和远洋海军是苏联军事工业发展的重点。在上述方针指导下，苏联军费逐年增加，从1965年的326亿卢布增加到1981年的1550亿卢布，增加了3.75倍。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4%，约占财政支出的1/3以上。苏联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逐步改变了美苏军事力量的对比。70年代初，基本达到均衡，此后日益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这样，苏联只花了不足10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均势地位，步入超级大国行列。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说，苏联“取得这种平衡是最近几十年来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①] 苏美在军事力量上的势均力敌，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争霸。

第四，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收获，得到一些好处。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制定和实施了“和平共处

①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新华出版社，1984，第462页。

与推进世界革命并重”的对外战略，其发展脉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苏联推行“缓和战略”，大大改善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苏联同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经济、科技协定，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资金，促进了国内经济和科技的发展。1975年“欧安会”首脑会议的召开及有关欧洲安会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署，正式确认了战后欧洲边界的走向，巩固了苏联战后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它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在外交上取得的重要成就。

第二阶段：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放弃了“缓和战略”，转而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苏联在加紧同美国争夺，继续加强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同时，打着“推进世界革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大力向第三世界进行扩张，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报告中对苏联对外政策取得的成就颇为得意。他说，“我们简直是亲眼看到世界在变化，向好的方面变化”，我们“所能做到的一些事情是具有真正不可磨灭的意义的”。他宣称苏联已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苏联的对手已被迫“大大退却”，世界上的每一角落无不在苏联的考虑之内。①

三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还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体制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第11、13、14页。

上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内外政策失误的曝光，使苏联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难以克服的困难。

第一，经济逐步陷入困境。

由于经济改革的停顿，到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实际上，从70年代初起，苏联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均开始下滑）。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由1971～1975年的5.7%下降到1981年至1982年的2.4%，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由1971～1975年的7.4%下降到1982年的2.8%。[①] 农业生产状况也十分不妙，据1986年11月苏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表明：1976～1980年苏联年平均谷物产量20505万吨，1982年谷物产量仅达18677万吨。[②] 由于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工农业增长速度，供求矛盾进一步扩大，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人民生活水平日渐下降。

此外，苏联的资源浪费严重，劳动力日趋枯竭，资金更加紧张。这些因素也严重制约着苏联经济的发展。上述情况表明，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逐渐失去活力，陷入困境。

第二，在政治上僵化、保守，领导层老化，个人崇拜、官僚主义现象日趋严重。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由于政治上过分强调稳定，特别是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使整个社会日趋凝固化，成为毫无生气的一潭死水。

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将中央主席团改名为中央政治局，设中央总书记来代替中央第一书记，恢复了苏共十九大以前中央领导机构及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称谓。干部

---

① 参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第51页。

② 《1985年苏联国民经济年鉴》，莫斯科，1986，第209页。

轮换制被取消，埋下了领导体制僵化、保守和干部队伍老化的祸根。这个时期苏联各级领导班子变动极小，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几乎没有变动，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这段时期，还增加了许多新的管理机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现象严重。70年代中期以后，勃列日涅夫放弃了集体领导原则，大搞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还是国防会议主席），独揽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勃还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自己的功绩。他接受苏联和外国勋章达数千枚之多。[①] 在干部选拔问题上，他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这段时期，苏联整个社会上行下效，劳动纪律松弛、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等现象相当普遍。

第三，对外扩张背上沉重包袱，外交上陷入孤立，进退维谷。

苏联对外搞霸权主义，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它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使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为了压倒美国、争夺军事优势，苏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据统计，到70年代末，苏联军队人数高达40多万，大约是美国的两倍。为了维持阿富汗卡尔迈勒政权、援助越南和古巴，苏联每年要付出70多亿美元。为了进一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苏联向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为了遏制中国，苏联大大增加了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苏中边境、蒙中边境陈兵百万。所有这一切，严重制约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加重了苏联的经济负担，是导致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引自《国际展望》1988年第23期。

四

为什么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会从发展到“停滞”？我们从中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是一个经常变化和不断改革的社会”,[①]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反映。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证明，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勃列日涅夫刚刚上台时，本来可以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使国家彻底摆脱僵化体制的束缚，把苏联社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当时，人们一方面不满意赫鲁晓夫的鲁莽行为和冒进政策导致国家经济上混乱和政治上不稳，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却希望新领导能在吸取前任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励精图治，把国家引上振兴之路。勃列日涅夫似乎也“顺应”了人们的意愿，他上台后，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调整了以往的政策，并进行了“审慎”的改革。1965 年，“新经济体制”试验正式出台。“新经济体制”的推行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旧的经济体制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增强了经济杠杆的刺激作用，调动了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使一度发展缓慢的苏联经济有了一些起色。但是好景不长，从 1968 年起，以出兵捷克为契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 443 页。

机，勃列日涅夫很快收起了“改革”的旗帜，代之以“完善机制”的保守提法。此后，经济增长率日益低落，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说这个时期所谓的改革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勃列日涅夫较重视微观改革，即“完善机制”。在维护现存的高度集中体制的前提下，对某些具体制度进行微观调整，加以充实和完善，乃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不重视体制宏观上的改革，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相脱节，这是导致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失败，苏联经济和社会生活陷入全面停滞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由此可见，坚持改革应该是我们从勃列日涅夫执政18 年的实践中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重要特点是对外扩张，推行霸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它是由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它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性质是和平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目的和根本任务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创造有利条件。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方针，奉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既不能搞革命输出，更不能搞霸权主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本应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但苏联在对外政策中却实行了霸权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理。

勃列日涅夫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与霸权主义有必然联系。苏联之所以产生霸权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深远影响、苏联共产党

在国际共运中长期处于"领导党"地位以及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列宁曾要求俄罗斯共产党人要"特别坚决地反对……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思想和沙文主义思想（有时是不自觉的）的残余"，并宣布要"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①] 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处理同一些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赫鲁晓夫时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人头脑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想残余恶性膨胀。苏联官方大肆宣扬和美化沙俄侵略扩张的"功绩"，为其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服务。1980 年苏联隆重集会纪念沙俄将领苏沃洛夫诞辰 250 周年，吹捧他是"俄罗斯炽热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说他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俄国的国际威望"。[②] 由此可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想在苏联根深蒂固。在国际共运中，苏共长期处于"领导党"地位，这种地位使苏共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关系时常常强调苏共的利益、苏联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的意志和经验强加于人，进而走向霸权主义道路。70 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为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它促使苏联领导人对外扩张、争霸的欲望进一步增强。总之，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并非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它是苏联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是苏联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当时，世界处于新科技革命崛起的时代，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不大。因此，苏联应立足于防御，而不是搞什么"进攻性战略"，更不应该同美国搞军备竞赛。苏联的战略重点应该是搞好国内经济建设，把自

①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 334 页。
② 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6 年第 6 期，第 36 页。

己的经济政治体制调整好，大力发展新科技，把科技力量从军事工业部门转移到民用经济部门，同时注意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科技的经验，增强经济实力，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对第三世界国家，苏联应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而不应该把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和价值标准强加给它们。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在每个具体国家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基础上才能成长。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应尊重各国独立自主探索各具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而不应该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加以干涉。

实践证明，勃列日涅夫搞霸权主义、搞“革命输出”、搞苏联单一社会主义模式的“移植”，结果使苏联陷入了空前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之中。

（原载《东欧中亚研究》1992 年第 4 期）

评勃列日涅夫时代*

〔苏联〕布尔拉茨基

现在，我们特别需要清楚而准确地评价停滞时代。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在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们领导国家、领导整个管理机构的近 20 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最富有戏剧性的问题是，（这一点很快就已弄清）勃列日涅夫对于突然要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完全没有准备。由于各种力量复杂的多方面的相互作用，他成为党中央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处在中心地位，因为这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无论如何也没有招致同僚们的反对。他的肤浅本身成了长处。

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领袖，他的主要特点一下子显露出来了。作为一个极其谨慎、在自己升迁的路途上没有采取过任何轻率步骤的人，作为一个被称为“看风使舵的领袖”，勃列日涅夫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中间派的立场。他没有走过极端——既没有采取过符合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精神的改革计划，也没有采取过新斯大林主义的计划。他在这里信奉列宁以后形成的传统。大概并非所有的人都知

* 本文原题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译者

道，斯大林也曾作为中间派掌握了政权。他先是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托洛茨基“左倾分子”，以后又同莫洛托夫等人结盟反对布哈林“右倾分子”。

总之，勃列日涅夫是在没有带着自己的国家发展计划的情况下上台的。这是现代政治史上少有的事例之一，即一个人在没有提出某些纲领的情况下就接管了政权。就其自身素质而言，勃列日涅夫是个因循守旧的人，他最惧怕的是激烈的运动、大转折和巨变。在谴责了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之后，他首先关心的是取消赫鲁晓夫的一些激进的主张。干部调换的主张悄然无声地消失了。他提出了求稳的口号——每个机关工作人员的美好理想。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了非常可怕的说空话的传统。发表演讲，往往讲得很好也很正确，但讲的话多半空洞无物。替他起草讲话稿的人具有歪曲任何好主张的特殊本领。政策不再是一项政策了，因为政策表现的是求实的关系，而不是就某些决议发表废话连篇的演讲。政策不是就食品纲要发表的声明，而是商店里的食品，不是许下的诺言，而是使每个人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现实措施。

经济和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是不了解和惧怕业已迫近的结构改革——在工业中改革经济核算制，在农村推行承包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主要教训是，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行政命令体制。技术革命要求自由劳动，要求发挥个人的首创精神，要求创造性、不断地探索和竞争。结构改革和改革是摆脱停滞的必然出路。

传统的政治领袖的地位需要改革。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创了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这是第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还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做许多工作，才能做到在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中间不再出现新的勃列日涅夫，尤其是新的契尔年科。因为现在已经很明

显，凡是不会当领导的人必然走向人为地培植对自己的崇拜，挥霍人民财富和营私舞弊。必须将重心转向最高职务候选人的活动公开等方面，当然，还必须有一个真正的选举制度。

防止勃列日涅夫体制复活的最重要的保证是党已经找到和现在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多元化模式起源于列宁时期，我们现在有可能促使其大大地向前发展。

（刘光慧译）

（原载苏联《社会科学》1989 年第 1 期）



编后记

在 20 世纪的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过一个国家，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在其 74 年的存续期间，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等不同时期。我们之所以选取勃列日涅夫时期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因为这一时期长达 18 年，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是苏联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转折期。在此之后，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时期，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已无回天之力；雄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这幢大厦，顷刻倒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影响，对苏联最终走向解体的催化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

陆南泉老师是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尤其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具有独到见解。从他的主题论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尽管号称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但充其量不过是个"幌子"。盛名之下，苏联社会充斥着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党政官员不思进取，贪污腐败；意识形态受到高度管控，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备受打压；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低下，怨声载道；苏美争霸世界，大搞军备竞赛，国民经济严重失调。面对这

些问题与矛盾，勃列日涅夫不是从改革制度弊端入手，而是片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其结果，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似坐在火山口上，危如累卵。

为了推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博源基金会在2010年9月和2011年1月召开两次专题研讨会，展开了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锋。本书第二部分的专题讨论收录了两次讨论的主要观点。闻一老师关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观点，马龙闪老师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高放老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以及秦晓、沈志华两位老师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入探讨，都是对这一主题的拓展思考。此外，我们还选取了一些相关主题的文章，作为本书的第三部分，以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研究的背景情况。

正如高放老师所言：我们“不是作为历史学者来研究外国历史，而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考虑从苏联剧变当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此推进我们国家的改革，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作为马克思学说的产物，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实践，经过数十年的蓬勃发展，在20世纪末期受到重创，这一基本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对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拓展人们的思考空间，为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

博源基金会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编辑小组

2011年5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走近衰亡　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
作者=陆南泉著
页数=224
出版社=北京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12
SS号=12870507
DX号=000008205854